

Nuestra Huelga

# 我们的罢工

1966.11.30-1967.5.17

一场长达 163 天的反抗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出版

1968 年初版，2018 年重版

译者：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 Nuestra Huelga

## 我们的罢工

1966.11.30-1967.5.17

一场长达 163 天的反抗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出版

1968 年初版，2018 年重版

译者 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2021 年）

致半岛上所有城镇的工人，他们的声援使我们坚持了下来，也致学生、神父、教授及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同样也为我们的事业提供了帮助。

致那些为了解放所有国家的被压迫者——我们希望自己的战斗也属于这场运动——在全世界无论何处战斗着的人们，尤其是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及南美与非洲的所有革命力量。

致我们的父辈与斗争中先我们而去的人——如今已过世、流放出国或是退休——致他们以崇高的敬意。

致我们的孩子。<sup>1</sup>

---

<sup>1</sup> 本段附有巴斯克语版本。——中译者注

# 目 录

中译者序.....	1
第二版五十周年序言.....	10
前言.....	19
第一部分 罢工的历史.....	23
我们的公司 它的特点 三年的斗争.....	23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47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71
审判后的抵抗.....	89
罢工结束了 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	116
第二部分 一些基本方面.....	120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120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129
技术人员的做法.....	154
官方组织的态度.....	175
我们的罢工是否是政治性的？它是由谁组织的？.....	195
第三部分 思考.....	205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205
给大学生的思考.....	227
后记.....	237



## 中译者序

几十年来，中文世界对于战后工人运动所知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引进国外的经验，从六七十年代革命浪潮的成功与失败中学习，为今后的斗争指明方向。我们要做的，是将阶级斗争的火种保存下来。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可行的道路，工人阶级必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这本书的故事正是工人斗争的典范。埃切瓦里班达斯的轧制工人在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凭借集体的意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实现了弗朗哥独裁时期的伟大壮举，实现了一场当时无法想象的 163 天之久的罢工。它也是独裁时期**最长的、最精彩的一场罢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班达斯罢工教育和鼓舞了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工人运动浪潮。

正如前言所说，这本书是由工人自己写下的，关于他们罢工的历史。它蕴含着工人们朴实的情感与意志。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人**们的团结与声援活动也让我深受感动**。

我们对书中讲述的故事可能不会太过陌生。班达斯在那些年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生产出价值的工人，拿到的只有微不足道的工资。按照汇率来说，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班达斯工人的境遇。书中提到“**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十亿比塞塔... ..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 25 亿比塞塔**”，然后是“**到了 1962 年... ..（每位工人）所有的收入... ..每月不会超过两千五百比塞塔**”、“**在 1962 年的巴斯科尼亚**

罢工中，人们发现有 212 人的年收入少于两万两千比塞塔”。在罢工发生前，管理层想尽办法不给工人签协议，不肯在经济上让步；克扣工资，提高工作量；故意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而后，工作条件和待遇上的恶化变本加厉，最终引发了这场罢工。

战后资本主义繁荣、产业转型以及弗朗哥国家为进入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改革，也为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也是六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潮，在西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工人委员会”陷入危机后，从班达斯罢工（1967）到哈里·沃克罢工和勃兰索尔罢工（1970），工人阶级自己领导了斗争，检验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这些尝试点燃了整个西班牙，热火朝天的斗争在七十年代蔓延开来。从西亚特、洛卡到巴塞罗那港口，曾受左翼政党束缚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真正的力量对弗朗哥国家予以痛击<sup>2</sup>。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格外熟悉。当时西班牙的社会氛围是保守的，文化也受到了不断的国家压制。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暗潮涌动。同时，西班牙工人遭受着严厉的镇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工会。尽管他们在国家面前好像束手无策，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一切斗争的可能性。

因为斗争仍然是可能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群众前进的脚步。况且西班牙工人当时面对的是比今天中国工人更不利的条件。在反抗中，工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发现了自己有反对一切残暴、无耻和不平等的力量，反对这个建立在谎言和神圣规则上的社会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感受到自己成为了生活的主人。他们让资本主义

---

<sup>2</sup> 有关战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更多内容（包括弗朗哥时期的运动，格拉纳达、洛卡与巴塞罗那港口的斗争等等），可参见《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

及其镇压都变成了笑话。资方使出了全部典型的手段，对工人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调动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这些都打不倒站起来的工人阶级。

班达斯的创举，关键在于工人中间的自我组织，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出于本能而这样做的，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将成就无比的事业，并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一个典范。工人的自我组织，在斗争中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动员与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阶级也愈发团结，他们在集会中成长，并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智慧。不是成事不足的左派“领导”，而是工人自己成为了斗争的主角。

正如书中所说，地下环境对于学生和工人组织都是相当有害的。各种工人组织虽然尝试参与群众行动，但也有阻碍斗争的一面。比如说，书里也质问这些组织，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下没能发起总罢工，虽然没把话说得太重，可以看出工人对这些组织非常不满。就好像工人在斗争的时候，还要顾虑到这些组织一样。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对工人事业怀有的热情和美好愿望，这也不是光靠批判就能解决的“路线”问题。问题在于思路，当时的左翼工人运动认为，工人的觉悟就是服从左派的正确领导，于是各派只想着拉队伍，由自己提供政治领导，而没有推动基层斗争和自主组织，在斗争中提高群众觉悟。他们看重的是对工人日常组织的控制力而非阶级利益，甚至为了议会中的便利，阻碍和反对当时的运动。

至于为什么翻译《我们的罢工》一书，因为它是由工人斗争的参与者亲自书写的故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勇气与团结的榜样。工人运动离我们太遥远了，人们早已忘记了，群众自发和自主建立

的组织，以及在斗争中得到锤炼和发展的阶级意识，到底是什么样子。劳动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实现自我解放的唯一道路。在工人中间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书中描绘的未来是可以实现的。正是共同的理想跨越了半个世纪，将我们与班达斯工人联系在一起。

但将本书引入中文世界是一件偶然的事。要不是朋友推荐了这本书，可能这本精彩的传记，连同西班牙工人的斗争记忆仍然不会被中国工人所知。感谢推荐了这本书，并一直在为阶级事业寻找文献的朋友，还有记录下这场罢工的老战士们。而我只是在尽我所能，做我能够做到的事。

与那个年代不同，我们已经没有真正寻求变革的革命者了。我们还没年轻过，就开始学着老一辈的样子讲话和思考，早已失去一切健康的直觉与反叛精神了。想要凭自己的思考找一条出路，这也是很难的。毕竟我们所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由领袖或先锋队，再加上正确的理论完成的。二十世纪的积极分子基层斗争传统并没能扎下根，或者说一点也没留下。引进文献也是为了找寻这一失落的传统。

本想在这里记录下我自己的生活动，但发现自己写不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话，在表达生活时，用的都是家长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语言。这里没有文化，更没有对文化的需求。为了寻求答案，我曾经历过漫长的思考，也犯过许多错误。当我发现这个可悲的生活绝不是必然的，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可以实现时，又陷入了无力和迷茫。这个完全保守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也没法教会人严肃的斗争。在这里，我做着最大胆的梦想，尽可能地成长。我反对上一代人，又感到和这一代人格格不入，我痛恨他们的麻木和愚蠢，这个生活的一切又是难以置信的荒谬。在这

样的氛围中，怎么会不感到烦恼呢？不管是哪个年代，对旧规则难以忍受、反叛传统的人，总会有相同的烦恼，他们与旧式家庭、学校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总是相同的。不管怎么说，我对新一代是充满信心的，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就是对自己无力掌握生活、对强加给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反抗，他们已经很少相信这个无视他们意愿的社会承诺的美好未来了。总有一天，青年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虽然我最富激情、充满幻想的学生时代都被无谓的事情消耗了。我的经历可能不会留下什么，但这些历史文献所承载的信念与希望将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翻译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让我回到过去能否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我的缺点有很多，或许并不是最适合斗争的材料。但谁又是“适合斗争的材料”呢？革命能够实现每个人的价值，随着斗争的深入，阶级社会所认为的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将消失。我不承认阶级社会的成功标准，斗争也不是留给伟大人物的工作。人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多亏了疫情，我才有空闲翻译一些著作。《我们的罢工》其实去年挺早就翻译完了，但为了对读者负责，我必须把译稿校对到令我满意的程度。本书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感谢 Rodrigo 解答了校对上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部分校对，还有龚义哲、李星与吴季对文字润色与定稿提供的重要帮助。我自己成为这本书的翻译感到十分荣幸，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对它的价值抱有信心。

2021年3月29日

## 补充的话

时隔三年多，该回头把《我们的罢工》再校订一遍了。

今年年初（2024），我翻译了另一本西班牙的罢工当事人写的小册子《哈里沃克：罢工六十二日》，里面致敬了《我们的罢工》，说受班达斯罢工的启发非常大。借此机会，是应该改一遍早年的译文，何况这本书相当重要。不然不晓得等到猴年马月。

读完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实在太好了。不过校对下来，我发现当初在翻译表达和理解上的问题太多了。读者也说译文“生硬干涩”。当然，都怪译者当时的水平不够，翻译经验太少。我为此很是自责。

我记得当时，书里很多地方我都看不懂，现在一眼就能看明白了，为啥呢。21年下半年，我又学了一阵子西班牙语（之前也是完全自学的），写了写题，想考个证。读写部分过了，但听说部分差很多，后来作罢。我想了想，主要还是我这几年坚持翻译的缘故（英语和西班牙语各半吧）。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感觉之前的译文不忍卒读（安德烈乌·宁的文集、毛林的《走向第二次革命》、讲西班牙战后工人斗争的《自主斗争》、这本《我们的罢工》、讨论阿根廷“肮脏战争”的《上帝的刺客》、综述意大利战后阶级风暴的《黄金暴徒》，以这个先后顺序，都可以归为“早期作品”），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以后有机会统统校订一遍。

我认为要习得一门技艺，至少要五年的艰苦练习与不断反思。对于翻译来说，更是如此。改正学校教授的欧式汉语是第一关。你还要写写随笔，读读经典小说，看看文学大家（包括文化特务）关

于汉语表达的理解。不过，练习与思考是最主要的。

这只是我的个人之谈。我从事阶级话题的翻译工作快五年多了（有一年因为个人原因啥都没干），翻译了十一本书（没记错的话）和一堆杂文，也只能说稍微有点感觉。刚开始翻译的时候，我还特别懵懂，对译文完全没有把握。我还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怎样才算好的译文。翻完《我们的罢工》之后呢，直到搞《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工资低到吓死你》、《工人组织者的个人经历》（译名暂定）、《卡车司机的力量》这段时期，我才有了一点点自信。到最近的《哈里沃克》和塞尔日的《德国革命见闻纪》（译名暂定），下笔时，我终于不像无头苍蝇了，为此花了五年时间和两位数工作量。

当初算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翻译的。我知道，我翻得未必有多好，但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做我能做的事。有那么一股劲。

至于为什么参加翻译，我想是因为很多偶然因素。我也是初中看《资本论》的那种家伙，大概是想受人崇拜，显得与众不同吧。但我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疑惑，我需要寻求解答。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到头来也没怎么样，还是个糊涂蛋。

高中毕业，本来想学医的，读精神病学（高中有段时间在看弗洛伊德），家里死活不让，最后读了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我上大学的前两年，还在大繁荣中，社会没现在这么浮躁。身边人该玩的玩，该刷履历的刷履历，唯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人跟巴甫洛夫的狗一样，见到活动就参加，见到学分就要拿，我觉得毫无意义。不管我问谁，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谁都答不上来。我不知道上大学有什么意义，混日子太痛苦了。哪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然后呢，稀里糊涂地通过网络，我找到了阶级话题的翻译素材，从此开始了翻译之旅（一直没好意思讲，我高中曾经翻译过一本工

具书，不过很糟糕，后来也不知道丢哪儿了。当时也是有劲无处使吧。可能我和翻译挺有缘的)。

过了半年，疫情来了。现在想想，疫情真是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许没有疫情，我可能待在校内，看着身边同学考研，也跟着考了，或者对未来有别的规划吧。谁知道呢，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

不说大革命家，就说小人物吧。在我翻译的那本美国工人活动家自述集里，一个受访者说，这辈子干工会吃了很多苦，但叫他重头来过，他也无怨无悔。不知道十几二十年后，我会不会这么说。

关在家里上网课时，我翻译了早期的三四本书。翻译很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高度集中。我一般起来泡杯茶（一天要喝两三壶），从早上九点，一直翻译到六点，累了就起身走走，吃完饭可能再继续一会儿。家里倒是管我在做什么，反正看我在忙，“忙点好啊”。后来我干脆在客厅里翻译校对了。

我的生活很枯燥，没什么乐趣，行程很固定。我也不擅长享乐，吃饭没什么讲究，不怎么消费，好在能省下钱。挺像清教徒的。我总是很忙碌，常常在脑子里设想计划，争取提前完成，老是搞得压力很大。但要是有人问我：你总是在忙什么呢？我只能打马虎眼。

坚持翻译是很困难的事，可能因为我个人有些偏执的毛病，所以才能坚持下去。那么，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做这些事有什么回报吗？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认可。到底图什么呢？

我觉得当代人不可能做没有回报的事。

你问我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想做点什么。

这些文献的价值，可能我作为译者，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当时的我只是觉得，总得做点什么，就像是完成某种义务。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做得做点什么。

后来上了班，翻译也没停。那可真够辛苦的。回头看，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翻下来的。当然很多译稿还在校对。

最重要的还是讨论，要阅读思考，所以不是光翻译就完事了。很少有人翻译具体工人斗争相关的文献。翻学术性左翼文献的不少，但很少有相关的讨论。我一直觉得，思路是最重要的。我们总得从上世纪的失败中总结出什么，避免后人重复犯错。因为错误都是思想误区，是阶级社会再生产出来的。我觉得总结经验就是现阶段的历史任务。

另外，本书的附录我暂时没有翻译，包括报纸和书的摘录、工人律师的陈述、工人和神父的声明。其实不多，有空补上吧。

2024年9月1日

## 第二版五十周年序言

### 前言

班达斯冷轧公司罢工五十周年之际，出于对这场罢工的兴趣，Intxorta 出版社找到了一些班达斯工人，希望再版《我们的罢工》。

我们的唯一要求是不改动原文，只加上这篇新序言，因为 1968 年出版的这本书最直接、最诚实、最完整地讲述了这场冲突。这是罢工的亲历者书写的，这场历史性的罢工是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班达斯罢工五十年后，第一版的一万七千册早已售罄，再版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班达斯冷轧罢工的方方面面，回到过去的岁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它。

### 鸣谢

首先，我们要向已经过世的、曾与我们并肩战斗的班达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敬意。安息吧，你们的记忆将长存于这本书的每一页中，这是你们的书。

它是团结的壮举，每一位罢工工人及其家庭在这场史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无私的精神，奉献出了巨大的热情，进行了

无数次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凝聚了伟大的阶级意识。“小人物”办成大事可是很少见的。

此外，我们还要对支持我们斗争的许多人和团体，尤其是巴斯克和全国的工人，再次表示感谢。没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帮助，这场冲突没法坚持这么久，取得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担心会遗漏，故没有列举这些人的名字。



当年的合影（1967年）

## 《我们的罢工》一书的出版

在长达 163 天的罢工期间，我们曾在几份传单中承诺，有朝一日一定要把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

我们当时就认为，必须把罢工的鲜活经验和我们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尤其是分享给工人世界和工会，还有其他社会人士和团体，例如专业人士、大学、教区、媒体、基督教工人青年团和天主教行动兄弟会，以及为支持我们的斗争而建立的各种公司委员会。

显然，当时的环境毫无政治自由，我们无法出版关于我们的罢工的书，但在 1967 年 2 月，罢工的过程中，弗朗哥政权宣布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José Antonio Osaba）为“不受欢迎的人”，把他驱逐出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

何塞·安东尼奥趁乱逃到了法国。自从他在那年三月离开以来，我们专门把当时事件相关的所有文件送到圣胡安·德·鲁斯（San Juan de Luz），以便他编写书的初稿。

罢工结束的几个月后，我们的朋友古鲁齐·阿雷基（Gurutze Arregi）把书稿送到我们手上。奥萨巴把初稿交给我们校对。在六个月内，我们把这本书完稿，定了书名：《我们的罢工》（Nuestra Huelga）。

1967 年底，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从圣胡安·德·鲁斯到巴黎找工作，同时寻找可以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在这项复杂的工作中，他得到了耶稣会士大卫·阿尔门蒂亚（David Armentia）的宝贵帮助。来自巴斯克乌雷塔门蒂（Uretamendi）的纳蒂·费尔南德斯（Nati Fernández）和安赫尔·加西亚（Ángel Garcia）也无

私地在他流放法国的第一年里陪同他。

他起初打算让“伊比利亚之轮”（Ruedo Ibérico）出版此书，这家出版社在巴黎出版反法西斯书籍。奥萨巴和出版社的负责人谈了几次，但他们的提议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他们出版的书开本很大、成本也高，只在巴黎的书店里卖，这极大地限制了这本书在西班牙地下发行的可能性。出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有些法国团体支持我们的事业。与他们接触后，我们又看到了可能性。但我们很快了解到，没有法国出版商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接下来是新的选择：我们自己来出版这本书。为此我们需要一家印刷商接下这个棘手的工作，因为班达斯的工人没有法人资格，自行出版可能会触犯法国的法律。

出于慷慨和信任，法国朋友承担了风险，让我们能够着手出版工作。所以我们能自行决定出版的数量和开本，把它设计成《圣经》的一半大小。用的纸比普通的贵，但这样可以大幅减轻每本的重量。

这样它更适合分发和地下流通，而且把书设计成这种大小，按照“货物”重量来算，付钱给走私商，让他们夜里把书从西班牙边境运进来，要便宜很多。

毫无疑问，书在过境时危险重重，但还是有一万七千本书送到了各个目的地，然后分发开来。有件事值得一提。吉普斯夸的一对夫妇，在边境附近取了一些装书的包裹，但回去路上车胎坏了。他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清空后备箱，拿出备胎和千斤顶。在搬包裹的时候，路过的国民警卫队主动给他们帮忙。卫兵差点发现包裹里的书。“心跳加速”了半晌之后，夫妇继续上路了。

出版和运送一万多本书的全部过程，用的都是罢工期间慷慨捐

资的声援基金的余款。钱是用来声援我们的，因此大部分的书我们都是无偿赠送。

不用说，班达斯的男女老少，以及以千百种方式支持我们的人们，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下书，阅读它。我们在罢工中的承诺已经实现：把罢工变成典范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讲述为自由而战的人们与独裁政权的各种代理人进行的六个月的艰苦斗争。

另一方面，《我们的罢工》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实现了这本书的一大基本目标：让工人世界和所有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社会力量能够从书中学到各种东西，从而推动斗争。

## 忠于我们的时代

历史难免会对人们试图描述和分析的事件给出不同的说法。对书中证据确凿的事实，班达斯冷轧公司的管理层从未另有说法，更没有对缺乏自由——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与商业权力的垄断——的问题表明态度。他们不过是散布谣言，试图歪曲冲突的起因，以及工人坚决反抗社会和政治暴行的原因。

自由和权力来之不易，却无法久存，因此不妨再版我们的书，原本的内容完全保留。

想要改写我们罢工的历史、改写以我们自己担保的本书第一版，必须拿出新的证据和文献。毕竟，我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角，它考验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建立没有压迫的世界的承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和社会政治思想没有开阔，因为我

们的生活因各方面的新经验得到了丰富，不应再回到那个时代不得不经历的，极大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独裁统治之下了。

当时班达斯的工人平均只有三十岁，大部分人也是第一次进厂打工。捍卫我们利益的工人小组成员不属于任何工会或地下党，说明我们完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且始终保持着牢固的团结。

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小组加入了天主教行动兄弟会，以便获取阶级意识和有关工人运动历史的重要知识。但它尊重刚崭露头角的我们（不像工会那样），也没有指示我们每个人具体该怎么做。

## 冲突的经验跨越了时间

弗朗哥政权在 1976 年倒台，一个承认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罢工自由——的法治国家和民主社会取代了它。

正是这些权利的缺失，促使我们和平的劳资冲突逐渐变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残酷社会政治对抗。当年的人们在不同战线上为伟大理想和政治事业而奋力拼搏。

我们没有想到，这场劳资冲突变成了以经济权力和独裁统治为一方，以数百名班达斯工人和动员起来支持我们的各类社会团体为另一方，两方之间极为不平等的对抗。

简直不敢想象，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罢工居然能顶着前所未有的镇压大获全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抗争迫使他们揭开了真面目，揭下了他们的虚伪面纱。

过去四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对当代人来说，独裁下的生活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

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无数的腐败与不合理的政策，人们对更平等的分配，对教育、就业、知情权等方面的平等愿望仍未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罢工》讲述的短暂却激昂的历史，能为当今社会提供什么？显然，每位决定阅读本书的人都会得到自己的结论和教导。

就我们而言，除了团结与勇气的伟大典范，那场冲突对当下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这个故事描写了许多人的所作所为，通过辨别和分析这些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当下许多人的行为，这就是斗争带给当前的最大启示。

在这场冲突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两大社会阶级相互敌对，工人阶级反对获得中间阶级支持的上层阶级。需要认识到，这种阶级划分一定会影响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重拾仇恨，也不是判断是非，而是要讲明责任与个人良心的问题。

班达斯罢工体现了人的不同行为，从正直、慷慨、勇气到最露骨的压迫、怯懦、服从，这些都是人所共有的情感。

为了理解我们的说法，再举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执行命令”，“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些说法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震惊了世界，这是纳粹骇人罪行的始作俑者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罢工》一书的教训，现在也应当继续呼吁每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追求基本的价值观，如践行正义、团结互助、热爱真理。不能为了逃避困难，或为了物质利益、政治、工作上的好处，让自己的内心屈服于强者的法则。

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中，甚至在所谓进步社会中，都存在着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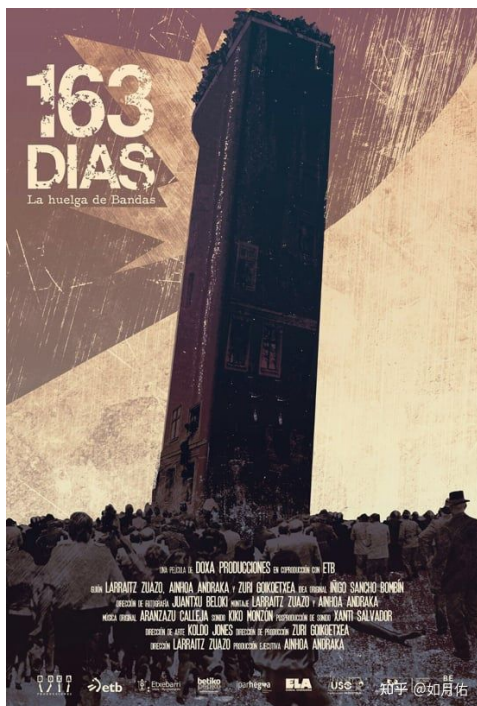
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之间的不断斗争。这似乎让书中所反映的彻底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不平等与痛苦的梦想，离我们更远了。

出于这些原因，选择个人与社会契约的形式是最好的。这种形式既远离过度乌托邦的历史乐观主义，也远离极端悲观主义。

最后，我们希望在五十年前以极大的热情与对真理的渴望写成的这本书，能够带来感动、启迪、价值观的认识，引导我们的生活朝着更有价值的方向前进，让我们力所能及地建立一切美好。

前班达斯冷轧罢工协调小组成员

2018年5月于毕尔巴鄂



在《我们的罢工》五十周年之际，还拍摄了一部讲述罢工的纪录片：

预告片：<https://vimeo.com/ondemand/163diaslahuelgadebandas>

正片：<https://vimeo.com/257547655>

## 前言

“真理没有两条路”<sup>3</sup>

经过了五个半月，我们的罢工结束了。尽管我们怀着痛苦和愤怒，它的结束仍然是光荣的。为了终结我们的抵抗，他们必须要调动整套镇压机器，使政权屡屡暴露真面目：资本主义的傀儡。

在罢工的第三天，当国民警卫队手持武器把我们赶出工厂时，我们非常明确地说：“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我们遵守了诺言。我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为了强迫我们回到工厂，他们不得不拿枪口对着我们，还无所不用其极。工人得到了有利于抗争的岗位，为了瓦解我们的抵抗，毕尔巴鄂银行下令用暴力把工人从岗位上赶走；根据镇压工人的法律，我们受到了不合理的审判；西班牙政府毫无缘由地把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他们使用暴力——拷打、审讯、监禁——威胁和恐吓我们最优秀的领导人。他们用暴力禁止我们开会，而这些集会对于我们坚持下去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威胁把我们赶出家门，而房子是我们向公司买下的，还欠着公司的钱。为了瓦解工人的团结，他们做得最绝的是在比斯开宣布“紧急状态”、驱逐四十多名工人领导者、监禁数百名工人、搜查民宅和会场……这一连串的暴虐行为，将在本书中一一道来。

---

<sup>3</sup> 原文为巴斯克语“Egiak ezditu bi bide”。——中译者注

但我们胜利了。是的，在法西斯资本主义政权下，六百个家庭能够坚持一场长达 163 天的罢工，就是一场意义非凡的胜利。以下是我们复工当天，在传单上写下的内容：

“我们胜利了，是的，我们胜利了！尽管我们似乎是输了才不得不复工的。工人历史的空白页一如既往地是以红色的墨水——鲜血所书写的，而最优秀者的牺牲，则是为了促成工人运动的光辉篇章，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

应当承认，我们最终丢下了几位领导者，这算不上公平。在这五个半月的罢工中，我们高喊着“要么全走，要么全留”（TODOS O NINGUNO）的口号，与他们并肩战斗。怀着深沉的痛苦，我们把他们留在了外面。但情绪平静下来后，我们就会明白，假如我们继续团结在一起，互相扶持，我们本可以忠于这一口号。

另一方面，要是认为解雇就能让工人失去领导者，那就错了。不管是监狱、流放地，还是死亡，都不能打倒工人领导者。他们越是遭受迫害，越能激励工人不停斗争。除非他自己退出了战斗。此外，我们的事业不仅限于工厂的狭小边界，它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不论在班达斯还是哪儿，重要的是，为了反抗经济上的剥削，反抗社会、文化、政治压迫，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教训。整个半岛的工人阶级始终关注着埃切瓦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懂得，班达斯工人开辟的道路通向自身的解放。这就是我们满怀希望与自豪的重要原因。它使我们坚信，我们遭受的一切并不是徒劳的。有些人在重振旗鼓的工人阶级面前吓得发抖，煞费苦心贬低我们的斗争成果，但我们不会再次上当受骗了。

虽然我们的罢工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明白，这并不是完全的胜利。毫无疑问，我们也有失败的地方。虽然我们的抗争和战斗是英勇的，却未能充分团结起工人阶级，使它站起来反抗法西斯。从我们浅薄的观点来看，很难分析为何没有发生总罢工，至少在工人觉悟最高和最有斗争潜力的工业中心没有发生。的确，我们直接参与了这场战斗，所以我们可能并不是冷静和客观判断这些问题的最合适人选。我们是否在正确的时机发动了斗争，还是太过仓促了？我们是否完全发挥了自已的作用？工人组织对此是如何反应的？这些组织是出于真正的革命觉悟，真诚地加入工人的事业，还是只关注派别利益？它们的出版物关注这场冲突的哪些方面？它们评判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工人愿意跟随我们吗？

必须向工人阶级和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提出这种种问题。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本书中，我们将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而无意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去寻找根本原因。书中呈现的内容，代表着拥有共同想法和目标的六百名罢工者的思考。但当然了，我们中间还有政治思想各异或分属不同组织，以及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人。因此，我们不可能仅表达某一部分人的判断与立场。

这是我们的书，罢工的亲历者书写的书。不用说，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是的，怀着激情，我们希望记录下这 163 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全部的感受、希望、遭遇。我们试图忠于事实，忠于我们的事实。这些真相是坚实的，有时也是苦涩的。我们希望在书中揭露那些不为人知的暴行、无以计数的谎言、卑劣的野心与自私。但我们不在乎他们的丑态。因为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而写的。这本书写给我们的阶级兄弟，写给所有带着美好的愿望，真诚地想要了解人民、渴望走到人民中间、想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讲述罢工期间发生的基本事件。为了不  
把本书写成冗长的历史，必须略去许多事迹。但书中的材料，已经  
足够对发生的一切提供完整的全貌。

第二部分将考察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某些方面，使读者对这些  
方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本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是专门写给工人积极分子和大学  
生的思考，我们尽量把相关的经验成果总结在几页中。我们衷心希  
望，未来读者在研究和批判本章时，能够提出新的观点丰富它们。

我们希望把这本书，连同书中的一切，交给反抗资本主义及其  
最终形式帝国主义，为了我国人民、为了半岛各族人民、为了全世  
界受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着的人们。

1969年11月30日 埃切瓦里  
“我们的罢工”三周年纪念日



## 我们的罢工

Nuestra Huelga

1966.11.30-1967.5.17

巴黎Ruedo出版社，1968

# 第一部分 罢工的历史

## 我们的公司 它的特点 三年的斗争

班达斯冷轧（Laminación de Bandas en Frío (S.A.B. - A.H.V.)) 位于比斯开省的埃切瓦里（Echegarri），距毕尔巴鄂市中心四公里，毗邻圣塞巴斯蒂安的主干道。那里是内维翁河（Nervión）的流域。四百米远处是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S.A. Basconia）的旧址。

1955 年班达斯厂区动工前，这块约六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农户住房和菜园。如今，这片地区已经成为工厂，变成了内维翁河流域最重要的工业园区，约有两万名工人。当地汇集着西班牙凡士通（Firestone Hispania）、艾德萨（Edesa）、圣米盖尔纺织（Talleres San Miguel）、几内亚兄弟（Guinea Hnos）、普拉德拉兄弟（Pradera Hnos）、塞布拉斯蒂卡（Ceplástica）、帕克尔（Parker）、梅塔卡尔（Metacal）、巴斯科尼亚（Basconia）、圣安娜德伯卢埃塔（Santa Ana de Bolueta）等公司。

班达斯所在的土地归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所有。巴斯科尼亚与比斯开高炉各出资一半购置厂房设备。班达斯是合资开的，因为当年国家允许一家公司开发冷轧设备，另一家公司进口机械，而市场不够大，容不下两家工厂。因此两家公司决定合资建工业园区。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 比斯开高炉董事会

### 名誉主席：

维克多·查瓦里（特里亚诺侯爵）

阿方索·楚卢卡

### 主席：

胡安·德·阿吉雷

### 第一副主席：

佩德罗·卡雷阿加（卡达瓜伯爵）

### 第二副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珂

### 董事

埃米利奥·阿尔米尼奥拉

奥古斯丁·里奥那

胡安·安东尼奥·阿兹那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

威廉·克隆奇

诺曼·奥巴德

加布里埃尔·查瓦里

何塞·奥拉瓦里

何塞·马努埃尔·德尔克劳斯 马努埃尔·奥尔多涅斯

阿尔·埃博索尔

阿方索·阿尔卡拉·加里亚诺

佩德罗·加林德斯（皇家阿普雷西奥伯爵）

胡安·马努埃尔·冈达利亚斯 伊格纳西奥·萨图鲁斯特吉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

查尔斯·施瓦茨

罗伯特·格雷厄姆

胡安·安德烈斯·马尔多纳多

菲利普斯·霍金斯（比利亚贡萨洛伯爵）

恩里奎·伊瓦尔维亚

何塞·玛利亚·祖比利亚

格雷高里奥·伊瓦拉                      何塞·马努埃尔·祖比利亚  
威廉·郎（祖比利亚伯爵）

**秘书长：**

胡安·玛利亚·戈亚罗拉

**执行委员会：**

**主席：**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等七名委员

**经理：**

费尔南多·塞拉诺

恩里奎·加西亚·拉马尔

##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珂

**董事**

卡西尔达·安普埃罗（圣费尔南多·德·巴雷拉侯爵夫人）

华金·加丹·德·阿拉

路易斯·米奥塔

恩里奎·莱克利卡

佩德罗·安普埃罗

何塞·冈达利亚斯

埃斯特万·莫兰

费尔南多·龚德拉

**秘书：**

路易斯·艾萨卡

自 1962 年以来，巴斯科尼亚持有班达斯 66% 的股份，因此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拉苏尔特吉（Fernando Gondra Lazúrtegui）以一种直接又特殊的方式，掌管着我们公司。他的职务如下：

巴萨乌里有限公司主席  
莫雷诺里奥哈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农具有限公司秘书  
航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北方白云石有限公司董事  
内维翁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制铁（梅塔卡尔）有限公司董事  
西班牙电解炼铁公共事业公司董事  
纳瓦拉海泡石有限公司董事  
毕尔巴鄂银行董事  
洛芙拉铁路公司董事  
萨维罗煤业及附属有限公司董事  
特科那顿有限公司董事  
金板（西班牙）有限公司董事<sup>4</sup>

---

<sup>4</sup> 《董事会及理事会数据》（Datos del Directorio de Consejeros y Directores），Dicodi，马德里 1965 版，第 143 页——原注

## 资本：来源、走向、收益

班达斯的建设成本是多少？这家公司现在市值多少？谁为它出的钱？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变法则，班达斯就是工人们为少数人的利益用血汗筑成的。在内战后的几年里，直至 1958 年“稳定计划”开始，钢铁生意都相当红火，这首先要归功于铁的黑市。

以巴斯科尼亚的总经理龚德拉为例，算下来，他每年能把三千万比塞塔收入囊中。与所有的钢铁生产商一样，巴斯科尼亚对每公斤出售的铁都会“回手”补贴，如此可以算出，班达斯每年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数十亿比塞塔，利润也是天文数字。但这又和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有什么关系呢？

多年来，工人拿着填不饱肚子的工资。公司到头来还要解雇我们，赶走老的和“没用”的。在 1962 年的巴斯科尼亚罢工中，大家发现有 212 人的年收入少于两万两千比塞塔<sup>5</sup>，这可是年收入！正是这些工人以辛勤的劳动，在破旧不堪的厂房里创造出了巨额利润。为了淘汰工人，1965 年公司强制退休了 315 名工人，同时政府还批准了公司的“危机方案”，允许它开除了九百多名工人。

除了董事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十亿比塞塔，很大一部分存在了国外银行）和股东们永远丰厚的红利外，巴斯科尼亚还通过变相投资建立了庞大的准备金和秘密基金。1959 年，它进行了二次发售，股东每持有一股旧股可获得三股新股。它还投资了十多家公司，而且都占股一半以上。

---

<sup>5</sup> 参考比塞塔兑美元汇率，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几乎等值于今天的人民币（2020 年数据）。公司的财富和工人的收入，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应该是相当直观的。见 <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中译者注

比斯开高炉的情况也类似，虽然这家公司的超额利润似乎都凭空消失了，因为多年后发现，它无法翻修庞大老旧的设备。

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约二十五亿比塞塔。班达斯的净值日后大幅增长，远远超出了这个数。为了估价，我们可引用最近几年公司采购的设备价格的近似值<sup>6</sup>：

电解镀锡生产线·····	190.000.000
两台热镀锡机·····	40.000.000
九台退火炉·····	30.000.000
扩建酸洗设备·····	30.090.000
布利斯车床·····	170.000.000
（辛辛那提）磨床·····	12.000.000
镀锡铁分选机·····	5.000.000
镀锌生产线·····	220.000.000
表面冷轧设备的厂房·····	85.000.000
总计·····	782.000.000

必须牢记，大部分费用是由未分配的超额利润支付的。

巴斯科尼亚因为产品质量低劣、无法遵守交货时间和交付数量等等，常常搞砸商业订单，所以班达斯对它非常重要。班达斯算是旧驴卸下石磨待宰前，等着换上的新驴。但班达斯的经营活动只占比斯开高炉的商业活动的不到 10%。因此，当巴斯科尼亚在 1962 年恰逢其时地收购了高炉的 16% 股份时，在班达斯的占股达到了

---

<sup>6</sup> 译者不太熟悉轧制设备及原材料等名词，翻译时经过多番查找，希望能避免错译。——中译者注

66%，高炉占股则为 33%。通过这项收购，巴斯科尼亚接过了班达斯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商务官等职务。

班达斯于 1959 年中开工生产。它的生产范围包括冷轧板和冷轧带钢、镀锡铁皮、电解薄钢板和镀锌板。它是（伊比利亚）半岛市场上唯一生产这些材料的生产商，冷轧板除外，因为 1966 年后，恩希德萨（Ensidesa）也开始生产冷轧板了。我们都知道垄断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垄断能产生多少利润。

根据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班达斯的年产量（1764 年数据）如下：

冷轧金属板·····	135.000
镀锡铁皮·····	50.000
电解镀锡白铁·····	60.000
镀锡金属板·····	45.000
总计·····	290.000 吨 / 每年

（这些数字尚未完全核实，但可以作为参考）

这意味着销售额达到了近四十亿比塞塔。每吨的平均成本价格约为一万比塞塔，所以总成本不会超过三十亿比塞塔。为了估算利润，只需要做简单的减法就行了。现在不难理解，在大量钢铁生产商蒙受亏损的那些年里，巴斯科尼亚是怎样扩张、快速推销、偿付贷款，同时又保持利润的。下表中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公司名称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比斯开高炉			11	10	6	0	0	0	0
杜罗 费尔盖拉	12	9	10	10	7	4	0	0	0
巴斯科尼亚	30	14	14	14	12,5	12,5	12,5	12,5	10
圣芭芭拉	8	8	8	7	7	0	0	0	0
埃切瓦里	13	12	11	14	13	12	12	12	—
锁业联合	21	19	18	18	16	15	14	14	—
(取自 1965 年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									

看来赚到钱的不只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

### “全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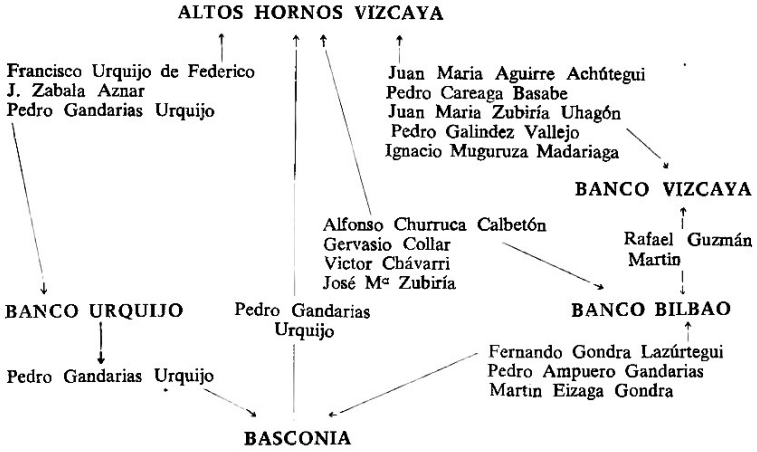
如今，在半岛上有七家大型银行：中央银行、西班牙信贷银行、乌尔吉珂银行、西班牙美洲银行、桑坦德银行、比斯开银行、毕尔巴鄂银行，它们以直接的方式，或通过在其其它银行的共同董事，实际控制了全部现有财富。

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因为这些银行在名副其实地管理国家的全部金钱。公司为了获得投资用的资金，就要向银行请求贷款，因此受到它们的绝对控制。

这种依赖关系导致七家大银行的一百五十名董事，同时在各行业龙头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石油行业 27 名；电力行业 43 名；水泥行业 38 名；化肥和化学品业 25 名；制糖业 8 名；钢铁业 37 名等。

至于我们埃切瓦里公司的所有者，也就是比斯开高炉和巴斯科

尼亚有限公司，也早已跻身大银行的全能家族了。下图展示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共同董事的关系链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紧密的关系使两家公司的所有者可以轻易获得需要的财务支持。当然了，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了。

### 金钱掌管政治生活

然而还不止这些。这种经济力量也完全支配着当前的政治体制。这就解释了为何近几年，上述公司难以为继的时候，政府一再站在了少数人一边，不仅动用镇压机器，还向人民滥收苛捐杂税，尤其是加重最穷苦人民的负担。

通过所谓的“协调”，钱从社会转到了资本家手里。同时按照公司和政府的协定，国家向它们发放了总计数十亿的贷款。例如在1965年，比斯开高炉获得了43亿比塞塔的贷款（在十五年内偿付）

用于设备的现代化改造，最近巴斯科尼亚也拿到手 5 亿。

迄今为止，现政权已经向钢铁业提供了超过 450 亿比塞塔。

此外还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包括美方的贷款、美方参股比斯开高炉 28% 的股份、从美方进口冷轧机械设备的优惠条件。

但是，剥削者的实力和盟友还不止这些。1907 年成立了一家协会，叫“钢铁业贸易中心”，1940 年后改称“钢铁业中心”，由众多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的公司组成。它的成员享受的好处有：一，产品制订共同价格。二，获取订单，根据成员的分工和产能分配订单。三，最重要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此维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或者在必要时新设或提高关税，避免一切可能更大的竞争。

它的董事会中有十一家钢铁公司和相关产业的代表，总共二十六人。其中就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的代表。

为了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西班牙国家的政府部长卡米洛·阿隆索·维加<sup>7</sup>也在“钢铁业中心”担任职务。

这些介绍是为了使我们对半岛上的剥削者有些浅略的认识。

我们的罢工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某家公司的孤立战斗。权力与财富的集中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实质，工人阶级在我们的罢工中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对于资本的力量和它伸进社会中的手，我们只做了简要回顾。

现在该谈谈我们班达斯的工人，还有我们短暂却意义重大的历

---

<sup>7</sup>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Camilo Alonso Vega，1889 年 5 月 29 日——1971 年 7 月 1 日），1907 年入伍。1934 年参与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1936 年内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7—1939 年任纳瓦拉第 4 师团司令，期间晋升为准将。1939—1940 年任陆军军事教育总监。1943—1955 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57—1969 年任内政部长。1959 年转入预备役。1969 年退休。——中译者注

史了。

## 我们创造的财富

如上文所述，这家工厂于 1959 年年中开工。那时只有七十名工人。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 1960 年初，车间和办公室职工、技术人员加起来达到了五百人。到了 1962 年，厂房新增的设备需要人手，但我们人数还是维持在七百人上下。工种的大致分布如下：

车间工人 .....	560
办公室职员 .....	70
专家、工程师等.....	70

我们的背景如下：七成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按人数比重的排序是：布尔戈斯、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莱昂、莱万特。另外三成来自全国其它地区。<sup>8</sup>

## 我们的收入

到了 1962 年，我们的收入只够得着最低标准，顶多加点微不足道的奖金。所有收入加在一起，平均每月不会超过两千五百比塞塔。1962 年，公司经理胡安·艾罗多伊签署了第一份，也是唯一

---

<sup>8</sup> 看来新资本主义会做“技术”安排——也就是工人来历的“多样性”——的说法是真的，他们认为这样能阻碍工人的团结。——原注

一份公司的集体协议。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直接控制公司所有的重大经济事宜（线材的进货、销售、财务、会计），作为补偿，艾罗多伊在预算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我们认为，归他管的东西就和工资预算一样微不足道，不会超过总开支的 4%。

在这份协议中，工资和奖金相比以前提高了。比方说，法定最低工资是 36 比塞塔，而小工的工资定到了 71 比塞塔。奖金（后来成为了冲突的直接原因）在工资中的占比开始提高，（假如按最大产量计算的话）大约有 40%到 70%。随着这种制度的建立，公司订下了荒唐的指标。为了提高产量，公司还频繁抬高指标。就拿小工来说吧，1962 年那会儿，小工每月大概能拿两千两百比塞塔，按照工作量还能拿八百、一千、一千二比塞塔的奖金（后来随着工资增长，奖金也相应增长，成为了我们收入的基本部分，但随意克扣奖金的情况也严重了）。除了收入上的变化外，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标准（所谓“能者多得”的分配方式）把每月产量和工资挂钩。我们通过它到手的数目大概占了我们总收入的 20%到 35%。当然了，由于我们的过度劳动提高了产量，公司才是最大的获益者。

这份协议于 1963 年 7 月到期。到了 10 月，公司开始新的劳资谈判时，艾罗多伊已经不是班达斯的经理了。

巴斯科尼亚（当时已持有班达斯 66%的股份）任命董事会成员米奥塔担任我们公司的新代表。虽然当时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还没上任运营经理（这才是掌握实权的位置），此人已经是龚德拉的真正代理人了。

在资方和公司代表团的会谈中，希斯内罗斯表现出了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用老办法拖延谈判时间：要求提交更多的报告、修改提案、重新答复、重新研究……最后，

大家都觉得协议马上要签下来了，希斯内罗斯却说公司一分钱也不掏。龚德拉心意已决，才不签什么合同。本来应声附和签协议的专家们也俯首听命。说实话，考虑到公司不给我们应得的增产奖金，拒绝了工人的各种要求，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然后在 1964 年 5 月，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罢工，为期十五天）。

其实巴斯科尼亚另有打算。公司换了一套作风，觉得工人以前工资太高了，开始莫名奇妙削减我们的收入。

他们玩弄计件工资的标准——这一标准完全由他们制订，而且不容置疑——减少我们的到手数目，直到分文皆无。

因此，尽管 1964 年 8 月劳工代表团（la Delegación de Trabajo）颁布为期两年的《强制性规定》（la Norma de Obligado Cumplimiento）后，我们的工资增加了 16%，实际到手却减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由于新的工资制度，我们的工资会减少 20% 到 30%。二，16% 的工资增长仅仅弥补了生活成本的提高。

随后在 1965 年 8 月，根据上一年度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对工资进行了新的调整。《强制性规定》给出了新一年的规定。由于公司拒绝接受比斯开高炉指示的增长率，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局面后，公司决定工资提高 15.3%。

这里鲜明地反映出，我们在 1966 年的实际收入要低于 1962 年。因为产量大幅提高，我们的工作量也同比例增长了，而假装我们没多干活，不给奖金，等于不折不扣的掠夺。

除此之外，资方还不承认许多工人的专业职称、拒不支付奖金、不顾工作环境有毒有害、增加无偿的工作量等等。



## 人员管理

以上是工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恶化，还要更厉害。

在艾罗多伊任职期间（当然剥削制度没变），公司施展“人道主义”手腕，于劳资之间营造“和平”关系。艾罗多伊（在他的脑袋里）希望公司上下都处在“和睦”当中。为此，他使用了新资本主义的伎俩：工人也能通过生产得利，公司向员工公布经营情况，采用弹性工作纪律。他不让工头严厉管人，反而要求善待工人。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我们在资本主义最底层位置仍然没变，无论这个资本主义是野蛮还是“文明”的。

随着艾罗多伊离职和米奥塔上任，情况开始变化。我们的收入逐渐减少了，同时人员管理方面也开始变糟。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来之前，我们主要受经济上的压迫。他一当上运营经理，警察制度就深入到了公司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那时起，公司对工人的要求置若罔闻。不管犯了什么小错，都要不公平地严厉惩罚工人。为了打破剩下的希望，他们无视了许许多多的申诉。部门负责人拒绝签署提交给他们的申诉副本，叫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提出了申诉，或是要求得到答复的期限。

提交的抗议和申诉少说几百份，还没算上大量的法院裁决。

下面是一些仍未解决的工人诉求：

###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enlace）代表电气维护部签字  
鉴于：

根据劳工代表团与审议委员会批准的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我方要求引用第 29 条：

第 29 条：“工作量评估的审查”。对于不同工作的劳动价值，应当在评估中视情况决定，例如：

- 甲. 机械化程度
- 乙. 操作方式
- 丙. 影响疲劳程度的条件
- 丁. 工作量及其它

公司的设备增加了 62.2%，而维护人员减少了 60%，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公司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引用上述条款进行评估。

#### 技术数据：

自 1962 年以来增加的设备。

第二套表面冷轧设备。

布利斯车床。

磨床 55 台。  
热镀锡机器 2 台。  
镀锡电解制备生产线。  
镀锡电解生产线。  
再分拣生产线。  
镀锌生产线。  
起重机（C/A） 5 台。

1962 至 1965 年

15 台工厂设备

28 名正式电工

1962 至 1965 年工人类别

一级工 10 名

二级工 15 名

三级工 3 名

1966 年

24 台工厂设备

21 名正式电工

1966 年工人类别

8 名

4 名

9 名

签名

### 致省劳工代表先生

尊敬的先生：我们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谨代表班达斯冷轧电器维护部、电力部、总维护部员工，

鉴于：

1964 年以前，公司为了大修，会安排员工休假，在夏天进行三轮（以半个月为一轮）的设备停车。

期间，我部门都会投入全面维修，而公司为我部门员工提供最

高额奖金。

但自 1965 年起，在没有事先告知我方代表团的情况下，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和效益，停发了我部门的奖金。

因此，现在根据机器停车的时间以及管理部门指示的日期，在全年里的各时间段进行设备维修。

由于上述原因，我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减少了。

经我方代表团提出正当要求后，公司承认我们有权得到补偿金。

公司给出了大致金额，承诺每六个月发一次，我方代表团同意了。但是半年后，公司并没有给钱。

无故拖延四个月（此事引起了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两个小时的停工），公司同意支付一笔钱，数目与先前商定的相近，同时称我们的要求是不合规定的。

代表团表示从没听说有哪门子规定，公司不早答应给补偿了吗。

双方同意研究尚有争议的规定。但公司没有遵守承诺，还强行拍板，只给我们原定金额的 46%。

又过了半年，此事仍未解决。公司代表团和工人达成一致，不接受资方随意打破约定，公司必须支付原定的补偿金。

因此，我方要求您承认我们的权利，责成公司发放原定的金额，或者恢复到与 1964 年相同的工作制度。

上帝保佑您健康长寿。

签名：公司代表团

###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签名人为镀锡车间员工。

本文是为紧急告知公司管理层以下内容：

此前，本车间同其它车间都配备可靠专业的辅助工。

但去年 7 月 12 日以来，公司告知这一岗位取消（已经执行），迫使我们把原岗位的工作分配给剩下的同事。

这项指令违反了《钢铁业工作条例》中关于职务的内容，以及集体协议中相应的条款。因此我们声明，我们不会接受原本属于辅助工的工作，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求恢复这一独立岗位。

我们要求公司管理层解决我部门人员不足的问题，不得随意撤销岗位，立即填补人员空缺。

假如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将上报主管机构。

谨此致谢。

1966 年 7 月 14 日

### 致电气维护部总工程师先生

鄙人自 1965 年以来一直担任高级职称的电气维护部电工助理。根据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第 89 条，我要求重新评定我们的职称，一并下发拖延至今的工资。

66 年 9 月 26 日于埃切瓦里

### 致冷轧公司代表团

签名人为平整机设备部门员工

**鉴于：**

我们希望复核职称评定，因为设备经过了改动，因此操作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还要求复核生产奖金。

同日，我们已告知部门的总工程师先生，但他不想负责此事。因此，我们已履行合规程序，

**故我们请求：**

告知管理层我们希望职称评定通过，以及下发生产奖金。

谨此致谢。

66年10月26日于毕尔巴鄂

###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

因工人提出大量要求，为履行职责，我们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致公司代表团：

工人们对象现任社会秘书处负责人卡尔巴乔先生的态度深感不满。他的诸多行为危害了公司工作安全，尤其是在工作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他的态度极其随意，违反了1963年11月25日省劳工代表颁布的《内部规章条例》（el Reglamento de Regimen Interior）中的条款，其中第十四章第220条对饮酒做出规定：“禁止在工作场所中饮用任何超过半升以上含有酒精的饮料”。

对于省劳工代表所颁布的上述条例，工人们未得知有任何变动。但有几次，几名工人把不超过半升的红酒带进工作场所，公司扣了他们几天的工资。而在公司食堂里，工作时间为早八点半至下午四点半的员工却可以在就餐的半小时里无节制饮酒。也就是说，遵守制度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公司又允许工作时间随便喝酒。

出于两个原因，公司没有同意代表团有关完全禁止饮酒的要求：

(1) 未经劳工代表批准，不得修改《内部规章条例》。

(2) 即使上述事实使规定（禁酒）成为一纸空文，实行禁酒也只损害了轮班工人，而不影响在正常时间工作的人员，这表明公司以“安全考虑”为由处罚工人是不严肃的。

若“工作场所”仅理解为车间，不包括食堂，那么卡尔巴乔先生在更衣室拿走工人阿隆索先生一瓶红酒也属于越权行为，因为更衣室在车间外面，跟食堂一栋楼。而在食堂的就餐时间内，他也会随意没收大家正在喝的红酒。对于上述情况，工人要求代表团：

(1) 抄送本文致省劳工代表。请省劳工代表先生：

要求管理层遵从《内部规章条例》第 220 条规定的内容，且对员工一视同仁。

(2) 对于卡尔巴乔先生一再违反现有规定及滥用职权的情况，应当采取《钢铁业工作条例》的惩戒措施。

(3) 公布公司代表团通过的决议，以便员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此事上的责任和义务。

谨此致谢。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

1966 年 6 月 10 日

### 致车间部门首席工程师先生

金属板车间员工致先生您

鉴于：

如您所知，一年半以来，我们一直要求改动某些控制装置，把

宽度为 3.8 mm 的线圈减少 0.6 mm 或以下,因为减少宽度能让控制装置的效率达到最高,或者至少接近最高效率工作。

因一年半都未调试装置,我们的奖金蒙受了损失。因为这一装置上的改动适用于镀锡板生产设备,且仅用于这个目的。它能使我们更得心应手,工作更高效。

近期,绕线机输出的电流减小,这意味着中央电机要输出更大的电流,使转速降低了。机器一直没修,导致我们的奖金减少了。

因此,我们要求在三十天内解决上述的异常状况。若得不到立即答复,也没有收到我们同时要求的代表团报告,我们会要求工会和劳工代表,请他们派专业人员检查我们的控制装置。

66 年 10 月 28 日于毕尔巴鄂

回头来看人员管理和经济上的某些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在困扰我们:

1966 年的几个月里,应我们一个小组的要求,工会联络员检举我们的同事在一些装置上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三班倒减少一班之后,工人们变成两班倒。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人也累得半死。劳工监察员来公司巡视的时候,总是有管理层陪同。他告知我们的代表,马上就拟定禁止违反工作时间的规定……但十二小时轮班制仍在实行着。

退火部门的全体工人还向劳工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殊途同归。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毒性气体超标的环境下工作,想得到补偿。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家公司里,无论筹集资金还是投入生产,都会经手天文数字般的钱。由于工作设施的特点,工伤特别多,往往还很严重。但

搬运伤者的救护设备只有一辆旧货车，同时还用来运货。这破车的保养奇差，要发动几次才能开。公司的医务室也是用巴斯科尼亚留下的，因为我们公司（班达斯）才不在乎工人呢。

如果说在本章的开头，可以看到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多么轻易向我公司投入了资本，这家子公司又如何“精明地”把利润转移给两家母公司，现在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随意地把巴斯科尼亚的工人调到班达斯，对我们又造成了多少麻烦和损失。

为了调动工人，公司会“同意”我们三个月的例假，当然没人要求过休假。接着我们来到班达斯工作，像新人一样，先试用了三个月。公司要求一些人签署三个月的第二期合同，上面写明，由于我们在第一期试用中干过各种岗位（当时都是管理层自说自话安排的），导致无法评定职称。假如我们最后转到班达斯工作，就将失去在巴斯科尼亚包括工龄在内的所有资历。而且他们没结算工资，就把我们从巴斯科尼亚的花名册上划掉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公司甚至还复印了许多放假三个月的通知。

就像这样，他们一有可能就随意差遣资本和人力，而不管是否损害到工人的权利。这两样说到底就是工具罢了。

渐渐地，这家公司变成了地狱，压迫变得难以想象。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干什么都要受罚。公司和劳工代表团之流勾结在一起，为所欲为。他们做什么都能逍遥法外，简直肆意妄为。毕竟，班达斯的工人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 我们斗争的三年

从上面的情况不难看出，工人的觉悟在不断提高。

如果说班达斯工人掉进过资本主义的陷阱（它以较温和的方式掩盖了剥削的实质），那么很快我们就会有机会看清现实。

1962年，罢工从巴斯科尼亚蔓延到了整个比斯开，但我们还在照常上班。或许当时我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无关，我们较优越的工资足以保证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艾罗多伊走后，公司完全落入巴斯科尼亚的掌控下，上述立场的弱点彻底暴露，我们完全任由公司摆布了。

我们这才醒悟过来。从根本上说，工人不该为了相差无几的比塞塔互相咬，必须坚定地、一点一点地组织起来，走向反抗压迫制度的斗争。为此，我们必须在厂里建立防御的手段，从这一点出发，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加入为实现工人权力而展开的共同斗争。

1964年5月起，我们真正组织起来了。为了抗议公司拒签新协议，我们罢工了十五天。

这些天里，我们选出了最初的工人小组，它将在接下来几年里不知疲倦地工作。从新生的团队中，涌现出了新的领导者。他们恪尽职守，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随着管理层施加了更多的压迫手段，我们的抗争也逐步深入。到了1966年5月，蛮横又癫狂的阿方索·卡尔巴乔·拉卡萨律师当上了人事主管，此人对员工的压迫简直变本加厉。

1965和1966这两年里，为了抗议不公正对待，我们多次停工数小时。有一回，为了留住公司解雇的一名同事，我们停工了二十小时。

工人们一天比一天团结，经验也更丰富了。

1966年夏天，我们在厂里搞了几次集会。经过一系列讨论后，

我们决定参加工会选举，通过公司代表团把合法性与“地下”斗争的策略结合在一起。在公司代表团和工会联络员的选举中，我们最优秀的领导者当选了。当时是 1966 年 9 月。

在十月和十一月期间，管理层的态度更加强硬，想罢免刚当选的代表们。罢工前举行的几次代表团会议都预示着冲突加剧。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参加了 11 月 15 日的会议。在二十分钟里，他都在大谈他们打赢的那场战争，还暗示：“我们都希望以后不需要再来一场 1936 年”。此外，他还声明“公司一分钱也不会掏”，然后就走了。当天会议上，他“拐弯抹角”地提了两点：

“... ...要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形势，还要考虑到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代表团的作用很重要，它的任务不仅是支持工人的要求，还要向公司提出适当的建议，比如怎么提高产量、改善产品质量、提升现在的工作流程、节约材料、减少浪费、更好地利用原材料、再利用工业废物、提高工作效益指标、保养机械设备等等... ...我得说，代表团在这方面的建议很少。他们还让管理层更加担忧，因为他们提的要求只会增加运营成本，从不关心怎么提高产量和质量。这种要求管理层一概不答应。”

罢工爆发前几个月，劳资关系剑拔弩张。有时候，大家的情绪快要爆发了，但领导者试着说服大家，发动孤立罢工有风险。我们对前几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公司迅速粉碎了孤立的罢工，开除了带头工人。这使我们静下心来等待更关键的时机。

另一方面，我们也尝试参与整个比斯开省层面的行动，本地工

人组织都在互相协调，让工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我们将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重大斗争，实现以往想都不敢想的诸多目标。

###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之前的一切，都为罢工做好了铺垫。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管理层对工人收入减少和厂里的监狱制度还不知足，在 1966 年 10 月开始推行降低生产奖金的全面计划。这项计划是新上任的工控部门负责人工程师乌鲁蒂亚发起的。他带着年轻技术官僚的头脑、虚荣心、贪得无厌的野心，刚来公司就“考虑”修改奖金的比例。这样做，不但能证明他的“科学头脑”，还能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对于大多数专家——驯服的、私欲薰心的资本主义奴仆——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一如既往，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争取任何人的同意，甚至不用费心征求劳工代表的授权，因为他们知道，劳工代表从不会要求任何说明。因此，他们系统性地减少了各工种的奖金。受影响的工人再次抗议，但没有得到书面答复。公司只是口头告知，还是不接受工人的要求。既然不受约束，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继续逐步推进计划。在热镀锡工之后，轮到了电镀锡工。电镀锡的机器是厂里最现代化和最高性能的设备，这些同事的奖金少了快一半。他们的要求无人问津后，决定在 11 月 14 日停工一小时。停工刚开始，那个该死的劳工代表团的监察员萨利纳斯就赶过来。他对公司的可耻干涉闹出过各种乱子，害得以前的公司代表团集体辞职。他跟平

时一样，又一次威胁了工人，而没有解决冲突的要害。

当时，公司已经克扣了金属板轧制车间的工人一个多月的奖金，每人一个月要少拿一千比塞塔。10月28日，他们写了最后一份声明（甚至都不想盖章），要求复核他们的工作量，抗议削减奖金，但是石沉大海。因此，他们决定用勉强达标的最低效率工作，从11月中旬就开始这么做。没过几天，为了提高产量，车间部门的工程师卡佩拉斯特吉亲自上阵，叫手下通过强制和威胁，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管理人员一直待在车间里，想挑出可以借题发挥的毛病。工程师本人也经常让人猝不及防地在车间冒头，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所以全厂都管他叫“值班老鼠”。他每次出现，都会一通威胁工人，暗示要开除工人，不过要看工人之后的表现。他这么做，尤其是向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施压，让他们脱离工人的集体行动。这是管理层的老办法了。有些说好不加班的时候，卡佩拉斯特吉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一个一个从我的办公室走过后，都在说些啥”，他就这样不断折磨着软弱胆小的人。总之，这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法则：你越是软弱，受的剥削就越狠。

局面有时千钧一发。关于其它车间和工种也会减少工资的流言不胫而走（后来工控办公室里的同事证实了这些消息），大家心里都绷着弦。到了月底，大家觉得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决定。

## 11月28日的声明 公司和当局的反应

我们一群代表在11月27日星期日举行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假如再不采取特别的反抗，工作条件就会叫那些可恶的家伙无止境

恶化下去。我们认为，不制止日益加重的压迫的话，公司还会变本加厉。其实这场会议没有决定罢工，而是在 1962 年 9 月 20 日法令的允许范围内起草了一份声明，敦促解决奖金减少的问题。这份声明在 1966 年 11 月 28 日一早发出，上面明确表示，如有必要，全厂都将罢工。声明内容如下：

### 埃切瓦里冷轧公司代表团

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与胡里奥·埃拉斯·马  
丁

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致管理层

鉴于：

受金属板轧制车间三个工作小组的委任，且作为其中一员，对于发生集体冲突一事，我们有责任告知代表团、管理层及主事劳工组织，如果仍未解决引发问题的原因，我们宣布将在下个星期三停止生产。

以下简要说明工人宣称的引发问题的原因，同时为真实性提供证据。

金属板车间的工作奖金，是几年前根据生产速度和加工材料的种类等条件决定的。

公司多次要求我们在中央电机以更快速度运转，即机器转速更快的情况下工作。结果产量增加，因此工作量增加，但公司从来没有给我们付过奖金。

由于强行以过快速度运转，电机损坏严重。电机进行维

修后，现在必须按低于限制速度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管理层：

(1) 在机器运转速度增加，从而产量和工作强度提高时，没有增加奖金。

(2) 由于上级的原因，例如命令让机器超过最大限制速度运转，导致了机器故障，却扣除工人的奖金。资方一如既往，没有通知受影响的个人和公司代表团，也没有依照《国家工业条例》（la Reglamentación Nacional para la Ind）第 46 条向劳工代表提出审核的要求。

工人提出了合理的抗议，但问题没有解决。

以下事实使问题更为严重。

工人们从来没有记录工作量的表格。奖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了骗局，因为根据《国家工业条例》第 45 条，“应当以清晰简明的方式记录数字，以便毫无困难地计算出每位生产者的报酬”，以及公司集体协议中更详细的第 31 条，最后是《内部规章条例》第 86 条。14 日，工人要求公司提供表格，但毫无回音。

由于无法事先算出用不同材料进行生产的相应速度，工作安排就要拖延好久。因此，工人们几天之后才能知道他们正在干的是什么活计。这种滞后造成了许多冲突，因为工控部门里没有人协调工作。管理层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毫无补救的意思。

公司不公平地减少了奖金、工人付出的更多劳动没有得到补偿，因此我们放慢了工作速度。

金属板车间的工人从未使生产效率低于最低标准。而按

照最低标准安排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事先算出最低产量及对应的生产效率，但由于缺少计算必要的要素，在计算时又是不可能避免错误的。

最近几天，公司采用有辱人格的方式监视工人，口头上强迫工人用最高效率进行工作。这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违反了集体协议中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劳工部于 1962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有关集体冲突的法令规定，

我们要求：

若今天上午，管理层没有当即与代表工人的联络员和代表团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我方将向劳工代表团提出仲裁，要求管理层必须：

——根据以前的计算方式支付奖金。——提供产量的数字，按照集体协议第 24 条的规定执行。——工作安排最迟不能拖延三天。——尊重员工，惩治滥用职权的行为。

谨此致谢。

66 年 11 月 28 日于埃切瓦里

签名：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签名：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66 年 11 月 28 日于埃切瓦里

模糊不清的签名

说实在话，假如劳工代表团真是一个监管劳动标准遵守情况的机构，真的有仲裁和调解的作用，那它当天就该召开会议，立马解决问题，避免冲突。但不要忘记，班达斯工人早有铁证表明这个组织首先是政治工具，和其它政治工具一样，不过是把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压在工人身上。因此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公正办法，而是压制工人在声明中的坚定立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或许正因这一点，直到 29 日下午，它才召集了公司代表团举行特别会议。这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工人的决定不受重视。

鉴于官方 28 日的沉默，29 日上午，几名公司代表团成员上了劳工代表团的办公室。劳工代表伊波拉接待了他们。工人们表示，他们担心管理层没有及时递交工人声明。伊波拉表示收到了声明，然后又是一套套要为公司和“大局”考虑的说教。工人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羞辱，空着双手，怒火满腔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召开了工人要求的特别会议，开了大约四个小时。从会议记录中就能看出管理层的虚伪态度，而萨利纳斯监察员又完全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196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切瓦里召开公司代表团特别会议，本次会议在卡洛斯·卡尔巴乔主席先生主持下进行。副主席 D·卡洛斯·菲利皮尼，会议秘书 D·埃梅特里奥·古铁雷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有德尔·巴里奥、佩雷斯、卡乔、罗德里格斯、埃拉斯、费尔南德斯、拉米雷斯、帕雷德斯、冈萨雷斯、迪亚斯、莫亚。

主席开场说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目的，即讨论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和帕雷德斯先生提交的声明。会议上宣读了声明。

主席认为声明含有威胁的意味，因而公司不打算采纳声明中的意见。主席指出，工人申诉需要遵循合法的方式与程序，例如逐级向上申报。先向公司上级反应，再向公司代表团反应，若仍无法解决，再向劳工代表团反应。

埃拉斯先生提出，这份声明遵循了程序，因为约一个月前，金属板车间的工人除了在各场合口头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以外，还写下了这份声明提交给部门负责人，但至今仍未得到回复。

主席认为，如果声明没有得到答复，那一定是因为它还有待研究，但主席不准备采纳它，因为声明中含有不合规定的内容。

… …

代表团成员（埃拉斯与帕雷德斯）提醒主席，酸洗车间、电解镀锡车间、热镀锡车间的员工、第2和第3车间的全体工人以及捆扎机操作工都在等待答复。他们还告知主席先生，工人反复要求统计员工工作量的表格，这是计算奖金数额必须的，但公司至今也没给出表格。

鉴于主席无心处理此事，代表团成员提议向劳工代表递交书面声明。主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劳工代表团，此外劳工监察员马上就到场。

劳工监察员先生到场后，主席表示公司愿意同抗议的工人对话，若没有达成一致，此事就交给公司代表团处理。若达成一致，此事就交给劳工代表团处理。

代表团再次提出反对，因为公司在这些程序和审议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

劳工监察员先生采纳了代表团的说法：工人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交了书面声明，但尚未得到答复。监察员表示曾与管理层沟通过，也向部门负责人口头转达了工人的意见。他补充说，公司方面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因为工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

提出这份声明的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先生坚持说，他的确提交了书面意见，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对于这份文件，即本次会议召开的原因，监察员指出声明中语带威胁，建议撤回这份声明，另用表述重新起草一份，公司会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研究。

代表团成员认为不应当由他们，而应当由委托他们的工人作出相关的决定。

会议议程结束，18时30分会议闭幕。”

签名：主席 秘书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会议如此这般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我们的代表不断遭受压力，他们还是拒绝收回这份声明。

公司代表团回到了宿舍。大家得知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很多工人都盼着接下去做点什么。

——“他们成天想办法逼我们干活，这怎么受得了！现在要是让步，以后还不得让他们骑到头上！肯定要跟他们干的，我们就干吧！现在已经没啥能失去的了！谁还看不明白，没别的路可走了！”工人们做出决定：11月30日早上六点，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固执

与傲慢再一次耗尽了工人的耐心。而这一次，管理层得到的教训将超出众人的预料。他们将为接连压迫和顽固不化付出高昂的代价。



## 罢工开始了

头两天里，所有部门都停工了。局势不断发酵，但我们的办公室同事（以及所有管理层）还在工作。焦头烂额的管理层接连找来代表团，要求向工人施加压力。这当然是徒劳的。

第一天里，每个人都收到了信，信里扬言要解雇和停发工资。他们发出威胁，叫我们回去干活。这 163 天中，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难以置信的威吓与胁迫，正是从这份信开始的。

十二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公司的各个角落张贴了告示，宣布：要是我们继续停工，就要下解雇通知。解雇通知发下来的时候，大伙都拒绝接受。

从一开始，大家都团结起来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只有了解了前三年发生的一切，才能够理解它。也就是说，在成千起小事中，工人在各自问题面前团结如一人。我们当中逐渐涌现出一群领导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委托他们组织行动、会议、集会，收集每周的钱款等等。像这样，工人建立了真正的同志情谊。对于我们的日常斗争来说，这次罢工是意料之外的。在残酷无情的压迫面前，我们时常束手无策，我们曾悲观过。谁又能告诉我们，这将是三十年来最漫长、最英勇的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战斗！

罢工第二天晚上十点，发生了值得一提的事。公司最先解雇了下午两点一班的同事。他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辛劳建起了这家工厂，这好比是他们的工厂。工人决定不离开岗位。没有人提出口号，但工人们自发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下一班工人聚在了车间旁边楼的公司食堂里。在食堂里，他们听说了解雇的消息，便做出了与上一班同事相同的决定，但公司不让他们加入上一班的同事，于是他们以抵抗到底的同等决心留在了食堂里。

然后，我们度过了充满斗争意志与同志情谊的刻骨铭心的三十二个小时。当天晚上，留在里面的人和车间的同事分享了夹肉面包。夜晚很快过去了。大家围坐在火盆和炉子旁，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热闹的茶话会还有歌声和笑话，盖过了睡意和疲劳。

早上六点，第三班工人来到工厂时，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一些同事组织大家就餐。一队人监视工厂和工程师的动向，这帮工程师在想法子瓦解工人的抵抗，在工人队伍里搜罗叛徒、横加恐吓等等。还有一些同事安排大家轮流休息。我们在地下室里，用破布和纸板临时做了床垫，躺上面睡了觉。

八点半，上早班的工人进场了。全员都凑齐了，自发占领了工厂。黑压压一片人群在厂房附近以及管理层办公室的前面慢悠悠散

步。当晚大家十分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每天不断增长的与压迫者抗争到底的意志。

管理层如坐针毡。他们没想到出这种岔子，必须予以回应。没什么比威胁和诽谤更方便了，这是他们惯用的武器。早上九点，每天给餐厅运面包的小货车出现后，我们请送货员把剩下的面包都卖给工人。他愿意再送一趟面包，但为了不连累他，我们谢绝了。一大群人来买面包，当场付了钱。而在办公室里，运营经理希斯内罗斯和人事主管卡尔巴乔等人给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劳工代表团打电话：——“罢工者武力袭击了一辆运面包的车，抢光了货物”、“威胁进入车间的人”、“侮辱职员”、“阻碍工作”等等。公司代表团听说了此事后，当众揭穿了这些谎言。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主席先生声称我们阻碍了货车正常装卸货物，按照主席先生的说法，工人袭击了货车，还拒不离开工厂附近。按照公司的说法，这些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要把这些告诉省长，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工人离开此处。

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发言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秩序’，因此无法转告给主席口中‘扰乱公共秩序’的人。代表团众人的理解是，要传达给工人的信息不过是：公司觉得工人不听话，要用武力驱逐工人。

为此，主席给了代表团成员三刻钟的时间，届时他们要给出工人方面的说法。

到点之后，代表团再次开会，告诉主席：他们收集了大家的证词，证明工人从没有阻碍过货车的装卸工作，只是一群工人经过的时候，碰巧挡住了这辆车。司机说了一声，工

人就散开了。货车受到袭击更是无稽之谈。司机把面包送到食堂后，把剩余面包卖给了工人，工人也正常付了钱。代表团的成员不否认当时有些混乱，但这是人员聚集以及工人饿肚子带来的合理结果。

同时，主席很清楚大家也是这一态度。”

管理层的意图很明确：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得用武力清场。他们连工人“自说自话”留在厂里几个小时都忍不了。要不然我们可能忘记，自己只是为他们效劳的奴才。

由于代理省长的优柔寡断——他在选举前夕更想在幕后行动，不愿摊上丑闻——管理层最初的算盘落空了。劳工代表和管理层达成一致后，与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开了会。

卢克桑代替伊波拉完成了使命：镇压、威胁、斥责。无非又是老一套：“你们犯法了”、“罢工者的态度扰乱了公共秩序”、“我们收到了运面包和运铁皮的货车遭到暴力袭击的消息”、“你们的要求简直是威胁，我们不能接受”。当然了，不能让他霸占着戏台。我们的代表勇敢地挺身而出，揭露了正上演的闹剧：“公司天天强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找了你们那么多次，不公正的对待一样没少啊”、“我们同事都及时通知你们了，还想叫我们怎么样？”、“看起来你们只看到我们在违法，好像公司不是一直为所欲为一样”、“如果法律是错误的，那就把法律改了！”、“简直难以置信，我们没怎么准备过这些，你们却抓住了所有细节”……

最后，会议不欢而散。我们的代表毫不动摇地站在了全体工人的立场上。



## 分发传单

从12月1日起，我们开始分发传单，上面逐日记述了我们的罢工活动。传单向罢工者传递消息，表达大家的观点。每一篇通讯都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透过通讯表达的思想，我们的工人觉悟不断增强。靠着公司和警察深恶痛绝的秘密渠道，这五个半月里，传单一天都没有缺席。

第一份传单上写道：

“在工会和劳工代表等人的干涉下，管理层硬要加重工人想解决的问题。”“他们还在傲慢地挑衅，但只要他们不接受我方条件、停止不公正对待，我们就要继续罢工。”

这些传单极大鼓舞了我们。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当一切都未尘埃落定时，传单的出现使我们感到：我们身后还有自己的组织。我

们不是赤手空拳在战斗。

次日中午，大家都在厂里，“当日传单”如期而至。外面的同事和朋友一大早就把传单给了我们妻子。让我们摘录几个段落：

“我们正在书写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解雇我们是无效的。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们是以态度表明，有错的恰恰是他们。他们那样压迫我们，从我们身上掠夺了那么多：奖金和职称。他们对我们的惩罚不公平极了，只能用暴力来施加。别把罪责推给任何一个工人。有错的是他们。我们的妻子现在很平静，她们也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们，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在明天能得到人一样的对待，无忧无虑地生活。振作起来!!! 冷静下来!!! 带给我们食物和香烟吧。今天下午六点，妇女们上巴萨乌里工会。”

妇女们展现出了顽强意志、团结与牺牲精神，没几个小时就带来了纸袋和包裹，里面装满了食物和香烟。为了给我们带东西，许多妇女来到工厂的大门口。绰号“巴利阿多里德人”的警卫把她们粗暴地拦在门外，这也是人事主管指示的卑劣伎俩。警卫用力推倒了一位妇女，大家反应激烈，警卫不得不后退。最后她们隔着工厂周围三米高的铁围栏，把袋子扔了进来。我们可以隔着围栏交谈，听到她们的鼓励声。她们送食物时，经常会附上几句话：

“你们坚持一整年也没问题。”“不用担心我和孩子们，我们会照顾好自己。”

我们待在工厂的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很久。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们的妻子、工人朋友在外面表示声援，我们在里面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支持。大家都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时刻。

几天后，一位办公室职员告诉我们，一帮工程师和管理层，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尔巴乔等人，就从围栏对面的窗口上取笑我们的妻子，还说三道四。

## 驱逐

2日下午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个下午。管理层没能从政府那边得到关厂令。省长在生病，代理省长没有点头。但要记得，资本主义还有不少镇压力量。国民警卫队唯命是从地袭向工人。别忘记了，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人都是法西斯后备军。应他们和龚德拉的要求，晚上8点，从一片漆黑中，开来了第一批载着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队长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来到食堂，说是政府下令疏散工厂。我们要求他出示书面文件——“我是通过电话接到命令的”。我们的回答很明确——“没有书面文件，我们是不会离开的”。他们便开始张牙舞爪地威胁，做得最绝的是在晚上11点，他们和管理层与工程师们商量好后，大约五十名手持冲锋枪和步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了出去，还用枪托吓唬我们。士兵把食堂里的人赶了出来，再清场了车间。他们把人赶到办公室前面，团团围住。剥削者透过窗户看着“行动进行中”，对这场表演心满意足。

同一时间，妇女们占领了工会。我们用传单通知了许多妇女，

晚上六点在巴萨乌里工会开会，大约有两百多人到场。当时正要召开公司代表团的会议，总得表表态。她们也是班达斯工人，当我们占领工厂时，她们代我们履行职责是很正常的。到了会场，工会却把她们拒之门外，说是公司代表团会议将在毕尔巴鄂举行。即便如此，我们的妇女还是坚决进入了会场，要求解决我们的冲突。工会官员们吓坏了，给毕尔巴鄂的上级打了电话：——“班达斯的女人闯进来了”；——“她们要求工会介入”；上级立即回答：——“马上轰出去”，地区劳工代表回答说：——“要是动她们，你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这位代表的回答很明智，他们也意识到了动武的后果。女人们占领了会场四个小时。她们说，如果有必要，会继续占领下去。要不是听到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她们肯定不走了。在惊心动魄的三十二小时后，她们赶来与我们会合了。

好像是预见未来一样，第三天早上的传单上写道：

“工人历史的一章将成为一本书。是的，为了讲述这七十二个小时发生的那么多伟大的故事，需要写下很多页数。多少同志情谊、团结精神、勇敢壮举啊!! 多少工人觉悟啊!! 我们的妇女工人做出了怎样的榜样! 她们向我们证明了，她们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剥削者进行着殊死斗争。

现在，我们希望在技术人员、车间师傅、管理人员身上，也看到这样的力量。

对于管理层来说，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因为它写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那几个钟头里，他们把公司变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军营!! 国民警卫队用枪指着我们工人!!

我们会向你们算账的。听清楚了：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

虽然没有枪，我们希望有一天赶走你们，卡尔巴乔、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你们已经戴上了无法抹去的“头衔”：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忘记没有露面的大人物，那些指使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为己效劳的资本家。”

在星期六上班时间，这张传单也到了办公室职员、车间师傅等人手中。看见士兵赶我们出去，他们也下决心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人事主管面前走过去（还受到此人威胁）加入了罢工。到了星期一，剩下的人都出来了。工贼有四个，我们都不屑于提他们。

从那时起，除了工程师和专家外，所有工人到最后一刻都保持团结，这是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典范。它表明了团结在一起，工人能够办到什么。

这场冲突开始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那么久。我们一般只罢工几天。出于这样的看法和战术考虑，我们认为代表团和联络员不必宣布罢工。关于这一点，我们一致同意何塞·奥萨巴同志（他在厂里当小工，学过法律和经济）的意见。管理层拼命想除掉他，那我们就更想把他留住。

同样，部分罢工者留在厂里当后备队。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容易起火或爆炸的设施，比如储气罐、电机房、锅炉房等等。

这些决定是我们自己做出的，而不是工会一口咬定“强迫”的。

5日到10日这一周，我们在等待劳工代表团的决议。工会起先拒绝介入，最后召集了工会调解委员会（由相同数量的工人与雇

主代表组成)讨论奖金问题。我方代表团向马德里的工会官员发了一份电报,才叫他们回心转意。这封电报中提到:

“鉴于比斯开金属工会拒绝解决班达斯轧制的冲突,我方要求国家金属业主席立即出面。”

这位主席立即给毕尔巴鄂打电话,命令工会介入此事,甚至派了两名专业人士协助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到了8日,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承认减少奖金是违反规定的,但报告对任何人都具强制性,因此毫无意义。它仅仅是让劳工代表团的工作好做一点。而劳工代表团又拖了几天才得出解决方案。

## 我们组织起来了 最初的集会

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举行了会议。每晚七点,都有三百多人聚在一起开会,任务是跟进冲突的进展,回收分发下去的传单,以免遭到秘密警察“追捕”。大批秘密警察监视着我们,配备了好几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和巴士。我们开会的地方,根本就听不见代表们的声音。说来惭愧,工人们只好在街上开会。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看在工会的面子上,我们得以借用当地奥查考加(Ocharcoaga)的教区学校开会。

对于这场罢工来说,那几个月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最大的:集会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学校。直接与根本的目的是让罢工者都聚在一起,听取所有意见后,做出最合适的决定。的确,假如不能开会,

我们就很难抗争下去。在这三十年里，由于缺少组织、无法集会，许多罢工都撑不下去。法西斯资本主义非常清楚怎样防止工人利用自身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也表明，镇压是何等凶残。

为了揭露这种情况，工人无数次质问当局：为什么允许资本家开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还向他们发放贷款等等，却禁止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工会会场）开会，不许我们建立真正的工会和罢工基金？这些问题不必回答，因为工人非常清楚原因：政权是那些幕后牵线人手里的木偶。而在西班牙，资本家用来操纵政权的木偶线如此之多、如此有力，连手法都是相当露骨的。这些政治闹剧不过是为少数金融和工业巨头的利益服务的。

罢工的头一个月里，当局不敢直接动用武力。有几个原因让它没法出手：大选前不能闹出丑闻，而且西班牙加入了“共同市场”，不得不“允许罢工”。

假如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是反对大选的，情况会对龚德拉更有利，正因为事实并非如此，龚德拉才没立刻搬来镇压大军。此外，他们使用了更巧妙的手段向罢工者施压。再说，没人觉得罢工者能撑多久。第二个月里，罢工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的解雇案闹上了法庭。罢工是和平的，政府没法找茬，满足不了龚德拉的胃口。龚德拉的头脑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而是像旧权贵一样，只有部长们的“强硬路线”。虽然龚德拉和巴斯科尼亚董事会都是精明的商人，但他们是在玩火，因为他们的招式只能促使工人觉醒。真是多亏了他们。<sup>9</sup>

---

<sup>9</sup>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因为它会对工人斗争的未来带来危险——埃切瓦里有限公司的经理，“先进”的年轻资本家何塞·路易斯·埃切瓦里（José Luis Echevarría）是新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他正在用古老的欺骗手段麻痹工人，也就

当时，警察得到的命令只是控制住我们，渗透进奥查考加的集会。集会一直持续到当月中旬。教区的学校容纳不下我们五百人，所以我们打算再找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奥查考加，工人拥挤在一起，局促不安地经历着这场罢工最重要的时刻。



### 口号：抗争

12日，省劳工代表团下达正式决议。这份让人半懂不懂的文件如实反映了劳工代表伊波拉·洛斯特的为人：费尔南多·龚德拉与资本主义的忠实奴仆，一个狡猾奸诈的家伙。（后来，伊波拉在审判中的证词暴露了这份决议的真正意图。但决议明显对我们有利，裁定了管理层调整工人奖金违法，责成公司恢复奖金数额。）

---

是给他们提供廉价的股份，把他们“提高”到小股东的无力状态上。——原注

当天，公司举行了代表团会议。以下是会议重点记要：

“……主席表示，鉴于劳工代表团的决议，公司决定落实规定。因此，公司首先将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目前的奖金制度，即车间内的规章……”

随后，主席请与会者审查这些条例。代表团成员应目前罢工人员的要求，同时代表罢工人员，向主席递交一份文件，要求公司方面签字。这份文件上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了多条要求。以下是逐字从中摘录的内容：

（1）全体员工恢复之前的职务，包括相同的职称、相同的权利，乃至集体冲突前的全部权利。公司不得追责，同时撤回发出的解雇通知。

（2）公司需遵守比斯开劳工代表团的决议，一并适用于以下工种：电镀锡生产线、热镀锡4号和5号机、机械维护部、电力部门、总后勤部门等各生产部门。

（3）公司需遵守法律以及集体协议中，涉及管理层与员工和公司代表团等等之间关系的明文规定，尤其是上述条例涉及对待员工的方面。

一旦上述满足三点，工作人员便回到工作岗位。

宣读完这份文件后，主席表示明天也许会发公告，接受重新进厂的申请，但不会算工龄，申请者顾名思义当“新员工”。主席没有在文件上签字，表示什么也不能保证。”

那天晚上，大家都等着代表团回来。这件事使工人怒不可遏。绝不可能接受这么不公平的条件！他们就是想解雇我们！再次流露

出了伟大的工人觉悟。我们的代表们说，他们会用为数不多的合法手段继续斗争。众人都表示要继续罢工。当天，大家还决定就“公司解雇罢工者”向法院提起上诉。

从那一刻起，事情非常明了：管理层想达到目的，需要的只是时间。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情况还没有绝望，我们就要呼唤抗争下去。接下来几天的传单，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们真是狡猾，想用疲惫压倒我们。我们的抵抗要像砌在城墙上的顽石一样坚固。团结就是我们的壁垒，人人都是一块坚石……公司要赏我们一块‘蛋糕’，但代价是损害同事。我们说过，我们决不会放弃诺言，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的路。公司的决定可能会叫人担心，但是我们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正在觉醒的新人。想玩弄我们，就要当心不要唤醒人民，到最后吓得发抖。”

管理层的企图居然落空了。别忘了，三十年“掌握全权”以来，龚德拉等资本家完全操纵着工人阶级。这几个月的罢工表明，他们再也不能轻易挫败工人斗争了。以往总是赢家的龚德拉，这回自尊大受打击。他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没叫我们屈服！可以说在半岛上，至少是在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没法再以胜利者自居了。因此，12月14日传单上的话具有重大意义：

“想看到我们乖乖回去工作的人，现在该有多么惊讶。我们发过誓，也会兑现承诺——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

来!! 尽管来吧!! 两个月的罢工将书写在工人历史上!!”

最初的日子里，两个月的罢工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在当时可是无比光荣的壮举。谁能料想，我们的斗争不仅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挺了三个多月呢！

### 个人的要求 办公室职员：公司的希望

管理层以为工人很快会乖乖回到无序又毫无尊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想得太天真之后，他们又装腔作势恐吓工人。公司现在千方百计叫我们复工，可正是这些人，12月1日坚决要开除我们，12月9日给每个人的挂号信中都说“公司决定与你解除雇佣关系”。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再一次露出獠牙：既然都跟我们“解除关系”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的确，公司正在试图招“新员工”。按照洛佩斯·马图拉纳的提议（之后几个月里，这伙人会挖空心思对付我们），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写明招工“通过邮件受理”。我们在当天传单上，揭露了公司的真实意图：

“为了分裂我们，管理层从贫乏的脑袋里又想出了损招：想到班达斯上班的人可以‘书面申请’！他们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大多数工人是怕挨‘四小鬼’<sup>10</sup>的打，才不敢回厂里，所以叫我们写信。他们尤其把矛头指向某些员工，期望他们扮演破坏团结的阴险角色。真是大错特错!! 谁要是

---

<sup>10</sup> 上文提到工人中间有四名工贼，他们在罢工后仍然继续工作。——中译者注

上了套，不早回厂里了……”

没人搭理这种令人气愤的做法，但在最初的二十天里，管理层对办公室职员寄予厚望，想挖她们的墙角，破坏大家的团结。于是，通过藏在队伍里的叛徒，他们找了一些文员单独谈话：——“大家都是员工，为自己谋好处有何不可”，蒙赫（卡尔巴乔派来的走狗）说道。但是，大家的尊严与团结再一次挫败了阴谋诡计。之后，办公室同事不仅与我们一起开会，还提出倡议：不再称呼职位，不分工种，大家都是“工人”。这项举措使众人团结如一。这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胜利。在传统的绝大多数罢工中，办公室员工都留在工位上，意识不到自己在背叛同事，没有身为劳动者的自觉。像这样，在接下来的罢工中，办公室同事：文员和管理层手下的部门秘书，她们常常走在斗争前头，为集体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某些人以为办公室职员更软弱、更“驯服”，不断诱使她们背叛，反而自取其辱。这十五天里，伊达尔戈·希斯内罗斯的话一直在她们耳边吵个不停：“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有更优厚的地位，不应该加入罢工者”、“你们离开岗位的话，公司会考虑你们的去留”……

## 官方工会的丑态

12月下半月，民族工团主义中心<sup>11</sup>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绞尽脑

---

<sup>11</sup>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 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1935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 CONS），1940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汁发挥自己“工会”的作用。

12月21日，两名代表团成员前往马德里。他俩往毕尔巴鄂打了一通电话，电话另一头说：工程师埃斯璠拉（国家金属业主席）已经召集公司在第二天开会。当天晚上，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准备次日一早动身前往毕尔巴鄂。

整个22日，疲乏又昏昏欲睡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会的政治干部都在等龚德拉答应派来的代表。管理层的人始终没露面，他们白等了两天。就算我们的领导者非常愤怒，埃斯璠拉还是向着公司说话。当然了，他根本就不会有触犯资本主义的念头。垂直工会<sup>12</sup>及其所谓的“调解”角色，再次沦为了笑柄。

12月末和1月初，毕尔巴鄂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一点用也没有。卡尔巴乔说，公司是棵病树，必须剪掉损害它的病枝。代表团反驳说，公司是病树不假，但砍掉的枝干肯定是不会再接上去了。

就这样，民团工会无力干预我们不断成长壮大的斗争。新一年（1967）来，我们成为了整个半岛上工人抗争的中心与象征。

在解雇案的审判中，合法斗争的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在一月份，也就是罢工的第二个月里，这是我们整个战略的重点。

##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

Nacionales, CENS) 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 (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 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 (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 CNS) 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sup>12</sup> “垂直工会” (sindicato vertical)，即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故称为“垂直工会”。——中译者注

直到 12 月 12 日，劳工代表团才发布决议，公司代表团也在当天与劳工代表开了会。之前谁也没有考虑过向法院上诉。

但是，当我们看到公司的态度时——他们想一笔勾销我们的资历，解雇一大批人——事情就开始朝着别的方向发展。

9 日，我们收到了一封给 564 位罢工者的挂号信，公司正式解雇了我们，因为我们在 2 日又拒绝复工。因此，我们有十五天的时间可以提出申诉。

我们履行了各种“程序”：拜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律师，起草要求、递交上去等等，日子很快过去了。为了争取时间，律师建议我们托工会调解，因为这样一来，申诉期就能顺延到调解之后。

我们的代表上了工会，要求工会准备调解书（每位工人都要签一份）。他们说，我们第二天得上巴萨乌里的工会办事处。所有罢工者都赶去了，但是代表团和联络员不能去，因为他们要到毕尔巴鄂开会。他们缺席的时候，罢工群众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签下了文件。后来我们的律师瞪大眼睛一看，大家签的不是调解书，而是拉迪诺人<sup>13</sup>卡布雷哈斯主持的工会法律服务处仓促准备的起诉书。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他们为了“挽回荣誉”，让工会律师把案子抢了过来。（后来数月，工会还在拖后腿，假装赢得了工人信任，还在工会报纸上，毕尔巴鄂的《铁报》（*Hierro*）和马德里的《人民报》（*Pueblo*）上大放厥词。他们太丢人现眼了，都不配我们搭理。）

有意思的是，垂直工会觉得公司雇了自己的律师，是对工会的不信任。毕竟欺骗群众这种事，让他们工会来干才是最合适的。

正如上面所说，班达斯工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月都自掏腰

---

<sup>13</sup> 拉迪诺人（ladino），西班牙人和南美土著人的混血。——中译者注

包，请私人律师为我们提供正直的辩护和必要的法律支持。

在我们组织起来之前，只得借助工会的法律援助。我们在那儿受的屈辱一言难尽。例如都开庭了，他们还不知道委托人是谁，就当例行公事来做，完全没准备。（究竟有多少回，他们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明白，上了法庭还后知后觉！）更不要说法官、工会律师、公司之间有多亲密了，这帮人全是一伙的。一位同事说过，在以前一桩工会吹嘘的“调解”中——“他们像我镇上的吉普赛人。要卖驴子的时候，总是会开十倍的价，无论再怎么讨价还价，他们最后还是赚到了。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司（要惩罚我方的工会联络员）一开始要价很高，让它打点折扣，就立马答应成交了。然后工会就跳出来，全都安排妥当了。”

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归根到底，制定规则没有工人阶级的份。看吧，谁创立了工会和法院？政权。谁建立了政权？资本主义。工会和法院是干什么的？束缚工人的手，假装是在保护他们。

即使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人阶级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法官、律师、工会政治干部，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走进法院和民团工会那种地方，总觉得走进了敌人的地盘。他们也当我们是敌人。工人就等于撒谎精！我们为此受过多少屈辱。是的，在只有证词的案子里，特鲁埃瓦（Trueba）和希伯特（Gibert）（两位法官平分了贿赂）屡次指责工人：“你们看，工程师先生和董事先生是不会撒谎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不仅信口雌黄，还造谣中伤，不公正地惩罚我们、压迫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些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干得出更过分的事。说到底，法官也在为同一个主子效劳，否则他们就不会待在那些位子了。

##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后，难免有人要发问：为什么班达斯工人还找法院打官司？为什么还要对“集体解雇”一事提起上诉？答案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眼前到处都是妨碍工人行动的巨大困难，最坏的作法是临阵脱逃，什么都不做，束手就擒。更糟糕的是，当前的条件下，这样会助长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走上法庭的一刻，我们知道胜诉的把握很小。但是我们这样做，有更重要的意义：工人克服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下决心和公司对着干。同时，为了表示声援，许多同志旁听了审判，鼓舞了大家的士气。除了看清这是一场大骗局外，我们意识到了必须斗争、必须反抗。而对于公司的辩护士、诸多恶行的始作俑者卡尔巴乔，以及工程师、专家在内的管理层来说，毕恭毕敬地在法庭上作伪证，可不算什么愉快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揭露公司日常运行中的深刻压迫，让工人意识到谁造成了压迫。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一刻，工人正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扬斗争精神。

既然如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何把解雇的案子告上法庭。说到底，法院的最大成就是捍卫了不公正，因为劳动法是用来镇压工人的，法官的思考方式也从未超出社会主流。甚至许多工人也忽视了这起案子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

不用说，这种沉默和无视是工人所处环境的最大特点。而报纸呢，不仅是为了审查制度，也是为了所属的资本集团服务的。报纸掩盖了这件事，还袒护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诸多可悲现实。

只有没法再视而不见时，报纸才勉强开口。但它们再怎么趋炎附势，也无法掩盖当时的斗争与人民事业的密切关系。

我们懂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赢得这场审判。我们也指出，这个案子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只有罢工权和工人自己的工会得到承认，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判决，但这同样会招致这个垂死制度的毁灭。

尽管如此，班达斯的案子必然引起人们的共鸣。它势必暴露这个政权的所有弊病、揭露（政权在国际组织面前竭力掩饰的）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的确，我们也想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彰显我们的权利。而我们的辩护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宣示了罢工的正当性。

假如不对解雇提出上诉，十五天期限过后，就真解雇了。何况公司还能按照劳务合同，威胁把工人赶出房子。（其实四月份，中央劳动法院下判决后，公司执意解雇了一批人。进入“紧急状态”后，公司还发表声明，威胁我们不复工的话，就要统统赶出家门。）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艰苦抗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时刻保持团结与奉献精神。我们要灵活运用战术，利用合法程序搞斗争，比如上比斯开法院、向判决提起上诉等等。多亏如此，我们把残暴的武力镇压推迟了足足五个月，使罢工坚持到了那一刻。那时，半岛工人阶级和国际舆论已经完全清楚了，我们在敌人控制了报纸的情况下，怎样充分利用工人手中的一切，与法院、工会、警察、政府斗智斗勇，最终赢得战斗、削弱对手的。更不用说这场罢工唤醒的工人团结有何等价值。大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工人事业朝胜利迈出了一步，狠狠打击了处心积虑阻碍我们团结的人。

正因为事关重大，我们才要能人相助。他们是阿隆索·加西亚（Alonso García）和鲁伊斯·希梅内斯（Ruiz Jiménez）教授，还

有卡瓦耶罗 (Caballero)、阿雷东多 (Arredondo)、希梅内斯·德·帕尔加 (Jiménez de Parga) 律师。趁此机会，我们得把审判变成公开讲坛，就算官司打输，也至少能痛击资方一再 (单个或成群) 解雇工人领导者的行径，以及下文提到的恬不知耻的种种，什么代表团和联络员“享有工会保障”、根本不存在“随意解雇”等等。



## 最后的准备工作

我方律师写好起诉书后，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在朋友们的协作下，我们一个小组把这份文件复印了几千份，因为每人要一式四份。工会法律服务处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卡布雷哈斯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签署一份文件，表示自愿放弃工会法援，即使我方代表团一开始就告知了他们这一点。

有趣的是，以前从未真心诚意捍卫过我们权利的人，现在却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说到底，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工会“职

能”，假装工人接受自己。何况这桩案子里，公司解雇了那么多工人，他们就更需要这么做了。（判决对工人不利后，法律服务处发表声明，指责我方律师不称职，声称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工人辩护。）

为了避免牵扯到别人，我们在起草起诉书时要很谨慎，花了很大功夫。我们如期写完了起诉书。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小事一桩。但当时，我们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尽量利用工会提供的，而不是我们的地下组织收集的材料。是的，我们有地下组织。罢工迫使我们搭建临时组织，以此满足对于真正工会的需要。这一组织不是为了部分积极分子服务的。它们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为六百多人解决了眼前的急迫需求：场地、印刷、交通、资金，有时甚至是医疗援助。不难理解，尽管地下组织通过成员向工人提供了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帮助都是不足的。

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期待与日俱增。集会上的气氛异常活跃。我们的领导者不断重复：“罢工不会在法院取得胜利，它是为了我们的团结和抗争。”“我们去打官司，不是相信法律会支持我们，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改变。”“这将会是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成就，就算目前来看，我们遭受了失败，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它是重大的进步。在芝加哥为了八小时工作日而牺牲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但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却收获了他们播下种子、用鲜血浇灌出的成果。”“我们这几个月经历的一切，还有这场审判，无疑会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所受的不公平。不如说，让他们在我们的压力下承认这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再也顶不住我们集体的力量时，它才能承认这些不公。”

我们大费周折，得到了使用司法宫大厅的许可。这样一来，总

算不用在当地劳工法院极度狭小的老旧房间里开庭了。可就算我们得到了许可，开庭的大厅也都重新粉刷过了，法官们还是不愿挪出自己的小窝。它们每间最多容纳二十人，平时也不会用，因为审判总是在私人办公室进行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旁听。

最后，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终于到了1月14日这一天。

### 审判开始 证人 法官离席

很早的时候，就有好几千人聚在法院前面了。

人群的核心是班达斯工人与我们的妻子。跟着一起来的，还有当地工厂的许多工人。来的人里还有学生、律师、神父……以及混在人群中的社会政治部<sup>14</sup>的秘密警察。

许多工人刚下早班，还有工人匆匆赶去午班。审判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离开法院，顶多到附近酒吧里吃点夹肉面包。

早上，法院进行了调解。场地条件对审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听见我们的答复，我方律师只能走到外面，大声把公司的提议喊给我们听。“要么全走，要么全留！”的口号和齐一的“不”，表明了我们的坚定态度。只能容纳二十人的房间里，挤满了一百多号人。其他人把脸贴在玻璃上，想搞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样一来，大多数“解雇案”的当事人都跟不上审判的过程，到了中午我们要求安装扬声器，让走廊、广场、街头也能旁听里面

---

<sup>14</sup> 社会政治部（Brigada Político-Social, BPS），正式名称为社会调查部（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Social, BSI），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特务机关，1941年3月8日成立，1978年12月4日撤销。——中译者注

的情况。法院官员拒绝了，但顶不住工人的强烈抗议，最后还是装上了。一些同事很快把下午开庭的材料准备好了。于是，上千名与会者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他们挤在一起，因为看不到法庭，急得直冒汗，这时总算能听见律师和证人的发言了。法庭上为捍卫我们，打起了唇枪舌战。工人和学生满脸灿烂，真是壮观。

至于审判的经过，在这里无需赘述，因为巴塞罗那的新世界（Nova Terra）出版社出过许多这方面的书。

只需强调它的重要性就够了。这些天里，即使在法律这么个混沌的领域，工人们也难能可贵地感到了自己真理的力量。

阿隆索·加西亚和鲁伊斯·希梅内斯用出彩的辩护，把龚德拉的律师鲁伊斯·萨拉斯（他没什么本事，只会拿以前开除罢工者来说事）逼得直冒冷汗。多么难以忘怀的，充满希望和欢愉的时光啊。

提一下鲁伊斯·萨拉斯其人也很有必要。他的辩护不过是向公司献媚，还说我们先前的要求和这场冲突都是无凭无据的。鉴于我们受压迫的现实处境，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鲁伊斯·萨拉斯不仅是在为法律的不公正辩护，也在为资本主义最露骨的不平等辩护。

鲁伊斯·萨拉斯帮龚德拉打官司的几个后，他就当上了西班牙法院（las Cortes Españolas）的检察官，在 67 年 9 月 26 日的《西班牙邮报》（El Correo Español）上发表了以下声明。采访者问他：“如果当选，您在未来有什么规划，有何致力实现的目标？”我们从他的回答中摘录了部分：

“……我将始终竭力为西班牙和比斯开服务，毫无保留

地忠于元首弗朗哥、忠于我们‘七月十八日’的理想<sup>15</sup>和《国家基本法》( 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Reino )。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支撑的，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不断发展的，统一而强大的西班牙。

“... ..为此，我们必须接受为了‘西班牙万岁’的伟大目标而实行的一切。在经济方面，必须对生产财富的活动进行有效坚定的协调与领导。在社会方面，我们要保障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取得必要的部分，因为在分配生产收益时，必须优先考虑工人... ..所有这一切都要遵循我们的信仰原则，它也是全体西班牙人的信仰。同时，我们必须遵守它向我们提出的种种义务... ..”

那我们还要求罢工权呢。这些奴性十足的人把审判当成闹剧，看看他们是怎样愚弄我们的吧。

律师发言完后，证人们开始作证。也许剥削者很少受到当时那样的侮辱。他们上台发言时，只能从我们身边走过，还得听着别的场合绝不会听到的话。他们的发言也很典型。尤其是龚德拉的证词鲜明地展现了我们的处境。问及“罢工是怎么开始的”、“头几天做了什么决定”等问题时，他只能紧张又笨拙地狡辩，还想躲在公司和政府背后。“解雇罢工者之前，我请示了政府，是上面叫我这么做的。”“金属板车间奖金问题的处理方案，虽然我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是我和代理省长曼雷萨先生，还有劳工代表伊波拉先生一起在政府里研究和商定过了。”“我觉得以新员工身份回厂（取消资历），也不会损失什么。”“是省政府建议我至少解雇十到十五人的。”

---

<sup>15</sup>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叛军在1936年7月18日挑起内战。——中译者注

（几个月后，我们两位代表团成员和代理省长曼雷萨进行了对话，证实了12月12日的处理方案确实是在政府里制定的。）

不用多说，卡尔巴乔、洛佩斯·马图拉纳、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乌鲁蒂亚、龚德拉等人的话，叫大家群情激愤。他们的谎言和污蔑彻底激怒了班达斯的工人。

8点休庭了，下周一再开庭。此时仍有几千名工人聚集在法院门前。我方律师刚走出法院，工人立即向他们热烈欢呼，直到他们从工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还没有完。过一会儿，龚德拉那帮人也走下台阶。“暗线”们为了保护主子，全都靠了过去。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台阶，就算装出冷静和傲慢，也掩饰不住紧张不安。他们从我们中间穿过，钻进了豪车。恐怕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表现他们的装腔作势了。几个工人发出嘘声，很快大家一齐发出嘘声，这声音比最响亮的哨声还要有力。这些人有钱有势，但不用说也明白，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渐渐地，我们成群结队地往回走。不仅是街坊邻居，毕尔巴鄂周边的工人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真是充满欢乐和希望的一天。再一次，理性的力量战胜了力量的理性。

同一天，学生们趁着阿隆索·加西亚在场，试图在德乌斯托大学组织一场以“集体冲突问题”为题的讲座，但没能办成。校长何塞·玛利亚·迪亚兹·阿塞维多拒绝了，理由是“这样一来，大学岂不就支持工人了”。这时候，他们倒要装中立了。然而，大学为政权提供了合作，在压制大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时（工会自由、更多参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等等），培养“高新技术”专业人才时（专为执掌大学理事会的金融寡头集团服务），培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银行贷款，资助并掌控了“久负盛名”的德乌斯托大学）

需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时，情况就不同了。

### “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1月16日，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时，我方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向龚德拉提出了新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权贵最坏的代表龚德拉的回答，更是凸显了麻木不仁的态度：“不，我从来没参加过公司代表团的会议。”“我跟工人没有任何交集。”“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这些话给与会者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印象，甚至鲁伊斯·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给学生上夏季课程时，都说：“在毕尔巴鄂这段经历之后，不得不承认，我得重新思考关于所有权的许多看法了。”

（龚德拉的这番话“我只负责做出决定”完全反映了公司的实情。巴斯科尼亚董事会的成员都靠费尔南多·龚德拉的“高效管理”发了财。他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我方代表团，不管在罢工中还是何时，龚德拉始终代表董事会的意见。而股东们，资产阶级通过股份公司建立的“社会民主”的代表，只管收取丰厚的股息，别的什么也不管。1967年6月，罢工结束当月，股东大会上宣读了公司年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我们的冲突，谁也没要求说明此事。而在上个年度（1966年）的报告中，每一段都提到：“我们特别感谢公司的全体员工，再一次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



## 等待宣判

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了我们在1月17日的集会，审判期间的激情丝毫不减。当天的传单也有同感：

“这些日子多么重大啊。人人都意识到，这场审判不仅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大家继续团结下去，无论怎样的协议我们都能争取到。就像现在这样。这几个月里，没什么能比我们的团结更伟大。这是工人最大的胜利，它能实现一切。”

“昨天我们的律师不能来开会，不过马上会回来的。他们说，有需要随时给他们打电话。难以想象他们为我们感到多么自豪。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审判也是历史性的。”

“我们要再次感谢其它工厂的兄弟们在整个罢工期间所做的一切。工人兄弟以无数方式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取

得胜利。”

“我们回头可以告诉妻子，我们为家庭的未来做了一件大事，而她们也在这一切里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审判的结果。请注意，这也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判决。”

接下来几天里，我们都在等待。说实话，没什么人觉得判决会对我们有利。1月18日的传单这样提醒我们：

“不管结果是什么，都不值得奇怪。如果判决是不利的，没有人会垂头丧气。它将表明，我们在法律面前仍然是无力自卫的。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保持坚定。我们必须再坚持数月，直到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为止。来自五湖四海的成千上万同志准备为了我们发起抗议。亮明我们的真理之后，没有人能再愚弄我们了。”

“我们拥有整个工人阶级的意志，所以无论何时都不缺少任何东西。”

同一场集会上，我们决定在第二天进行无记名投票，提前为判决结果做准备。我们的领导者试着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投票。在1月19日的传单里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为以后做好准备。无论结果如何，今天的投票将代表我们的决定。”

“第一点。输掉审判并不意味着罢工失败。它也可能是：

我们得到了工作，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工会。”

“为了以后没有谁会说‘当时没想到’云云，我们应当预见更坏的局面，比如罢工还会持续下去、我们会士气消沉等等。考虑所有情况后，请决定：

“输掉审判后，我想：

与遭到解雇的同事一起以新员工身份复工，  
或是抗争下去直到事情公正解决。”

每人都得到一张票，在要选的选项上打叉。其它工厂的几位同志把票收集起来，然后计票。投票的结果非常惊人：360名在场的罢工者，全票决定抗争下去。

十天后宣布了判决。1月30日，双方得到了结果。众所周知，法官跟马德里各方打过招呼之后，才下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

## 宣判

当地报纸以特别的方式报道了判决的内容。据说毕尔巴鄂市长、著名资本家、《西班牙邮报》和《巴斯克人民报》的经理哈维尔·伊瓦拉掌控了关于这起案子的所有新闻。我们必须利用罢工得到判决的机会，影响公众舆论，尽可能鼓舞工人士气。

当然不能意气用事。这只是现实的战术问题。

判决结果上了报纸头条。通篇是特鲁埃瓦法官的判决，占了好几个版面，因为它肯定比另一个法官希伯特的判决对我们更不利。后者至少承认了公司以前的状况，说明这场冲突应当：

“认定为纯粹的劳资冲突，起因是公司与生产者之间持续数月的敌对气氛。”

看另一边，特鲁埃瓦的声明如下：

“……主席（公司代表团主席阿方索·卡尔巴乔）声明罢工工人阻止了货车的正常装卸。根据他的印象，运面包的货车遭到袭击，加上工人不肯离开工厂，公司有理由认为工人影响了公共秩序。因此公司告知省长先生，让政府派出部队强制人员离开上述区域。”

法官再一次把公司提出的毫无证据的指控（他们怎么可能拿出证据！）写进了判决书事实里。

更过分的是，特鲁埃瓦还引用了1962年9月20日法令（有关集体冲突标准，旨在界定罢工的合法性）的废话，特意说明“工人的声援活动”和劳工冲突之间有微妙的差别：

“（劳工冲突）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直接由相关工人的劳动条件引起的结果（这里是特鲁埃瓦强调的），否则一律视为非法行为（这里是我们强调的）……”

如果对工人声援活动的这种判决还不够，特鲁埃瓦在同一份判决中，还声明未受到车间奖金制度问题影响的罢工者：

“假若他们的出发点正确，与同事保持一致的精神是值

得赞许的，但他们未对情况进行检验与评估就加入了罢工，这一态度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先夸工人的团结精神，又否定了工人的做法。这种无耻的说法掩盖不了他的明确意思：罢工无论如何是不允许的。

宣布判决（后面再说）之前，法官还做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考虑：

“... ... 包括劳动法院在内，司法机关的任务是确保现有规则的遵守与执行，规则的出发点，是调节与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前出现的闹事行为对公司和工人自身，亦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酿成倒退。各方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虽有人认为，我国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但这一进步从未停滞。诸位必须认识到，一切改善的根本在于不间断的勤勉奉公，杜绝随意停工的恶习。这正是多年来我国社会砥砺前行的显著特点。”

正如特鲁埃瓦坦白的那样，西班牙司法的使命无非是“最严厉”地压制一切反对弗朗哥西班牙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活动。司法界向来标榜自己独立于政治权力，可是却立场鲜明地支持政权、颂扬半岛“经济发展”，这与它的说辞完全矛盾。

按照我们指出的那套逻辑，法官最后宣判：

“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人无权要求赔偿。”

## 重申决心

假如我们当时没有对不利结果有所准备，判决肯定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大家的想法凝聚成一句口号：“上诉失败不是罢工失败”。

虽然整个气氛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但领导者还是希望尊重全体罢工者的意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让大家做出选择。

这样一来，也能驳倒公司和当局一直以来的诽谤：“少数人操纵了工人”、“有境外势力在背后指挥”，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

宣判那天，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尽量来参加新的投票。

1月31日，560名罢工者中有500人到场。会场入口处分发了当天的传单：

“我们已经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该做出决定了，这也许是至今最重要的决定。因此，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回答。”

“人人都有义务表达意见。这样一来，没有人能说，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做出的。我们要始终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我们做出决定时，应当牢记：所有工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其它工厂的工人委员会计了票，投票结果如下：在500票里，494票支持继续罢工，2票反对，4票弃权。

唱票后掌声雷动。这清楚地表明，罢工仍然具有力量与潜力。对于五百名班达斯的工人，以及在场的上千名其它工厂的工人来

说，继续罢工是庄严神圣的决定。

罢工还将继续三个半月，这也表明了我们的抗争到底的决心。

## 审判后的抵抗

不用说，班达斯的\*\*管理层\*\*早就知道对资方有利的官方判决无法改变冲突的格局，他们很清楚工人的情绪、工人在克服物质困难上的韧性，以及围绕罢工而涌现的声援活动与舆论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换句话说，不像我们这样法西斯军国主义完全统治的国家）都得乖乖让步。没有“统治者的手段”扑灭罢工，班达斯工人这般压力准叫资方就范了。

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习惯了享受绝对权力，但权力也腐化了它。因此，它完全蔑视工人阶级。三十多年牢狱般的岁月里，在它的眼中，我们是在剥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某物，而不是值得尊重的力量，更不是要用新资本主义的福利收买的危险敌人。

也许，正因为腐败和视而不见，龚德拉还没意识到，他的小伎俩打不败我们的抗争。他一看我们没有中招，又会把希望寄托在别的诡计上。他绝不甘心让步，非要叫我们无条件投降不可。

从二月到五月的斗争中，我们遭受的镇压变本加厉。到了最后，他们还用上了紧急状态、流放、监禁等等。

## 收买的企图

宣布判决的前几天，为了破坏工人团结，\*\*管理层\*\*想出了新招式。

通过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等工程师，公司和一些向来奴颜婢膝、跟工人不团结的车间师傅勾搭上了，答应只要在宣判之后复工，就给他们钱。公司想利用工人输掉审判后的悲观情绪，等一部分人失去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瓦解会削弱众人的意志，让工人接连复工，从而打垮抗争。这就是资方想要的结果。

我们的领导者察觉了正在酝酿着的阴谋。为了劝阻可能叛变的人，他们召开了多次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自觉参与斗争的。但是我们听说，管理层想让某几个人打破团结，要他们不顾别人的未来，先回去工作。假如这里有谁抱着这种想法，请他上来解释这么做的理由。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大家自由表达意见。谁要是没有在大家面前说出想法，就在集体问题上私自搞鬼，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要是真有这种人，那我们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背叛？你们在这几个月里缺少什么吗？需要钱的话，你们和大家一样，都能找临时工做。

你们不能找借口欺骗任何人。除非你们现在能反驳这一点，否则私自复工就是最卑劣的自私自利，就是想讨好剥削我们的人，给自己捞好处。

更糟糕的是，也许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解斗争的全部含义。如果你们现在回去，只会暴露这个悲惨的事实。不要忘记了，你们也属于被压迫阶级，而你们却妄想与压迫者及其走狗为伍。

好好想想你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最好不

要一辈子都背负着背叛者的骂名。”

一听队伍里可能有叛徒，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要求说出叛徒的名字，但领导者还是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那些天里，由于担心叛卖的后果，没有人敢复工。

## 罢工中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二月初，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搞新的培训。如上所述，罢工开始时，出于战术原因，我们决定让他们继续坚守岗位，以免公司轻易把他们赶走。

但判决结果出来后，管理层想要利用队伍里的叛徒打破团结时，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培训，以此逼他们复工。

见此情形，我们再次举行投票，对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去留进行集体表决。跟平时一样，投票之前，先要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几位以战斗和献身精神著称的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把他们的处境告诉了大家。就和当时我们决定他们待在岗位上一样，现在我们让他们离开岗位，让他们完全融入到集体的命运中。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投票压倒性地支持他们加入罢工。除了卡佩拉斯特吉“略施小计”选上的几名专家和工程师之外，三十六名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全都拒绝复工。当天，他们递交了辞职信，厂里只留下四名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办公室职员联络员。

这场投票中，我们还决定让罢工开始时留下来监视电器和储气等设施的同事离开工厂。管理层对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使他

们相信：他们的处境不同，要是走出大门，公司就不让他们回来了。他们大多数都离开了工厂，只有几个师傅中了公司的圈套。

## 工贼们

既然已经出了一小群叛徒，在管理层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队伍里冒出了工贼。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向他们保证，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会保护他们，而且从他们复工起，占领工厂、埃切瓦里与巴萨乌里周围的城镇，以及奥查考加的街区。

为了钱出卖我们的叛徒有四个：车间师傅劳尔·戈梅斯、胡里安·安杜拉加、坎迪多·萨拉查，以及文员弗朗西斯科·阿梅兹。

公司打算解雇的那些除外，师傅们都收到了写着奉承话的信，说他们能以“同样的待遇”回到他们“管理与指挥”的岗位上……同时威胁说，最后通牒就在2月13日。

要么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厂里干活的师傅增加到了九名）造成士气低落，要么师傅是工人当中最没有觉悟的，接下来几天里，他们三两成群地回到了工厂。只有四个人始终与我们团结在一起。

到了2月12日，在车间师傅和文员中，走出了六百名罢工者中的二十几名工贼。

那几天的传单上，控诉了他们违背工人团结的罪行：

“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就出了两个叛徒：格雷戈里奥·佩雷斯和伊图尔韦。现在，又多了好几个卑劣无

耻的家伙。”

“从未有过如此恶劣的背叛。他们只配得到唾弃。所有工人都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我们不会容忍叛徒。要是我们当中还有这种人，滚吧！工人阶级都鄙视他们，这些叛徒只配给资本当奴才。”

“这场斗争攸关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面包，所有人孩子的未来，而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就只盯着自己自私怯懦的利益。他们只能无地自容，遭人记恨。”

“我们必须告诉龚德拉，他的臭钱对我们一文不值。他是没法收买我们的。”

不难理解，这在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中间也造成了极大不安，因为我们的罢工同样也是他们的罢工。

但车间工人与办公室员工的紧密团结使我们克服了愤怒和痛苦，因为逃兵基本上都是师傅。

当然了，这些叛徒不希望看到的反应也发生了。工贼们在街区里住不下去了。不管是哪儿，酒吧里、商店中、大街上，人们都在斥责他们的行为。不用说，大家群情激奋，不断发生暴力事件。许多工贼心怀恐惧和愧疚，暂时搬到亲戚家住了。

然而，最强烈和戏剧性的场面，就发生在工厂的大门口。我们的妻子，一大群人怀里抱着小孩，大声地斥责那些懦夫：他们背叛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的名义参与的斗争。和她们一起的，还有一大群附近工厂的勇敢女工，她们的帮助也始终激励着我们。“工贼！”“不知羞耻！”“孩子们都会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的背叛！”“你们背叛同志换了几个子儿？”等等。埃切瓦里的“新员工”，

就这样从两列女人的队伍中间，低头夹尾巴，羞愧难当地进厂了。

国民警卫队的镇压一天比一天强硬，只有我们的孩子在场时，他们才稍微克制一些。他们没收了斥责工贼行为的邻里街坊的身份证，对这些男女老少罚以巨款，从五百到一万比塞塔不等。



公司前的路

## 公司的来信与我们的回信

当时，大家都收到了公司的来信，重复了与师傅们收到的信里一样的把戏。信中提到“法官和劳工代表认为你们的诉求合情合理”、“只要愿意回来上工”、“我们将亲自登门拜访，请您回到工厂，保证与以前同样的待遇”……要求在2月21日之前答复。

信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们想分裂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希望强调一点：您应当下定决心离开情绪化的环境。”

在这封信里，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说不完的无耻。或许，只有这些年里饱受压迫的收信人自己，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这不是

别的，只是对付工人阶级的新招式罢了。这种办法就是用花言巧语混淆视听。先说几句漂亮话，做些大方的承诺，以此掩盖他们的野心。他们唯一想的就是要剥削我们。

前两次诡计泡汤后，在工会的协助下，管理层又给我们寄了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的信，一连寄了三封。信里有几个“不认识的同事”抱怨说，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不该一错再错云云。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是在公司办公室里炮制出来的。当天的传单评论说：

“公司再怎么给我们寄信，也分裂不了我们。信里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我们很想知道，这里说的是公司的‘新员工’，还是‘顶班’的起重机和吊机的操作工们（工程师和专家们）。看看他们吧，连线圈都搞不定。”

“给你们的回信这封中，我们会署名‘班达斯工人’。因为我们早就讲过，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正是这些天的斗争，最终使我们团结如一人。”

“因此，我们要提醒公司，不要忘了我们每人身边还有自己的同志。”

不管是对这封匿名信，还是之后我们单独收到的信，我们的答复就好像是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答复也确实是集体做出的。我们的回信如下：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管理层

今日收到你们来信，不想叫你们久等。这是集体作出的

答复，因为（尽管你们并不理解）并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着现在的局面。在这里，给你们写回信的，是我们全体遭到解雇的工人。

我们知道，你们花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分裂我们，叫我们按照你们的希望的条件复工，也就是说，当“新员工”，把一部分人留在大街上。请你们这一次牢记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正不慌不忙地干着各种兼职，毕尔巴鄂银行的计谋没能得逞。目前，我们的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阿隆索·加西亚、阿兰东多、卡瓦耶罗、希梅内斯·德·帕尔加先生，正在起草我们对比斯开劳工法院判决的上诉。

虽然在宣判的时候，你们一度打破了我们团结的纽带，但并非所有人都想复工。此刻，作为具有技术知识的工人，只要接受我方条件，我们同意与班达斯轧制公司对话。

我们的家人现在也不担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告知了妻子。她们知道，我们发过誓要把住的房子保住。我们正在履行诺言，而且会无限期履行下去。

前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收入也少了很多，我们不是不急着回去，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要求。

最好让人事主管好好想想手下的管理人员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停止对我们的粗暴和不公正的对待。

若想进攻我们的队伍，或是找出带头的工人，你们将会一无所获。就像你们在比斯开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人给这家公司工作一样。

每过去一天，你们每施压一次，都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只有我们都回到工作岗位上，问题才能解决。所有

让情况复杂和恶化的行为，不会对事情的解决有利。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班达斯轧制工人

埃切瓦里——1967年2月

他们把对师傅的那套故技重施，但得到的结果是：收信的工人没有一个改变心意，都表达了与集体一致的态度。

### 重建团结

然而，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它将结束我们规模不大，但却令人痛心的分裂。管理层再一次自取其辱。

由于他们扮演的角色太令人不齿，犯下的背叛行为太露骨，我们的妻子在厂门口的责骂又是那样激烈，令他们痛苦不堪，师傅们承受不住良心负担，决定再度离开工厂。让他们大多数人归队的，与其说是不愿坐实他们和资本家的勾结，不如说是害怕，有几个人肯定还会再次背叛我们。

当时师傅们达成了一致，告诉管理层，他们不会继续上班了。龚德拉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离厂，甚至还请解雇的师傅回来。讨好、承诺、威胁统统不顶用。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还带着办公室职工的联络员和代表团，以及最开始的叛徒佩雷斯和伊图尔韦都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

2月18日成为了工人的节日。我们的传单这么写道：

“我们的团结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

子。我们要告诉班达斯的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一个重大消息。公司曾用欺骗的手段收买的工人、师傅、职员，与我们短暂分离了几天，又和工人兄弟站在了一起。”

“让我们以他们应得的尊重接受他们，欢迎他们站回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师傅们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从公司离开，而是当公司承诺‘妥善安排’他们这个级别的员工时，他们回答说，这不是级别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就是所有人的立场：要么全留，要么全走。这是我们团结的胜利。”

“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把戏落空了。现在留给专家和工程师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牵着主人的狗出门散步，要么走出去，和工人一起跟资本主义斗。在资本主义下，他们只能变得更为低贱，直到毫无地位可言。”

“学着今天走上街头的师傅和职员的榜样吧，他们向工人证明了自己的尊严，加入了斗争之中。”

“众所周知，我们的口号没有划分等级，只有‘所有人’，因此，我们要提醒工程师和专家，他们也是领工资的，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但我们没有抱太多幻想，他们已经烂到根了。他们老早就背叛了。只有植根于人民的正直者，才能挣破锁住专业人士的金链。对于班达斯以及许多地方的专家和工程师而言，或许已经太晚了。

我们的新胜利激怒了管理层。在龚德拉的斡旋下，政府终于下令，动用大量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阻止我们在巴萨乌里开会。

但是师傅们的离开，以及我们抵抗意志的随之增强，叫顽固的

龚德拉也动摇了。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不相信罢工会“速战速决”了。手握大权的那么多年来，他头一次产生了这种悲观看法。

## 不可能的谈判

通过一些中间人，龚德拉要求与我们的代表会谈。正是这位龚德拉，从没想过跟工人扯上关系，过去几个月里根本没考虑过和解，如今却“屈尊”要求谈判。

2月25日，我们的六位代表与这位巴斯科尼亚总经理进行了首次谈话。这场谈话非常值得关注。尽管龚德拉的处境不妙，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就像无法克服不得不与工人直接对话的耻辱：“我已经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我知道这场罢工是政治性的，也希望很快能证明这一点。”“你们只不过上当受骗，给某些人利用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准备重新考虑解雇的人数，甚至会给予补偿。但这之前，我要征询劳动法院的意见。”

我们的代表没有跟他多费口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工人都是公开发表意见的，你的话没有任何依据。这都是老掉牙的说法。”“我们的同事不答应，我们也不会允许解雇。”“既然你有这么多办法刁难我们，假如真想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你现在也能发挥影响力，弥补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当时的气氛剑拔弩张，但我方代表还是同意参加第二次会议，龚德拉答应在下次会议上，就解雇等问题给出最终答复。这场会议延期了几天才召开。我们的代表是抱着决心参加会议的：绝不允许他像上次那样对待我们。但是龚德拉还是老样子，甚至倒打一耙：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场冲突是少数人指使的。”“这场罢工没有正当理由。”“我一直都在按上面的指示办事。”“解雇人数不会少于总人数的 5%。”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很坚决：“唯一有错的是你和你代表的制度。”“要说解雇，也该解雇你这样不像话的管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与此人的苦涩对话。他必须结束这场冲突，但他连表现得稍微聪明一点，或者写两封“和解书”都做不到。

虽然龚德拉多次告诉董事会，罢工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工厂仍然没有开工。

这次尝试失败后，龚德拉还想证明工厂已经“开工”。但他至少需要有人去开机器，给人工厂一切如常的印象。

一月和二月里，龚德拉尝试在比斯开招工，但是一无所获。一名工会律师，卡佩拉斯特吉的兄弟，在杜兰戈（Durango）弄来了一点人，但他们了解情况后，就离开了公司。

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采取的最为卑劣的行径，不过是班达斯管理层的腐败、残暴、完全无视人的尊严的真实写照。

## 穷人的市场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傲慢与权力使他们无法向任何人或物低头。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了底线，没有了道德准则。以下事实证明了一点：

龚德拉的几个走狗悄悄离开了比斯开，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是几个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任务就是：带人回来。不管谁

都行。不管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家庭情况如何。什么人都行。必须把人塞满公交车，拉回毕尔巴鄂。越快越好！

他们招人的方式就是：哄骗、答应给钱等等。

招来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来自加利西亚、莱昂……这帮人像猛兽追赶猎物一样，到处窥探着人手。

工会在集市上张贴了告示。告示上就像钱塔达（Chantada）的加利西亚贵族在讲话：“比斯开的大公司需要工人。优厚的待遇。发布者：地区劳工代表。”

这些告示没有提到别的。除了每个月能拿多少，上面还说工人到7月18日还能领到五千比塞塔。关于罢工和我们的真实情况，一个字也没提。该提一句，巴斯科尼亚的没良心律师伊瓦拉、奴性十足的师傅洛哈斯，还有同为律师的卡尔巴乔的合伙人奥尔蒂斯，为了把人招到班达斯去，还在一间台球室里张贴了告示。

最后是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把人给找齐了。我们在3月31日的传单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在哪里？好几天没见他在公司露面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们故意闭口不谈他的行踪。看起来管理层给他下了直接命令。马图拉纳先生可是他们的左膀右臂，受着相当的信任。看样子，马图拉纳先生也很想在班达斯的冲突里崭露头角。听认识他的人说，他的野心很大：他想飞黄腾达，当上大领导。但想要在管理层面前露一手，也不那么容易……”

“班达斯的冲突不仅是战场，还是我们鲜活历史的课堂。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人们会为它著书立作。但我们会把它的

两章历史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一章是野心、奴性、狂妄。那些人为了权欲，不惜把人踩在脚下。另一章是真诚、正义、尊严与同志情谊。这些人宁愿承受危险、贫困、痛苦，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心。在这一章的最后，是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在火热的战斗中，我们写在字里行间的内容成了预言。就在那一刻，权欲熏心之徒又把更多牺牲者残忍地踩在脚下。公司用武力逼着这些可怜虫，用劳动损害自己的阶级兄弟。

这些人前赴后继来到班达斯。许多人是怀着梦想而来的。这些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在与土地和挚爱分离的痛苦中，总是抱有一念希望。这就是移民的古老历史。

但事实与他们想的大相径庭。许多人看到真实情况，像是受了猛然一击。工厂停工，厂房空荡荡的，外面是国民警卫队的团团包围，新的老板骗了他们。而叫人最难受的，是当他们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我们的妻儿时：“你们别去上工！”“想清楚你们在干什么！”“和我们站在一起吧，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不要玷污了你们出生的土地！”我们加利西亚的同事朝同乡喊道。

## 埃切瓦里收容所

警察像犯人一样对待他们，把人装进大巴，吉普车押送他们进出工厂。他们想要逃走，公司就在离工厂很近的地方，在埃切瓦里当地买下两栋公寓。每间房六个铺位，新招来的人都塞里面。公司

禁止他们上酒吧，以免跟我们接触。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他们只能从远处听见我们的声音，通过一排排枪支围成的篱笆看到我们的脸。直到后来，他们才能诉说那段日子是多么煎熬。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群妇女去了住满“新人”的房子。她们敲门：“开门！我们是班达斯的工人，想和你们谈谈！”里面传出了痛苦的声音：“不行啊，我们关起来了，钥匙在国民警卫队手上！”不必多说了。看到这种悲惨痛心的场面，没有人不会气血上涌，没有人不想跟这个用暴行维护特权的制度作斗争。

这时候，离宣布“紧急状态”不远了。而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要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正如其它章节所见），然后制造假象：“近几个月来，不断发生影响工作自由权的非法行为”。当然了，他们指的肯定不是因为穷才做“苦役”和背叛阶级的埃切瓦里新来客。

他们一个接一个逃掉了。有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会出现非常动人的一幕。我们总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们。下文中，他们三言两语解释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在会上现身意味着什么。几位兄弟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一步步讲述了他们的悲剧。

——“我结婚了，有五个孩子，我住在加利西亚的……日子非常难过，基本找不到工作，而我们的土地又很少，这样子根本没法活。一天赶集，我看到了工会贴的比斯开招工的广告。我回去和老婆谈了谈，然后决定离开老家。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后，她就会带孩子们一起过来。”

——“我和工会签了合同才来的。他们掏钱送我来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是因为收到了劳工代表寄的信，让他们来工作。关于你们的情况，他们啥也没说。这是我这辈子最

糟糕的一周。我以前都是挺胸做人的，这几天感觉我像是犯了罪。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已经在了你们中间了。”

——“我十五岁，来自蓬费拉达（Ponferrada）。我以前给车间当帮手。听到能来比斯开，我就来了。他们先给我们培训了十五天，因为我们基本都是农民，连扳手都不知道是啥。要是我爸知道我在班达斯，肯定要宰了我。”

——“我有二级硅肺。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工会，但毕尔巴鄂来的先生们说无所谓。当时我高兴坏了，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很困难。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到了略迪奥（Llodio）后，本来乘公交的，变成搭出租了。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是为了不让人知道我们到了埃切瓦里。叫你们的老婆围住，听到她们喊叫之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起初我们想走，但警察逼我们进厂。工厂里面，他们说你们所有人都在搞政治。”

——“我没有钱，只好来干这份活儿。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

无需解释，这些话在我们中间激起了什么样的感受。要认识我们敌人的真面目，这些例子就绰绰有余了。

话又说回来，这件事给这些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在这段惨痛遭遇后，一些人只想回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给大部分人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还塞了点钱，帮他们从头开始。

我们帮助希望留下来的人找了工作。决定他们要住在谁家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们都想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那些人受到

了残酷的欺骗，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现在与我们团结在了一起。还有几个人，因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强迫他们开机器，结果出事故受了伤，失去了几根手指。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高尚。还有一群人接着给公司干活。有些人属于“弗朗哥卫队”<sup>16</sup>。还有些混进来的警察，试图打探消息，瓦解我们的抵抗。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丝毫不关心我们的处境，只管自己能找到活干。

直到罢工结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搞这种“人才引进”的把戏，但是从岗位上逃离的人很多，他们终究没能瓦解工人的团结，没能使我们大批复工。

而到了罢工结束，罢工者中的叛徒人数始终没变。这十三个人的名字，这些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出卖给剥削者的叛徒名单，将永远为班达斯和工人运动的历史铭记：艾米利奥·蒙赫、劳尔·戈梅斯、费里西安诺·贝斯、塞昆迪诺·弗朗西斯科、佩德罗·安杜拉加、胡里安·安杜拉加、阿尔贝托·洛哈斯、毕尔巴鄂、佩德罗·伊图尔韦、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塞维里诺·伊斯基尔多、伊格纳西奥·纳瓦斯凯斯、坎迪多·萨拉查。

## 局势升温

施展了浑身解数，还不见我们的抵抗何时结束，他们就又用了其它方式相威胁。

---

<sup>16</sup> “弗朗哥卫队”（Guardia de Franco）是1944年至1977年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西班牙极右翼准军事组织。组织成员主要长枪党的“老近卫军”，对政权内部的变化采取了不定的立场。弗朗哥死后解散。——中译者注

三月中旬以来，他们拒绝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妻儿也不能在门诊看病。3月15日的传单对这种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写道：

“昨天，我们呼吁全比斯开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今天，我们要更有力地重复这句话。”

“大家看到，龚德拉和卡尔巴乔那伙人对残暴不仁。但这一回，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谁也想不到，他们居然想用疾病打倒我们，工会也在助纣为虐。昨天，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失业工人拿着失业卡去领医疗保险时，他们说：‘去班达斯，那里有活儿干。’”

“你们就是这样理解工人尊严的。难道能够容忍这样的暴行吗？你们对我们妻儿的痛苦就没有丝毫尊重吗？”

“龚德拉，只有你要为此负责，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来找你算账的。”

“我们向比斯开的全体医生呼吁，请你们不要听从龚德拉的指示。因为我们肯定，你们不想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这么大的污点。”

“同志们：要是他们以为使出这种招数就能打破我们的团结，那就错了。不管有没有医疗保障，我们都将继续前进，直至取得正义。就像我们现在吃饭不靠龚德拉一样，就算他不让我们看病，我们也会想到办法的。”

的确如此，因为比斯开不缺有良知的医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搞起了一个小型的医疗救助组织，为工人家庭看病

后来，警方又发动新的攻势。警察搜查了奥萨巴的家，抓走了

跟他住在一起的代表团成员路易斯·莫亚。四月以来，警察频繁传唤代表团和联络员，说他们应该对罢工久拖不决承担责任，借此威胁他们。

4月4日，为了声援我们的斗争，许多公司停工了一个小时。当天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大约有一万名工人和几百名学生参加。

镇压是残酷的。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向示威者施暴，对妇女也毫不留情，打伤了许多人。快三个小时里，市中心多处发生冲突，阿雷纳尔（Arenal）、格兰维亚（Gran Vía）、萨瓦尔夫鲁（Zabálburu）等地，都能听见人们喊道：埃切瓦里！班达斯万岁！自由！

整个四月里，为了我们遭受的一切不公，为了反对工会的不作为，也为了声援我们的罢工，大家都在罢工抗议。罢工人数一度超过四万人。



### 神父的抗议

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八点，为了抗议我们这几个月的遭遇，

八十位神父上街游行。他们从教堂出发，缓缓走过格兰维亚，来到莫尤阿广场。他们在政府大楼前待了二十分钟（省长拒绝接受他们签名的声明），然后往主教府方向走，递交了同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近来，当局对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剧。警察暴力镇压和平游行的群众，随意拘捕、审讯、殴打、虐待被捕者，为了拿到证词，就使用上述手段威胁他们。”

“受到此类非人待遇的很多人，不过是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责任，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或是公共权力定义为‘地下’和‘非法’组织里的成员。他们只是在铤而走险，表达自己的天赋权利。人人都应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我，自由地与他人交往。”

“在工人的问题上，我们谴责1月27日对工人游行的暴力镇压、3月12日对‘德国矿厂’的一百四十名工人的随意拘捕、4月4日对为声援班达斯轧制工人进行的游行的暴力镇压、系统性的迫害、逮捕、审讯以及对工人领导者的无理罚款。最后，我们也谴责不公平地流放一位工人领导人离开西班牙的做法。”

“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谴责对巴斯克国庆日（Aberri Eguna）进行的暴力镇压、逮捕、随意罚款、审讯、流放，以及系统性地迫害各个政治组织成员的做法。”

“作为教会的神父，我们有义务维护众人的神圣尊严。我们以和平的方式，公开谴责警方与当局的镇压行动。”

“我们这样做，是为我们作为人的良心、作为神职人

员的良心。这一良心使我们不得不为人民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有罪。

1967年4月12日于毕尔巴鄂”

罢工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开始觉醒了。这些事件不过是群众觉悟的高潮。在资本主义和它的统治工具对我们的加剧压迫下，工人阶级和各类团体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了回应。

虽说整个半岛的工人都做出了回应。但毫无疑问，是比斯开的工人在最坚定地捍卫我们。

在班达斯工人的事业面前，还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可惜的是，这种事很少见。也许在我们这儿，最好也没有贯彻到底吧）：所有的地下组织决定统一行动，发动自家成员和整个工人阶级，投入反抗资本主义的具体行动。（但不用说——也是工人最终落败的部分原因——有些左翼团体难以理解一件事：只要当局尚未成功弹压罢工，工人还有机会进一步扩展罢工。真是可悲！因此，这些组织的声援行动，始终超不出象征性的作用。不过，某些团体确实尝试过推进斗争，尽最大可能让行动走到最远。）

## 宣布紧急状态

看到我们团结起来，政权感到了威胁，再次脱掉了欺骗大众和“自由化”的面具。在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压力下，比斯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星期六。政府机关“字母”（Cifra）通告了紧急状态，内容如下：

“在最高贵的国家元首阁下的主持下，埃尔帕多宫召开部长会议。

根据内政部长的建议，批准法令：在比斯开省，三个月内中止《西班牙宪章》的第 14、15、18 条。

颁布法令的理由是，近几个月来，比斯开省屡屡发生非法行为，影响了国民经济、劳资和平、工作自由权，违反了法律规定与相关法院判决。这些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且地下组织在境外支持下异常活跃。

为维护国民利益，内政部根据现行法律采取必要措施。

停止生效的法律条款

《西班牙宪章》中停止生效的条款如下：

第 14 条——西班牙公民有权在国内自由移居。

第 15 条——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西班牙公民的住所或是进行搜查，除非有当局的搜查令，且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进行。

第 18 条——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外，不得随意拘捕西班牙公民。

在七十二小时内，应当释放拘留者或移交司法当局。”

果不其然，当地报纸都在热烈拥护新的局面。

《西班牙邮报》发表了一篇“编辑说明”，企图掩饰此举的影响范围：

“我们可以说，政府宣布最低限度的紧急状态是为了暂时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确保公共秩序不再受到影响。因为有些人一再试图扰乱和平。”

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还谴责所有为支持我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游行和罢工，称之为“街头暴乱”。电视台和报纸大力报道一件西班牙水手的事件：在意大利的锡拉库扎（Siracusa）港口，一艘挂利比里亚旗的船上，德国官员扇了西班牙官员的耳光。为了维护这名官员，水手们在4月3日离开了岗位。

几个月前也有类似的事件：当时有家荷兰工厂，一些年轻的西班牙女工抱怨食堂的饭菜，厂方就开除了她们。西班牙劳工专员为这些女工辩护，要求涉事公司撤回决定。

当然了，这两件事不过是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虚伪。他们无非是想保护移民带回西班牙的大量外汇。为此，他们把国外的工人团结与廉价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又谴责和攻击工人声援我们的活动。

## “人头滚滚”

在比斯开的新局面下，首先就是一连串的逮捕和流放。经过了彻夜搜查，警方逮捕了一百五十多名工人积极分子。

五一劳动节前夕，官方把十五名被捕者流放到西班牙各地。工人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长途奔波，路上睡在监狱，就这样一个个扔在偏远乡村，身无分文，真正的一无所有。一路上都是三人一

组，吃喝拉撒不分开。尽管西班牙农村地区也生活在国民警卫队的淫威下，但在许多时候，同样受弗朗哥国家压迫的人民仍然出手相助，帮助了工人。他们也在等待自己的解放。

他们的家属上监狱送饭，才得知流放的消息。而相关的官方说法只是一句“人不在这里了”。家属们上警察总部打听消息，警方打发他们去了省政府，在那儿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一名官员给了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这段时间，家属们心急如焚。

监禁和流放还不知足，为了阻止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他们在毕尔巴鄂集结了不计其数的镇压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当天没有出现在往年游行的地方，而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发起反击。

看吧，我们的报纸无耻又腐败。5月2日，毕尔巴鄂的《西班牙邮报》发表了以下评论：

“5月1日无事发生。大批毕尔巴鄂人利用周末假期，在周六离开了镇子，前往布尔戈斯、拉里奥哈等避暑的沿海城市。昨天，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成千年来到晴朗的海滩。多么美好的夏日时光啊。镇上没什么人，都出来玩了。当然了，5月1日这天无事发生。虽然为了避免险情，治安部队在各个要地巡逻，但昨日的毕尔巴鄂度过了平常的假期。温度宜人、车辆稀少，当地一片祥和。”

大批毕尔巴鄂人“离开镇子”，因为警察堵住了他们嘴，把人统统赶走了。他们在“万里晴空下”进了监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阴影中。报纸说“这天无事发生”，想必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当然”指的是紧急状态、野蛮镇压，还有当地的军事接管等等，

都是“理所当然”的。至少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意思。而在接下来的数月，无论哪一家报纸，都不会讲出在这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心知肚明，却一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他们无法掩盖这个劳动者的节日在其它城市的热烈反响。比如在塞巴斯蒂安，节日前几天里，当地分发了大量传单，呼吁工人发起示威，以行动声援班达斯工人。工人决心庆祝五一。那也是三十年来最盛大的游行。半岛各地都在高呼：“班达斯！”和“埃切瓦里！”，它们已经成为了劳动者的口号。

### 抗争接近尾声

五一节之后，镇压继续逞凶肆虐。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屡次在奥查考加教堂包围我们。他们撤销了我们的出入许可，不准我们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在公共广场上也不行。

即使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还想继续罢工，团结一致抗争下去。

那段时间，封锁越来越严密了。即便如此，5月5日的传单仍表现出坚定的战斗意志：

“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说他人是在巴黎，看来不是假话。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代表团还没从马德里回来。他们在等龚德拉先生回来，告知公司方面的答复。工会的全国代表向公司提出了提议，不知又是什么结果。”

“自然，没有人比龚德拉先生讲话分量更重。龚德拉先生就是公司，就是董事会。龚德拉先生乃大小股东集一身。

只有他的话能算数。他是比斯开唯一的老板。别人也要让位，承认做主的是龚德拉先生，他很有头脑。而我们只想说，他就是个混蛋。”

“但他不能让我们回去。就算有皇帝发话，有上帝的指示，都不行。‘龚德拉神’施展了所有法力，还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又动了动万能的手指，把整个比斯开都圈进了紧急状态。”

“最近在比斯开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老板们口中的很有头脑的龚德拉造成的。”

“很有头脑的龚德拉流放了十五名工人。其中一位是公司代表团成员：我们的同志路易斯·莫亚。”

“龚德拉神继续下达敕令，继续逮捕和流放。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既然饥饿无法打倒我们，他们又用上了监狱、放逐、棍棒。龚德拉这个神，可不是为他人殉道的基督徒的神。龚德拉这个神只会为了自负去杀害别人。”

“毕竟，龚德拉先生并不在乎什么流放。他满脑子是怎么上巴黎、马德里、瑞士挥霍。他坐的是豪华车厢，住的是头等酒店。龚德拉神把自己女儿安置在豪华套间里，而不在于流放或狱中工人的孩子会怎么样。”

“这就是法力无边的龚德拉。唯我独尊，草芥人命。”

“龚德拉先生，你正在做不少善事。多亏了你，我们班达斯的所有工人团结了起来。多亏了你，工人阶级实现了三十年来最大的声援运动。多亏了你，你的资本家伙伴们也尝到了罢工的滋味。多亏了你，整个比斯开进入了紧急状态。”

多亏了你，已有且还会有更多人流放。龚德拉先生，你真善呐！我们该如何报答你呢？”

“你的女儿睡得很安详、住得很舒服……假如你继续敲打我们的团结，只会迸出火花。而在你的工厂，也就是我们的工厂里，机器会继续生锈下去。它们是不会开动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也决心为它继续斗争。”

传单里的话成真了。他们又流放了四十多人。还有接连不断的逮捕、刑讯、胁迫。

四月末，工会召集了我们的代表团，上马德里与索利斯<sup>17</sup>会谈。故意拖到五月初之后，会才开成。他们坐火车返程之前，剧本就写好了：警察要在布尔戈斯扣住他们，然后统统流放。收到我们的消息，他们才在决定性的关头，为了罢工赶回毕尔巴鄂。

警方得知他们回来后，立即把人传唤到局里。最高警察长官和一票高官都在场。安全总局的特派员凶狠地斥责了他们：

——“你们不再代表任何人。当然了，你们不能举行任何会议，也不能给工人提什么意见。”我们的领导者回答——“我们是自己的同志选出来的。直到现在，大家还信任我们。此外，我们还有工会的职责在身，是工会叫我们去马德里的。”——“在警察面前，工会啥也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啥也不是。最好注意自己在做什么。”

抗争开始变得无望。公司利用我们的处境发布了“最后”的最

---

<sup>17</sup>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913年9月27日——1990年5月30日），弗郎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年任民族工团主义中心全国代表，1957—1969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年任劳动部长。——中译者注

后通牒，尤其是威胁要按照劳动合同，把许多人赶出家门。

鉴于警察不断迫害、无法举行集会、公司威胁把工人赶出家门，我们向工会提出请求（另外的章节会具体说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做出我们的集体决定。但工会不答应。

我们的代表们以工人选举赋予的权利，发表了复工声明。虽然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肯定是回不去了。

这一刻是残酷的。多少天来，我们饱受这项决定的折磨。报纸却这样宣布我们复工的消息，以下是《北方报》(La Gaceta del Norte)上写的话，署名为阿西隆 (R. Acirón)：

“真是令人愉悦的消息。这个对民众，对许多家庭与国民经济造成不快后果的问题，已经圆满结束了。人们经历的社会噩梦，虽然迟了一点，但还是切实解决了。”

对此，我们交给读者评判……

### 罢工结束了 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有三十二名同事留在了外面。公司解雇了他们。

其他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受的对待可想而知。最初的日子里，大家都悲愤交加。

回到厂里，刽子手们更加歇斯底里。他们躁动不安，渴望报复。他们也不可能不这么做。

我们看上去输了，但其实我们赢了。永远是胜利者的他们，却输掉了这场最危险的战役。因为他们非常懂得，自己的把戏收效甚

微，却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后果。

当我们的抗争结束时，管理层还发表声明，说大部分工人始终“工作表现良好”，说我们“没有积极参与冲突”。这是允许我们回去的理由。这是谎话，他们心里清楚得很。我们像是一个人一样在战斗。回到厂里，等待我们的自然是加倍的暴虐。

当工贼的无耻货色都爬了上去。这是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更加困难。在每台设备旁，少说都有一个他们的人。不难想象，我们后来是怎样在公司里战斗的。厂里的对抗，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同样如火如荼。

调动职位后，卡佩拉斯特吉把他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别人都在谋划什么，你们不都看到了？你们也给我混进去。”“不管你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立即汇报。”

实在是悲剧，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受着同样的剥削——成为了反对自己人的“第五纵队”。但这是不足为奇的。

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继续战斗。

但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同事在对付工贼的时候，背了一些罚款。于是，我们开始为窘迫的家庭筹钱。我们不想动用储备金，因为遭到解雇的（还有坐牢和流放的）同事的处境也很艰难。搞不好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需要我们的资助。

我们受着严密监视，尤其是紧急状态的压力巨大。因此，我们无计可施，只能再试试合法募捐。为此，几个同事向工会提出了问题。工会告诉我们，这件事归人事主管负责。第二天我们去找他。卡尔巴乔说他要请示上级，过一天再回复。

他们当晚就给了回复：警察后半夜从家里带走了这三人，流放到西班牙的不同角落，一直待到紧急状态结束。

但终于，经历重重困难、克服无数恐惧，我们还是办到了。

这样的情况下，管理层继续实行着恐怖和“歼灭”计划。他们不断处罚我们，奖金减少到七成等等。

不用多说，这些情况对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新员工经验不足，一些同事的离去更是雪上加霜。这是资本主义为我们的罢工付出的额外代价。罢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唤醒了部分工人阶级，还导致了产量损失和客户流失，引发了公司内部的不断抗争。而有传言说，龚德拉会夸大班达斯的“糟糕状况”，用来给巴斯科尼亚的经营危机找借口，作为解雇九百名工人的理由。

罢工结束三个月后，到了九月，我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工人询问工会，什么时候才能选举代表团和联络员。工人敦促继续罢工前搁置的协议谈判。新任的工会社会部副书记，狡猾的巴亚斯建议我们给管理层递联名信，因为目前看来，很难给我们选代表。

大家一起起草了联名信。两位同事把它交给了人事主管。

这一回，答复也很快。交信的两人没几天就收到了政府的信：

“鉴于最高警察当局向省政府提出的申诉；

本月七日，您与另一位同事向‘班达斯冷轧’管理层递交了一封公司多名生产者署名的文件，内容如下：

以下签名者要求通过己方委任的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会谈，讨论公司在1966年的集体协议相关事宜。

1967年9月7日于埃切瓦里’

您无视规定，不经工会上交这份文件，表明您也是编写与提交这份文件的主要责任人。这一行为势必引发工人动乱，或导致公司发生新的集体停工事件，从而影响到公共秩

序与社会稳定。

鉴于上述事实，您犯有现行 1959 年 7 月 30 日《公共秩序法》第 2 条 C 项、Y 项中的行为。我司依照上述法律第 18 条和第 19 条，对您处以两万五千比塞塔的罚款。”

可想而知，我们今后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斗争。我们还要继续遭受迫害。但由于他们犯的大错，工人事业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而对我们来说，还是一样的。新的工人队伍将走在前面。直到有一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实现最终的目标。

公司解雇了工人领导者，斗争变得更困难了。但在我们当中，有更多人肩起了责任，在一线的工作中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公司用解雇“去掉病枝”，结果却适得其反。即使他们用武力逼班达斯工人去了别的地方，最重要的东西还是留下来了。他们不是病枝，而是长出的新芽。我们的团结依旧如故。离去者托付给我们的勇气与意志，长存我们心中。

这些人离开公司后，找工作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可他们依旧满怀希望、坚持斗争，为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公司慢慢回到了常态下。工会曾保证在经济、求职、住房等方面，为公司解雇的工人提供帮助，却迟迟没有兑现。

工人阶级再一次地肩起责任，向为了自身事业献出一切的人伸出了援手。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工人团结的义务，也是为了守护工人阶级拥有的最大财富：工人的领导者。

到这里，我们已经从头到尾讲述了这场罢工的故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我们要考察应当格外重视的方面。

## 第二部分 一些基本方面

###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对于半岛上的工人阶级来说，经济来源是罢工中最头疼的问题。我们没有罢工权和真正的阶级工会。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也没有工人的罢工基金。强制上缴的官方工会会费（占我们总收入的 2.6%），就用来供养内战结束后不断膨胀的弗朗哥官僚机构，或者其它隐瞒去向的次要用途上。

正如《国家条例》和《公司内部制度条例》所体现的那样，资产阶级法权剥夺我们的权利还不知足，还要在工人身上加以重负。

这一切直接而明确的目的，是叫工人无法长期罢工。假如工人不顾禁令和法律威吓，毅然决然发起罢工，不出几天就会捉襟见肘，然后家人就会劝他们复工。饥饿永远是让我们低头的好办法。因此，西班牙多年来的罢工都很短，遭遇的困难都很大。罢工者筹集资金的尝试，向来都要遭受严厉的惩戒和迫害。除了动静大的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等地区的总罢工之外，报纸的沉默也加剧了困难。整个工人阶级对平日里的罢工一无所知。单个公司发生的孤立罢工，总是一击就垮，除非能速战速决。但工人一动起来，资本家总会用饥饿、工人没有结社权、社会政治部（及其审讯）、殴打和逮捕，迫使工人空手而归，不给还手的机会。我们可以说，在这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都是无用功。但它们传承了工人斗争，培养了新的

工人领导者。它们时不时地提醒法西斯资本主义，就算后者能无数次打倒人民，也永远无法驯服人民。资本主义给“顺民”的面包和足球，为“逆贼”准备的监狱，是绝无法麻痹人民的。

班达斯公司最后一次发工资是在12月10日，结清了上个月的工钱。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当月20日拿到下一笔钱。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都能撑到那一天，但我们还要考虑到子女众多，或是有特殊情况的人。

从一开始，大家都希望尽快搞清楚跟钱有关的事。一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容易吵架，而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问题就更棘手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保持团结和冷静。

我们认为，让每个家庭自己决定是否需要补助，是最有教育意义、最符合众人的慷慨与正直的做法。

为此，我们打印了一些表格，让每个人写下家庭情况，然后注明自己是否需要补助。配额大概是每十天五百或一千比塞塔。尽管危险重重，我们总能按时发放补助。

大家始终认为领到的钱是神圣的，自己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

## 我们的工作

12月20日起，为了让大家手头宽裕一点，免得钱不够花，我们决定尽量打工。就是说，不管多苦多累，人人必须尽力找活干。一周后，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至少能靠打工补贴一部分家用了。

许多人都去干苦工了，比如露天作业等等……但他们下午来到集会，加入充满同志情谊与团结的气氛中，对辛苦都是毫无怨言的。

我们已经几个月无所事事了。出门打打工，也省得我们太闲，对精神状况和家庭生活造成什么问题。

做了这个决定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帮大家找工作。这些同志成天往工地和职业介绍所跑，找了很多（包括公司高管），为大家找活儿。大家一门心思找工作。在集会上，我们宣读了找到的工作，按照个人技能分配给每个人：电工、装配工……而绝大部分人，包括办公室职员在内，都在不同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 毕尔巴鄂银行的阴谋

毋庸置疑，看到我们四处打工，管理层又惴惴不安了。公司的算盘全都落空了，不见办公室员工回来上班，也没收到请求复职的“求职信”。他们发觉需要“新的说服方式”。

虽然他们的手段没能奏效，却催生了“资本家的团结”。龚德拉也是毕尔巴鄂银行的董事。他想出了阴险计谋破坏我们的经济状况。众所周知，半岛的大银行直接控制着大多数产业，大小公司基本都受制于银行的贷款。不用说，他们会借助毕尔巴鄂银行的力量对付我们。其实银行联络了贷过款的公司和工厂，通知它们，如有班达斯的罢工者在那儿打工，应立即开除。

当然了，银行不会承认自己插手了。但事实胜于雄辩。几天后，有些工人在集会上发言：内维翁装配厂开除了我们四十个人！明天阿里戈利亚加（Arrigorriaga）的雷索拉（Rezola）水泥厂就要和我们结账了！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在场的人怒火满腔。有些同事的话使我们理清了头绪。——“经理通知我们走人的时候，很委婉地

讲，他这么干是违反本心的，这是公司的所有者毕尔巴鄂银行的命令。”“当时我们在费尔米卡（Formica）上班。下午四点，他们也说收到毕尔巴鄂银行的指示。我们连一天都没干满”……

看样子，把工人赶出内维翁装配厂的就是龚德拉的女婿，也是他最忠顺的手下，吉列尔莫·巴兰迪雅兰（Guillermo Barandiarón）。内维翁装配厂的倒霉蛋只能听上头的话，解雇我们的同事。

罢工四个月后，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找的借口是“过去几个月内的非法行为……影响了工作自由权（!）”当然了，它指的想必是公司为了假装工厂开工，招募新员工时遇到的困难。毕尔巴鄂银行在内的有权势者，四个月前否认了我们的“工作自由权”。但没人要求停了这帮金融强盗的宪法权利，然后流放他们。

可他们的算盘再次落空了。还好我们都在小作坊和小工厂里打工，毕尔巴鄂银行的爪子才不能扼住我们。失业同事慢慢找到了新工作。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比方说，从班达斯来的人，求职的时候都会受到优先考虑。

## 声援活动

虽然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得到了真诚的帮助，但不难理解，大多数人都没法养活自己。许多人找工作找了很久，只能找到几个小时的零工。我们什么都得干，许多差事的收入也很低。

因此，比斯开和半岛各地工人的声援帮了大忙。老实说，我们获得的大部分援助都来自工人世界，这是当然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他人的帮助。我们将尽量客观地道出其它方面的支持。

几周后，人们才能认识这场罢工的意义。当我们发表了最初的声明，表达坚定的立场后，各地都发起了声援活动。

如上所述，我们在 12 月 20 日给大家发了第一笔补助。我们好不容易才凑出了钱。有些工厂的工人把积蓄都捐了出来，托代表交给我们。难能可贵的是，有一家厂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停工数月了。

最初的日子里，一些神父和教会人士也捐了钱。

此外，早在一年前，我们就通过每人每周自愿交二十五比塞塔，建立了罢工基金。这笔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律师费，以及厂内组织工作的开销。到了罢工初期，我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这笔钱。我们用它印传单、支付旅费等等。

一开始很少有人申请补助，除非有特殊情况：孩子太多、家里有人生病等等。既然我们手上攒了钱，那么失去圣诞节的一笔奖金，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众所周知，工人家庭都提前花了这笔钱，买了新鞋子和新衣服。而在平时呢，他们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从一月起，人们定期支援钱物，数目还不小。我们存下了一笔钱，要是官方卡住汇款途径，工人靠储备还能坚持一阵子。钱都藏在警察够不着的安全地点，高度保密，只有个别人掌握内情。



## 补助的分配

从一月开始，我们每十天发一次补助。当然了，我们不能为了钱闹矛盾。有些人抱怨说，没必要拿钱的人也拿了，还说这些钱没管好。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在传单上要求大家，不管怎样，在钱的问题上都要诚实。让我们引用传单上的几段话：

“所有人都必须工作。如果你不找工作，你要补贴就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这样做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大多数人都在打工，干着又累又脏的活儿！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为了战斗到底！如果你的家里没什么问题，而你又不想工作的话，那就别要补贴！”

在另一段中说道：

“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补贴。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我们的家庭不会缺少任何所需。因为我们有所有工人的支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吧。”

最后要说的是，本次行动中的工人时常面临紧急需求。比方说，有些同事的亲人去世，不得不出远门，有些人得付房租等等……我们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帮助。我们的立场是：坚持到令人厌烦的地步，秉持最公正的态度，决定每个家庭是否需要帮助，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宁可给没有实际需要的人发补助，也不会拒绝任何要求基本帮助的人。绝大多数人全心全意投入斗争，要是有谁在钱上要小意思，就太荒唐了。我们真正尊重了每个家庭的决定。不要忽视这件小事的意义。它跟许多事一样，都能这样解释：工人富有热情、勇于自我牺牲。面对艰难险阻，总有一股工人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于是我们担起责任，绝不辜负良心和工人阶级。

### 其它方面的声援活动

我们敢说，没有一座比斯开的工厂或车间没捐过钱支持我们的罢工。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通过工厂委员会或者地下工会的积极分子，定下日子把钱交到我们手上。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巴萨乌里的集会现场：“我们也是厂里的……给你们带钱来了。要是你们继续干下去，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们学徒工也带了一点‘钢镚儿’。”这些十四到十七岁的孩子为能参与我们的斗争，脸上乐开了花。他们很少缺席会议，来

开会的时候，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许多孩子渴望搞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讨教他们厂里的具体问题。这是团结斗争的一刻，见证了未来斗争的参与者，也许是领导者，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争得阶级解放，以后的责任就落在他们肩上了。

比斯开的退休工人也在这段历史上书写了激动人心的一章。从集会一开始，他们就坐满了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会场的前排。他们的目光中，饱含着长年艰苦劳动留下的疲惫，却掩饰不住如愿以偿的欣慰。许多退休老人曾是工会或政治组织的成员，他们打输了战争，连同战争一起输掉了我们人民解放的巨大希望。这些年里，他们都在半岛上从未有过的残酷条件下劳作。不难理解，这场热火朝天的工人斗争，就像是他们回到了往昔峥嵘岁月一样。

但“声援活动”这一章里，为什么要提到退休工人呢？很简单，因为退休工人本来就拮据，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可怎么样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不收钱，他们就非常生气。“——别管我们如何，你们必须坚持下去。饥饿无数次地打倒了我们，但决不能让它打倒你们！”我们只能哽咽着，在清单上写下：“巴萨乌里的退休工人……比塞塔。奥查考加的退休工人……比塞塔。一位退休工人一百八十比塞塔。”社会政治部闯入奥萨巴同志家里的那一晚，他们拿走了支援班达斯的几个装钱的信封。一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卢恰那的退休工人”……

还有一回，我们几位代表收到邀请，上了圣马丽娜结核病疗养院。一位教士在那儿等着他们，他说：——“几天前，我们疗养院收到了一笔巨额捐款。病友们都很关心你们的罢工，决定把钱捐给你们的家庭。大家都很激动，齐心想帮上忙。这里是我们收集的钱。病友们还说，往年这几天在巴萨乌里募集的钱，也要交到你们手

上。”这些帮助对我们的意义难以言表。当罢工结束后，我们所有人都来到疗养院，与他们共度了一个礼拜天。

声援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省里的许多教区都开展了募捐。几个娱乐中心组织了捐款活动，学生们都踊跃参与了。

随着 1967 年的到来，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萨贡托、巴伦西亚等地，陆续发来了声援我们的信件和电报。从一月份开始，半岛各地的许多公司和工人组织都向我们派了工人代表（法国的总工会（CGT）和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代表也多次拜访我们）。他们的任务是把公司里收集的钱，以及声援斗争的信件（有成百上千工人签名）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也都回了信。一封回信的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们已经罢工了五十二天。我们将继续保持坚定和团结。我们又怎能不与所有工人团结在一起呢！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罢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就算是为了工人阶级，我们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你们的工会代表把这份心意亲手交给我们，这份无可估量的阶级心意，我们永志不忘。当然了，一想到对你们的承诺，对你们光明未来的承诺，我们就坐立难安。太多的阶级情谊，是我们无法一一回报的，而你们的声援也是如此。

你们的钱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有了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用太担忧经济问题了。不要担心，饥饿打不倒我们！你们和其他工人的支持让我们能坚持下去。

我们希望亲口告诉你们，班达斯冷轧的工人有多感谢你们。而我们只能以抗争的胜利当作回报。这场胜利同样属于所有兄弟般支持我们、助我们坚持到最终胜利的工人。

一个亲密的拥抱。

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与联络员  
1967年1月21日于埃切瓦里”

毋庸置疑，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这代表着，就算相隔千里，就算沉默和迫害分开了我们，就算在交往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工人们还是向寻求团结前进了一步。更不用说，他们的到来叫我们多么激动了。他们全都参加了我们在巴萨乌里的集会，把它变成了战后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头一场数月之久的工人演讲会。

这些来访也影响了他们。因为近距离目睹了我们罢工的人，他们的组织、团结、意志，都为罢工的深刻印象所鼓舞。大家都不由地认为，战后工人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了。班达斯的罢工已经让“埃切瓦里”声名远扬了，名声都传到了比斯开以外。它已经和人民的诸多光荣斗争一起，成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象征。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 （一）我们的集会

多年来，与所有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工人们都不能自由集会。街道、广场、郊外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活动室”。但在这些场

合，公共权力总是像看犯人一样盯着我们，还经常殴打和监禁我们。

的确，不少时候，我们能在教区等场所得到底护。一些神父出于良知，自认为有义务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尤其是当一个人享受着特权时，比如“活动场所”也是特权。

前面的章节已经描写过我们的集会。当然了，如果要谈我们的罢工，没法不提集会。它们是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当地的教区里举行的。每一天里，它们都是斗争的中心，是我们的觉悟和工人精神的源泉，是我们的演讲台，是聚会、团结等等的场所。

要描述它们可不容易。也许必须亲身参与，才能体会到集会的全部意义，才能在回想起那一幕时，激动得不能自己。不可否认，官方数月以来都在费尽心机阻止我们开会。他们威胁主教和神父、派几队“灰盔”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包围工人。他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假如一种办法不灵，就换一种更强硬的办法。

与许多罢工者一样，我们开始在街头集会。比如离埃切瓦里不远的巴萨乌里广场，我们在那儿开过会。12月中旬，我们在奥查考加的教区学校里集会。圣诞节前，我们能在巴萨乌里圣佩德罗的华丽教区里集会了。我们又在那里坚持了几个月。

而政府血口喷人：“教堂混进了外人。”“圣洁的所在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这些集会没有官方批准。”等等。

在巴斯科尼亚的董事会上(他们不需要警察在场和“官方批准”就能开会)，龚德拉汇报说：“主教没有禁止巴萨乌里教区集会，都怪那个……跟我作对。”“省长坚持叫我等马德里的指示。”“我要再去见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必须让他禁止这些集会。”……

巴萨乌里的会场只能坐三百人，站一千人左右。刚开始几天，现场只有六百名班达斯工人。但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从比斯

开各地赶来。到后来，会场外面总是一大帮人，进都进不来。他们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同伴，传递了这份激情，使巴萨乌里成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培养积极分子的真正学校。

在这些年头里，工人斗争蓬勃发展，但工人是没法集会的。少数工人只能利用自己家、公共场所、酒吧等地维持联系。而最近，郊外等地的集会越来越多了，但这些集会总是孤立的。这样一来，就不能实现最重要、最有教育意义的行动：工人讨论会。在其它时代，群众的意识、无产者的觉悟，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会、协会、“人民之家”等等进行伟大觉醒的。所以政权无法容忍它们。

不论如何，我们开了几个月的会。日复一日，我们的领导者和许多罢工工人、众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学生、知识分子等等，以三十年来禁止的语言发出了强烈呼喊：这是我们阶级尊严的、反对剥削的斗争语言，也是所有人团结起来反对压迫的语言……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已经回应了工人阶级兄弟、部分大学生、在场所有“反对派”对我们的期望。在讨论会上，他们一直叮嘱我们：“坚持下去，你们是所有人的象征。”“把罢工进行到底，你们不会后悔的！”“你们能做到如此团结，不用说，我们要向你们的罢工好好学习。”“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你们什么也不缺。但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们的激情、你们的勇气。还有你们保持团结一致，在疲乏和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本领。”

许多人说，工人只对足球和斗牛感兴趣。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是的，这些东西是用来麻痹我们的。为了不让我们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等等，他们拿体育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空白。而这一刻鲜明地表现出，文娱活动并没能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满怀热情地倾听着工人演说啊！这些昂扬的话语怎样激励了我们，

使我们的斗争有了十足意义啊！有多少场合，我们用无记名投票证明了大家的团结一致啊！不，决不是少数人在牵着多数人走！若是如此，顶多可以应付几天。不言而喻，假如绝大多数人不同意继续罢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管理层对这些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故意不想说，在需要征求所有人意见的重要关头，我们是怎样进行表决的。

是的，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许多工人兄弟，在一众警察和叛徒的面前，我们的罢工天天都在集会。有些集会可不一般。会上发生了许多非比寻常的事儿，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每一场这样的集会，都因某些不寻常的事而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集会上来到过多少工人的领导者，多少朋友啊！

要一一列举它们，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让我们盘点某些对工人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 班达斯女工的声音

必须讲讲我们的妻子。她们不仅对这场罢工，还对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对整个工人运动，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她们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斗争。妇女们占领了工厂，闯进了巴萨乌里工会会场。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变得错综复杂。我们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不断陷入孤立。但我们觉得，罢工也和妇女们切身相关，不让她们参与进来是不公平的。一次集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了众人的理解。我们决定为她们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大家都拍胸脯保证，一定跟妻子一起参加。

12月29日，巴萨乌里好像出了什么怪事儿。下午四点半开始，成群结队的妇女走上街头。到了五点左右，两百多名妇女已经等在了会场门口。五点半集会开始的时候，有三百多妇女到场。她们坐满了长凳，男人只能挤在后面。

她们到场后，分发了传单。上面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今天，班达斯的大家庭齐聚一堂。

为了给我们和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男人们和女人们，工人夫妇应当比以往何时都要亲密团结。

如果我们在家里保持和睦，如果大家共度希望与痛苦，那就没有人能打败我们。想想我们的父辈跟祖辈，他们曾在更加困难的时期，进行了奋勇斗争，捍卫着资本家一直想要夺回的美好之物。

我们得到了比斯开全体工人的支持，什么也不会缺。

我们要在家里相互理解，得到支持、鼓舞、力量！

夫妻双方共同讨论问题和家庭需求。两个人试试劲儿，总会有办法的。为了我们的团结！

所有工人家庭的团结万岁！”

然后，一位同志解释了现状：——大家都在抗争，为的是没有一个家庭流落街头，为的是让复工成为迈向解放的一步，让复工对于剥削者而言，不会是那么轻易的胜利。她们一定要理解我们牺牲的意义，也加入到工人事业当中。因为我们捍卫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我们的家庭也是它的一份子。

我们希望她们认识到自己也是班达斯的工人，与我们一样日日受压迫，甚至直接的羞辱，因为她们不得不去有钱人家里做临时工。正是那些有钱人，让工人及其子女得不到应有的面包、文化、自由、责任。此外，这也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奴隶的妇女，在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我们无法接受她们是家庭的囚徒。尽管有时，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她们应当与我们完全平等地分担责任。

“你们为了资产阶级妇女永葆青春，自己却过早枯萎了。你们擦洗的盘子上，盛放着揉进我们汗水的面包。在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眼里，我们家庭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非常“公平”。是的，你们生来就是为了擦盘子，而我们就是要流汗，就像他们生来是为了享受服务和指挥人一样。但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应该为了没有阶级和特权的新社会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人人都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劳动。

从此时此刻开始，从这场罢工开始，我们将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你们要发言，说说心里的想法、提出批评等等。希望你们讲出来，你们对我们的组织、资金分配等等，都是怎么看的……”

然后，一位女工，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和多年的工人活动家，向班达斯的女工们致辞。在她的话里，沉淀着丰富的阅历。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些简单的话语：

“你们在场开会，就是这些年工人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女人习惯了不受重视。我们的生活都是由别人决定的，都不用招呼一声。家里、街道里、市政府里，哪儿都一样。他们说我们只要照看好家庭和孩子就行了。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同样有义务和丈夫站在一起，站在会议上，共同决定切身相关的事情。在上学、物价、工资、住房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难道就低人一等吗？我们难道不重要吗？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规定我们扮演的角色。虽说许多时候，它也毒害了我们的丈夫和身边的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要更多地参与罢工事务。这样一来，你们才会感到罢工、感到集会的决定是自己的分内事。因此，你们的参与是实现真正的团结所不可或缺的。这件大事你们人人有份。现在轮到你们了，不要为了做作的胆怯而默不作声。最重要的是坦诚相待，尊重他人意见。”

没过多久，妇女们开始讲话。起初都怯生生的，然后很自然地出现了批评和意见。几位代表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建议、指出的不足。经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小争执，最后都圆满解决了。几位妇女还上台发了言。一位以坚定而平静的声音，面对在场众人说道：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克服胆怯，也不要再为钱的事儿吵来吵去了。你们已经听到情况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再抱怨了。关键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们的丈夫了。”

另一位也补充道：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挣钱，我们是要抗争下去。谁家都需要，不要再不公平地责怪别人了。刚开始那会儿，说实话，我们确实做得很糟。后来，我丈夫也找到了临时工。他赚了钱，邻居们也凑了点钱，我俩得过且过，也不多要求啥。他在艾德萨干活儿，那里人告诉我们：班达斯的事业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下回你们也要来帮助咱们。”

像这样，好一段时间里，她们都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不用说，看到她们也团结起来，听到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所有疑虑烟消云散。妇女们也产生了非凡的热情与觉悟。

我们学到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啊！起初，我们还担心集会开不开得起来。我们不知道她们会怎样反应。说实话，我们还不相信她们能如此冷静智慧地自我表达。最后我们很是自豪。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集会对维持我们家庭的团结与士气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次集会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两名班达斯女工的来信，要求我们在集会上朗读。来信原文如下：

“我们要接着团结下去，可别让这种事儿动摇了：收账的来敲门，我们关上门，然后问丈夫，你们不打算上班吗？他们回答说：你们自己去上班吧，看看厂里会怎么对待你们。到时候，你们也会加入我们了。我们当妻子的，也不希望丈夫过了三个月，还要当“新员工”回去，也不想谁的丈夫丢

了饭碗。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支持着丈夫。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一样需要我们。

许多人的丈夫之前还在干活儿，现在把活儿都给放下了。我们当妻子的，不是在说，也不是在想，他们不想干活只想休息，我们女人不这么想。要是女人想得很坏，我们的团结就要完蛋。罢工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过日子了，是要给班达斯大家伙争取好处。然后，我们还要感谢唐·克莱门特先生，他把会场留给了咱们。圣诞节夜里，他还要给班达斯做弥撒，说是要感化咱们。教民们想了想，然后说，是的，特别是要感化龚德拉和所有的管理层。

我们要接着和丈夫团结在一起，丈夫也不用看我们的臭脸。我们要好好管家，也要把想法跟他们讲。我们还要感谢忙着没停过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我们要感谢办公室工友的帮助，感谢何塞·安东尼奥天天为我们操劳种种，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丈夫。

就到这里吧。一名班达斯女工。”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29日开的家庭会议上，我想表达自己的真诚意见。昨天我没这么做，因为我没经验，而且要尊重丈夫的意见。

我要感谢所有人。感谢大家付出心血缔结了牢固团结。我的意见是要抗争到底，直到争得我们的权利。

搞了这么个组织，我们都没意见，都要听它的。

男人都在干活儿，女人也做临时工，所以家里不会缺面包。面包要是足够了，相信总有办法的。

就像昨天一位同志说的关于钱的问题，我发自内心为他的话鼓掌。

从别的公司收集来的钱，是为了班达斯的需要，也是为了明天的战斗。这样一来，如果别的工厂罢工的话，我们也能去帮他们。

现在我们要咬紧牙关，再次勒紧腰带，给所有人作出样子看看。”

这些话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一个阶级的朴实与斗争精神。在粗俗堕落又不利于团结的环境中，我们的妇女仍旧保持着激情与希望。她们懂得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全部意义。

这是一个尚未腐朽的民族的品质。剥削者再也睡不安稳了，因为我们会继续战斗下去，不彻底胜利绝不罢休。我们的行动不仅是向前的一步，也是一声响亮的“不！”，它是一种象征、一次见证。只有接受了奴役，一个民族才会成为奴隶。如果它起来战斗、起身反抗，它在内心深处就已经获得了自由。有朝一日，它将走向彻底的解放。相信我们就是这样，而这就是我们罢工的意义所在。



## 声援的声音：大学

还有一件事意义重大：学生们首次在集会上现身。毕尔巴鄂各个学校自由公会（las Cámaras Libres）的代表秘密集合，为了向我们表示支持与敬意，决定前来参加集会。

1967年1月14日前几天，也就是宣布判决前夕，集会现场门庭若市。超过一千五百人（大多数是工人）把会场和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钻了进来，跟工人代表说明了来意。几位工人领导者还在继续发言，讲了好一会儿。每天都是如此，领导者们表达了大家的看法，为工人打气。讲话时，现场一片肃静。退休工人的热切关注、学徒工眼中深深的仰慕、全体班达斯工人脸上的自豪与满足，整个庄严场面深深地打动了这群学生。“我们的会上能有这样的气氛，那该多好啊！”——“我们开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安静和秩序。”——“我们得让同学也过来，这能学到多少啊！”……

接着一位学生走上讲台，宣读了他们在自由公会会议上写的信。当工人代表请他们上台演讲时，我们满怀期待。因为对在场所有工人来说，学生和大学，这两个词好像是从另一个遥远世界来的。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总是把它想象成更优越的所在。但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残酷迫害，我们还是很同情学生的压抑苦闷。

这位学生真诚地开始“忏悔”（*mea culpa*）：

“我们代表世代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背叛工人世界的学生，宣读这份信。如今的大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学生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不希望未来再一次背叛。我

们希望与你们携手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但到现在，我们没能给你们什么。唯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会如何贯彻这一决定。

我接下来宣读的话，是几小时前匆匆写出来的。公会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它。请当它是我们真诚的敬佩与支持：

谨代表毕尔巴鄂大学区代表大会，代表高等工程技术学院，代表德乌斯托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哲学系、社会学系。致班达斯工人们：

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在反抗压迫的行动中走在了一起。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来自压迫者这一边。

过去的四十四天里，班达斯的 564 名工人坚持罢工，这是工人争取正当要求的唯一办法。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社会的激烈冲突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引起的。这一制度不利于个人劳动的解放，造成了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制度是为了少数特权者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极权的力量扼住整个社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这场罢工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它的集体性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下，现有体制正驱使人们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完整的。

(2) 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要比体制的任何镇压手段都要强大。

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与见证就是一种教导。现在，我

们决定走进人民、向人民学习。虽然我们大学生自认为脑力劳动者，但我们还是不了解工人世界的现实，我们与它是脱节的。出于自负，我们曾以为自己更加优越。我们对脱离工人世界感到自责。很不幸，大学从未用它的财富（知识分子）服务社会，一心只为当权者服务，而人民从来不能过问这笔财富到底用在了哪里。我们从没有与人民对话过，也没有接受过人民的批评。

而现在，你们展现出了工人的空前团结。为了民主自由，你们勇敢地面对镇压，而我们希望作为脑力劳动者，与你们在斗争中团结在一起。

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希望与你们一样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团结不仅仅落在口头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全心全意地为你们服务。

1967年1月13日于毕尔巴鄂”

最后几句话引起了全场掌声。也许，大学不会那么顺利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在巴萨乌里的这一晚，我们目睹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一时胜利，也是意味深远的。

自那一天起，好几个月里，每晚都有新的学生团体把募集到的钱交到我们手上，加入我们的会议。

我们还听说，半岛各地的学生游行发出了呐喊：学生一埃切瓦里！学生一埃切瓦里！这是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它非同凡响的结果与未来的可能性，无需多言。

怀着真诚的希望，我们相信并期待着。

## 工人领导者的声音

三言两语讲不清班达斯领导者的贡献。或许要再次指出，他们无数次的发言始终是集会的中心，也是会上最重要的教育。

他们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他们在五个月之久的罢工中挺身而出，经历了勇气与创造力的考验。但是从未束手无策。随着话语一天天变得有力，他们也成为了真正的工人演讲家。

开始集会之前，我们都会小组讨论。想发言的人会告诉代表，由他们决定发言的顺序。领导者最后还要开小会，协调发言工作，以免遗漏什么要紧的事。下面是他们的一些话：

“显然，在几个月的罢工里，我们一直在花钱。我们的家庭手头也更紧了。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罢工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它关系到的不是几千块比塞塔，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对现行制度的种种腐朽败落之相痛加揭露。每过一天，敌人的真实意图就暴露一分。对工人来说恰恰相反，每过一天，行动起来的工人都在方方面面展现了本阶级的诚实与勇气。”

“假如到最后，他们拿武力摧毁了我们的抵抗，有些同事就要留在工厂外面了。有人说，出了这种事的话，就等于败了，所有牺牲都白费了，因为这跟搞一场十多天的罢工换

来的东西没啥区别。我要告诉这么想的人，你们不理解工人运动，也不理解这场罢工的意义。十五天的罢工和四个月的罢工能一样吗？假如我们没几天就屈服了，我们还能成为历史吗？谁见过12月15日的班达斯工人？工人意识的觉醒、工人的声援活动，罢工带来的团结、勇气、组织，罢工推动的工人斗争……这些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但这里不仅有班达斯代表熟悉的身影和声音，全省的众多工人领导者（能来的都尽量来了）也同样为我们熟知与爱戴。他们天天都为我们带来整个比斯开的支持。

“我们代表全省的工人来到这里。大家都希望成为这场壮观战斗中的一员。”

“你们不会缺钱，什么都会缺。你们不会山穷水尽的。你们身后还有我们呢。”

“深受你们信赖的领导人会一直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抗争证明了某位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民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的人民。但你绝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民。”

无法一一列举半岛各地工人代表予以我们的无数支持。我们的领导人介绍了来客后，他们发了言：

——“我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你们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了无价的典范。”

——“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而是加泰罗尼亚工人给你们的团结与亲密的拥抱……”

——“我们在这里与你们度过了一段历史性的时刻，回到马德里之后，肯定把你们的斗争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在我们家里、在工厂里，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出你们的英勇抗争、你们的团结齐力呢？”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现在什么也不缺了。比斯开的工人全都动了起来，参与到你们的斗争中了。需要的话，我们的家门也会为了你们的孩子敞开……”

——“上了你们这儿一趟，我会带着一颗充满激情、勇气、力量的心，回到我的土地上。你们已经成为了工人抗争的中心，你们的斗争就是他人的榜样和萌芽。”

充满同志情谊的场面在不断上演。我们一些妇女还摘下身上的配饰，比如胸针和纪念章等等，让这些人带回自己的土地。

——“把这个当班达斯工人的纪念，带回去给你们的妻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团结。”

——“回去就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日子的帮助。我们也在为所有人的孩子战斗着。我们将尽己所能抗争下去！”

还有些同事摘下了便帽，签上许多名字，让来者带回去给他们厂里的工人。这般亲密与团结的行为是道不完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吃晚饭，送人到车站才告别。

## 集会面临考验

当然了，集会并不总是愉快乐观的。有些集会比较特别。看看我们的遭遇，看看镇压是怎样不断加剧的吧。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得意识到这一点。

二月初一晚，我们去开会时，国民警卫队挡在会场门口，因为官方下了禁令。我们坚决不走，守序地等了两个小时。工人代表决定，必须要做点什么，抗议不公平的禁令。到了巴萨乌里警备司令部，他们得知，命令是国民警卫队的中校下达的。刻不容缓，他们立马上毕尔巴鄂的军营找中校。见到中校后，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罢工的情况，这些集会是绝对必要的，况且这只是公司内部问题。军官表示，他已得知对省长的批评意见，但事前提出才有用。此外，他还要派两个手下跟着我们。接受条件后，工人代表迅速返回巴萨乌里。大家在街上焦急地等待了两个小时，冻得半死。最后在晚上9点，终于能开会了。但我们又迎来了打击：我们得知，西班牙政府要把奥萨巴同志驱逐出境，警方正在找他。（其实前天晚上，也就是2月2日，警察逮捕了他的朋友，因为他们把奥萨巴和上门拜访的朋友搞混了。由于这一错误，我们提前知晓了政府的意图。）

在两名秘密警察和两名国民警卫队的面前，我们宣读了奥萨巴同志的信，信里说他被迫消失，同大家道别，鼓励继续斗争。

以下是信里的几段话：

“班达斯的同志们：

在这光荣的时刻，同你们分离对我实在是难事。但我们没有在思想上分离，因为我整天都在念想着大家……

……一想到有叛徒胆敢打破**团结**，我就气得发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那些叛徒将会有应得的下场。在我们写给公司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也绝不会分开……

就算重复到你们都厌倦了，我还是要讲下去。我们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必须视它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要让任何人打破它。收手吧，你们是没法愚弄我们的，你们不能破坏我们作出的榜样。如果罢工在饥饿中结束，或者你们用武力逼迫我们复工，那也是光荣的结局。但若是由于几个班达斯工人的背叛，罢工完了，那就不一样了。

我还有些话要告诉那些不介意自己的同事会不会留在街上的人，那些毫不理解工人运动、没有工人觉悟的人：好好想清楚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人生和你们的姓名，会为你们打算犯下的罪行毁灭。

而你们，工人阶级的骄傲，班达斯的雄狮，你们在工人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英雄壮举。在你们面前，管理层再也不能趾高气昂了。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只能用武力让你们屈服。让我给你们一个兄弟般的拥抱，把我仅有的一切托付给你们。你们给了我工人的精神。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从你们的榜样中，从你们每日的境遇中，我懂得了，为了结束我们的奴役，必须把生命献给斗争。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只有经历苦难，我们享受胜利的时

刻，才会更加愉悦。

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别让龚德拉赢了，不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你们要抗争下去。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只要我们还有钱，就没有理由低头。即使我们不能并肩作战，也请你们继续下去，不要放弃。要知道我们的罢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扑灭它。

现在我也要向你们的妻子道别。这些出色的女工提供了许多帮助。也代我向你们的孩子问好。我们进行的斗争，正是为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让他们能享受生活的美好，不用像我们这样，活在这个野蛮丑陋的社会中。

我还要给这些天里，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一个拥抱。那么多人从班达斯外面赶来，与我们并肩战斗，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

带着愤怒和勇气反击剥削者吧，别输给了他们。要用我们的苦难和团结建立充满爱、正义、真理的世界。”

那是个艰难的夜晚。经历了痛苦与愤怒的锤炼，我们的意志如钢铁般坚不可摧。就算枪口对准我们，也不能叫我们退后半步。

过了几天，国民警卫队撤走了。秘密警察又一拥而上。命令是马德里下达的。阴险的卡米洛直接下场，此人可是不择手段的。

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la Junta Social del Metal）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抗议下，工会才让我们使用巴萨乌里在建的新工会大厅。工会这么做无非是觉得，我们迟早要投降的。

这个房间，他们只许我们用三天。尽管这是我们的集会，但主持人是工会的政治干部，野心勃勃的巴萨乌里地区新任工会代表卡

里克斯托·罗曼（Calixto Román）。最后一次集会上，我们又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表决。大家再次地表现出抵抗到底的一致决心。丢尽脸面之后，工会就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我们开始在桑土楚的卡门教派修道院和教区等地“朝圣”。警察找上了我们（就我们的人数和规模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难事），还一路跟随我们，派出了秘密警察、武装警察的大巴和吉普车……换句话说，拿枪逼着我们。

我们找到新场地之前，只好连日在公共广场上开会。即便困难重重，我们的精气神没有低落。领导者继续在大家的支持下领导行动和集会。他们的声音每天都在激励着、鼓舞着我们。

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局面开始变得无望了。五月头几天，警察包围了我们集会的奥查考加教区。尽管带队的中尉向神父保证，只要我们离开就万事大吉，但还是收走了我们的身份证，抓走了没带证件的人。

五月的第二周，也就是我们抵抗的最后一周，就连在公共场所聚会都不行了。这就是我们受到的迫害。为了最后开一次会，我们的代表试着请求工会点头。工会的代表团和省长商量了一番，跟公司方面谈过之后（！）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自负傲慢的龚德拉，他想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拼命挣扎，就像是为他蒙受的耻辱（已经书写进了历史）进行报复。

我们的代表团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工会向报纸发出一份声明（经过了审查和修改）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建议大家复工。

对我们来说，这几个钟头是戏剧性的。当然了，大家都不甘心投降。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打击、那么多的不公，大家都觉得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尤其不想把领导者留在外面。

在公司的围墙边上，就在三年前第一次罢工的小空地上，我们开了最后一次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战斗结束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剥削者和特权者还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五个半月的集会发生的一切。重点是，我们认识到了工人创举的意义。就算无法记下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也没关系。班达斯的工人们，比斯开的工人领袖们，半岛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记者，所有人都是壮观声援运动的见证者。他们告诉了大众，工人没有沉睡，也未曾受到蒙蔽。等待罢工工人的不是墓地式的死寂，大不了是监狱的沉寂罢了。有时候，栏杆之间传出呼喊，穿过铁窗与高墙，引起了悠长的回声。我们相信，这是班达斯工人以及所有斗争参与者的呼喊。

## （二）传单

法西斯资本主义留给所有敌人的集会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知情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半岛上发行的报纸，不过是为制度服务的工具。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些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报纸，而一些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在通讯与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sup>18</sup>的打压下，少数杂志也只能

---

<sup>18</sup>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 (Manuel Fraga Iribarne, 1922年11月23日——2012年1月15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5—1976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年改组为“人民联盟”1989—1990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勉强发行。此人的任务是从这些出版物上，逐步消除对政权的温和批评。近年来，虽说很守规矩，它们大多数还是完蛋了。

控制媒体是资本主义最喜爱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思想上奴役着我们。社会影响力巨大的电台、电视、报纸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显而易见，他们愿意让给我们工会自由，甚至政党自由，因为只要我们没有夺取经济权力，他们将继续控制大部分的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要让人们的脑袋空空如也，只关心消费他们的产品，对他们的社会政治宣传束手无策，这是再有效不过的工具了。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看上去，这些国家拥有自由，但少数人控制了愈发集中的庞大资本。他们领导着国民的生活，以垄断报纸发挥决定性影响。比如在联邦德国，一个老板就控制了将近八成的大型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所谓“逃避现实”的话题：“性问题”、色情图片、连载小说、犯罪故事、体育……都是为了让人们忘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接受“既定秩序”（半岛上也有类似的《故事》〔El Caso〕和《嘿！》〔¡Hola!〕等等的知名杂志）。

这些“新资本主义”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西班牙通过法西斯集权的方式实行控制和影响，不需要什么伪装。比方说在比斯开，三家报纸中的两家（《北方报》和《西班牙邮报》）是大资本直接控制的，第三家《铁报》又是法西斯的官方喉舌。

对于班达斯的这场罢工，它们有什么态度（书里好几章都提到过）又会得出怎样的社会与政治结论，是不足为奇的。

官方完全剥夺了工人自己报纸上表达思想和提出问题的权利。过去的三十年里，只有通过（难以传播的）地下出版物，我们才能保持并充实自己的思想。

以上论述有助于理解，对于班达斯罢工者以及其它工厂的同志来说，这些“传单”具有何等的价值。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书里，我们还是要简单地讲讲它们的故事。这是没法绕开的，因为传单自始至终伴随了整场罢工。

罢工开始不到几个小时，第一张传单就到了我们手上。在这艰难时刻，难以解释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只有过去三十年里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才能完全体会到这一点。最初几个小时的气氛异常紧张。一切都是悄悄组织起来的。我们关于以前罢工的记忆只有痛苦和迫害。大家忧心忡忡。没人知道罢工成败如何。管理层挖空心思威胁我们，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及时传达消息很困难，一旦有人尝试联系其它部门或车间的同事，立马会给公司当成可疑分子。

我们的罢工开始时，激动、威胁、担心、警惕、困难，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些情绪。每个人都留在岗位上。听惯了轧制设备、起重机的操作、十二吨钢管不断滚动之声的大型厂房里，这么安静实在是折磨。我们只能惶惶不安地听着主管的脚步声。他们走过来，多半是为了使绊子。突然，谁都没料到，这些传单到了我们手上。工人们悄无声息地传递着传单，没有引起注意。短短的几行字中，能感受到我们信任的领导者的意念。传单表达了集体意志，保证了行动的团结。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担心什么流言和骗局了。

正如书里开头提到的那样，我们占领工厂的头几天里，传单帮助我们与妇女们取得联系，叫她们送吃的，再到巴萨乌里工会去。她们走街串巷，把传单发给别的人家。我们在传单上解释了，这场抗争也是为了她们、为了孩子的未来，使她们非常感动。这也解释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传单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后来，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后（那

些天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上开会)，它传达了领导者的话语，表达了工人集体的意见。传单的到来与分发使大家亲密无间。在小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当天的新闻与行动，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和批评。最后，我们回到家里，把消息告诉家人。许多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研究罢工，想办法解决传单上提出的问题。

我们来到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开会后，传单和集会变得更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传单收集前天的决议、领导者们的发言、有关罢工进展的新闻，再提出新的问题，以待下次集会上解决。

但是传单不仅是为了罢工者准备的。那段日子里，省里许多公司的代表也赶来集会：——“喂！我的两百份在哪儿？”“行的话，明早给我们公司留一百份……”“方便起见，要不每天专门给我们厂印个五百份。”常常会吵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要，传单却没那么多。

我们敢说，在这 163 天里，比斯开有了第一份“工人日报”。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整个半岛上第一份工人的报纸。比起少数统治者的喉舌，它读起来肯定诚恳和真实得多。

除了天天出版之外，大概每月会特制一份三到四页的精彩报道，讲述罢工的基本态势。这些报道主要面向比斯开以外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代表坚持想了解我们罢工的进展。

## 传单的制作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写作。另一个小组准备材料，把传单印个两三千份。最后，还有个小组负责分发传单。就

算警察急了眼，一再迫害工人，也没能阻挠它的编辑、阻止它的分发。每一场集会开始前，传单都会神乎其技地出现。罢工的五个半月里，这件怪事不断发生。多亏几位同志每天都冒着“当场抓获”的危险送来传单。好几次他们差点栽了，但都有勇有谋地化险为夷。

负责传单的同志组织得特别好，在无法见面的日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邮寄到我们手上！为此，他们记下了我们的住址，废寝忘食地准备材料，在信封上写地址、贴邮票。

在三、四月里，传单得到了加倍的“关照”。有关部门搜查了每个人的房子、天主教行动兄弟会的会场、活动场所等等。他们一直在突击搜查，还没收了十六台印刷机。警察未经许可就闯进了阿里斯教区的礼拜堂，但是扑了个空。同时，警方还无数次审讯了我们的领导者，结果总是一样。这些都是无用功。在后来的采访中，最高警察长官承认了他们的完全败北（他怀疑是神父给我们提供场所和印刷机），感叹道：“不管怎么样，这些传单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在教堂里，我们见到的是老朋友桑丘！”<sup>19</sup>

当然了，他们到最后还是摸不着头脑。复工当天，发布了最后一期传单。它对我们斗争的意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总结，怀想了遭到解雇、关进监狱、流放出国的同志们。

毋庸置疑，传单是促进我们觉悟的一大创造性工具。它每一天都会为这场斗争指明目标，体现了罢工的真正民主意识。传单是罢工的鲜活历史。在它的字里行间，反映了我们的团结与战斗意志的价值，反映了工人的声援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卑鄙齷齪。每天不重样的压迫暴行，为传单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

<sup>19</sup> 此处引用了《堂吉诃德》，比喻扑了个空。——中译者注

我们可以断言，在这几个月谈不上大却异常激烈的经历中，传单和集会就是工人运动的两所真正学校。



### 技术人员的做法

工程师、  
律师、专家、  
经济学者……

这和利己主义没有关系。对此，有一条从未落空的经验之谈：在法西斯资本主义的三十年独裁统治下，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前所未有地腐化了。通往政治自由的道路关闭了，文化限制在狭隘的界限，几代大学教育铺成了向上钻营与野心的崎岖路。资本主义利用了人

性最低劣的一面，用金钱的鸦片熏染了大多数专业人员。魔鬼总是把残羹剩饭丢给最忠实的仆人，让他们为己效力。而其它的选择意味着监狱、诽谤、放逐。当然还有失去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

它已经烂到根了，因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从未如此令人窒息地为金钱着魔，向神圣的利润顶礼膜拜。少数人在高高在上的金钱神坛玩弄多数人的生活，贪欲倾泻而下，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陷入了欲望的池<sup>20</sup>。好在，他们在权力的狂欢中蒙蔽了双眼，以为人民永远无法摆脱沉重的枷锁。他们不乐意从特权者饱餐的桌上，撒下面包屑来。幸好没撒，不然工人阶级暴露在污秽下，也会染上最下流粗俗的个人主义。这帮人的野蛮行径和无止境剥削（十二小时工作日、填不饱肚子的工资、监狱般的工作制度），都磨灭不了我们的斗志。他们想怎样消灭我们、压垮我们，都是徒劳。工人仍保持着鲜活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少数人，从囚禁和损害我们的泥沼中挺身而出。正是这股热情，鼓舞我们去战斗、去牺牲。就算打倒在地，也会重新站起来。就算面对恐惧与饥饿，面对一切，也义无反顾。

我们工厂的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马图拉纳、卡尔巴乔、佐利亚、菲利皮尼等人，也不能免俗，超不出金钱、奴性、无道德又无底线的野心。他们贪婪无度，因手握权力而桀骜自恃，作为优秀的技术专家而瞧不起我们，把工人视作二等种族，视作单纯的物件，视作比轧制设备更廉价的机械。

很多同事都是农村出生，班达斯是我们进的第一家工厂。所以

---

<sup>20</sup> 本书作者认为 60 年代的资本主义“烂到底了”，可是 21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比 60 年代更烂十倍。回过头看，60 年代被今人看成充满朝气、反抗和生命力的时代，但当事者感觉深陷泥潭，充满苦闷，渴望寻找出路。——李星注

我们无法做比较。这些专家是不是比别的厂的专家更坏？重要的是，他们完美地完成了主子赋予的使命：镇压、惩戒、控制。他们叫我们相信提什么要求都没用，还搜捕我们的领导者等等。

这也跟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有关。艾罗多伊当经理的几年里，他们按部就班地搞着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姑且没有叫人咬牙切齿的不公平对待，公司里散发着一股“人情味”。

我们只有一间食堂，大家都能在那儿看到艾罗多伊。食物和价格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待。工程师、专家和各级主管也会上这儿吃，可能是看到经理在这儿吃饭吧。

巴斯科尼亚和龚德拉执掌公司大权后，情况就变了。上面不断下达过分的指示，技术专家们也照做了。这些人抛弃了“民主过头”的食堂，涌向了巴斯科尼亚的饲槽。在那儿，新经理把金链子亲切地套在他们脖子上，让他们成为驯服的奴仆。

巴斯科尼亚有四间食堂：一间专供工程师和其他的高级干部、一间给专家、一间给职员，最后一间给工人。第一间食堂（在一栋单独的楼里）一直都吃山珍海味：一例汤或杂烩，两样主菜：牛肉或鳕鱼，配上时令水果和蛋糕，再上一杯咖啡或名牌葡萄酒，要么卡洛斯一世白兰地。菜单一级一级往下降。最后轮到工人时，就只剩下八比塞塔的一碟菜豆和一块面包。

说清楚这些是很重要的。这就是龚德拉的作风和性格。不论是工作、工资还是养老金，各方面都一样。他玩的总是这一套。比方说，1960年以来，大多数技术专家的工资涨了超过十五万比塞塔，有的人涨得多要多。而工人的工资从没有涨超过两万五千比塞塔，正如前面所说，都赶不上生活成本的飞涨。

后来几年，将近四十名专家从班达斯辞职。但他们不是为了抗

议工人受到的不公对待，而是因为龚德拉的亲信，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此人为了奉迎上意，连最亲信的人都毫不顾忌地驱使。

留下来的是奴仆中最听话的，狗腿中最无耻的。这些人都逐渐爬上了高位。希斯内罗斯当上了运营经理、卡尔巴乔从法律顾问提拔到了人事主管、卡佩拉斯特吉从部门工程师升到了生产主管、菲利皮尼当上了工程师的头、马拉图纳这个冷酷狡诈的“经济学者”也当到了研究主管、佐利亚·莱奎利卡没什么脑子，却当上了挣钱很多的质监主管，等等。

他们爬得有多高，就对我们有多狠。很显然，他们的晋升和对工人的压迫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理所当然了。要是一个人为了钱和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就很适合提拔到管理的岗位。

就这样，我们在班达斯的处境越来越糟。如果把这帮人对我们的不公全部讲出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他们算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工会选举快到了。当时，工人在奥查考加偷偷开会，决定参选。候选人要从四组人里选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也是我们在公司内部斗争的方式。管理层得知我们的计划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当然，我们无意指责公司的做法。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如此：受压迫的劳动者捍卫自己，反对有权势的压迫者的战争。令我们厌恶的是他们耍的伎俩。而且他们也是工人，总应该感到自己背叛了工人吧。）卡佩拉斯特吉和卡尔巴乔在工作时间召集了专家、师傅、技术人员。除了他们不信任的少部分人，全都叫去了。“你们在犯迷糊，必须组织起来，你们看不见工人在鼓捣啥吗？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代表选进去，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后几天的

工作时间内，他们又聚在一起，给卡佩拉斯特吉提名的候选人投票。没人反对，大部分人因为怕事和奴性照做了，少部分人是不想给公司盯上。结果，他们的把戏还是落空了。十二名代表团成员中，有八名从车间中产生，而绝大多数当选的联络员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会勇敢地站出来，打倒剥削者摆下的傀儡。明明我们的剥削者是相同的，这些可怜的傀儡只能维护主子的利益。

## 他们在罢工中的行径

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师傅们也很快加入了我们。现在，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卡尔巴乔这些人，已经不再说什么“我们必须选出代表，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而是说“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是管理岗，你们要负责任。你们不该罢工”……

刚开始，他们试图用威胁和恐吓打破我们的团结。国民警卫队用暴力赶我们出厂的时候，他们全都有份。

几天后，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的第一封信上了《铁报》。他穷极辞藻为公司申辩，写了一堆晦涩难解的技术观点。但这还不够。十二月中旬，他在那份报纸上登了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主编先生，

请以您的宽宏大量，再次允许我用以下文字劳驾您，虽然班达斯轧制的问题较为复杂，我尽量在此简明扼要，为澄清有害的误解、缕清思路，以求更快解决问题。

贵报在12月10日和15日的版面上，评论了劳工代表团于9日的决议，这一决议事关班达斯公司轧制车间的奖金制度，贵报（在前者的标题中）表示决议内容是有利于工人的。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不能从这份决议中，得出十二、三名车间工人的声明中的结论。工人的结论是，这种奖金公式会损害他们。

劳工代表团的决议承认，班达斯轧制公司在关于车间奖金的全部问题上都是正确的，甚至引起冲突的奖金计算方式，也要比正常标准下更优厚，但为了完全生效，还需要劳工代表团的正式批准。此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观点已或多或少得到直接介入本次冲突的官方人士认可。

澄清这一点是首要的，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执迷不悟，遂才加入罢工（从而导致无视或违反法规的情形），但其实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受损。而罢工引发的各类声援活动产生了诸多问题，至今影响着当前局势。

主编先生，您一定能理解，假如劳工代表团的决议正如贵报说明的那样，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基于减少各种损失的最大愿望，从一开始就承认它。

主编先生，最后我得说，如果工人21日不属于本司员工，因此拿不到圣诞节的额外奖金，公司是毫无过错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班达斯轧制公司始终以最审慎的态度对待各种问题，绝不允许违反纪律，因为纪律是根本的。圣诞节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节日。大家都认同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人。爱也包括权威，因而也包括纪律问题。

感谢您劳神阅读，恭敬地向您致敬，

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

这一回，我们没有很快答复。后来我们将下文寄给同一家报纸（斜体部分在发表时删去）：

“主编先生：

我们希望在这份日报上刊登这封致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的信。

洛佩斯先生：

这封信专门写给你，也写给在班达斯轧制公司的冲突中，站在资本这一边的人。我们觉得有些话会冒犯你，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是，如果说我们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受着侮辱，那现在正好有机会让我们多多少少平等地坐在一起，你们会看到工人的真理有多少分量。

首先，班达斯的工人想感谢你在1月19日星期二在《铁报》上发表的那封信。是的，因为它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同时也坚定了我们的立场。

11日星期一，在《周一小报》（la Hoja del Lunes）上发表了菲利克斯·加西亚·奥拉诺（Félix García Olano）的一篇关于圣诞节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工人很感兴趣的话题，它说：“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过是体面的下流。”无意冒犯，但我们觉得，你也认为“工人群体”不够“体面”。我们认

为你的信里只有两种品质：体面和下流。前者是因为你说尽了甜言蜜语：“绅士风度”、“审慎”、“人与人之间的爱”、“公司会一如既往地基于……的最大愿望”，而后者是因为，这些话后面，掩盖的是你虚伪卑鄙的真正意图。

我们一点也不奇怪。说到底，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远离人民的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你的科学是冷酷、麻木不仁、没有灵魂的科学。你没有发明什么，你只不过是接受了它，臣服于它。在我们看来，鉴于我们在班达斯遭受的人际关系与经济剥削，你的话背后的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知道，巴斯科尼亚的经理总是说：“注意员工的人数，每个工人要花我们十万比塞塔。”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我们工人无非是一项支出，是为了提高利润，厂里必须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开销，而利润就是你们唯一崇拜的神。所以在你们看来，我们在公司里的处境是很稀松平常的。现在你们还想把这场冲突及其起因搪塞过关。

我们厌倦了重复这一点，但为了再次让你明白，也让所有人明白，我们要再次说明：班达斯的冲突是由于我们一再受到无理对待，尤其是新人事主管上任后。此外，我们的收入都减少了。不仅是车间，许多部门的职称和奖金都降低了。更不用说管理层全然无视工人要求的态度了。

好在，你们还如法炮制地对待其它组织（比如工会）。在冲突的早些时候，你们对工会的地区、省、国家级官员的态度十分恶劣，以至他们要求对公司处以罚款。你难道不清楚罚款这回事吗？

令我们最惊讶的，是你的信对劳工代表团决议的巧妙解读。你想说的无非是，就算劳工代表团没有裁判，情况也对你们有利：就是说，管理层随意规定的标准总是正当的。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得好好说道说道。

假如你不理解的话，我们在此告诉你，劳工代表团关于奖金问题的结论如下：

(1) 管理层非法克扣了大量奖金：包括电镀锡、热镀锡、金属板车间、起重机与维护等部门。

(2) 假如没有发生这场冲突，你们根本不会搭理我们早就提出的意见。你们从我们手上抢走了这么多奖金，因为你们知道，就算奖惩不合理，工人也拿你们没办法。因此，劳工代表团强制你们支付至10月3日的前六个月奖金。

(3) 多年来，你们都没有提供计算奖金的表格，这违反了《国家金属业条例》第45条和我们工会协议中的第31条。你们一直都在随意玩弄数字。

你说这些有利于“工人群体”，我们可不觉得。

我们还要问：如果说，你们无礼粗暴地对待我们，挑起了所谓“非法”冲突，因此解雇我们五百六十个人，然后又叫我们以“新员工”身份回来，但是要把十到十五个同事留在外面，那么对于管理层的违法行为，应该解雇你们多少人呢，洛佩斯先生？还是说纪律和权威只适用于工人呢？我们厌倦了不管多小的事，甚至是机械正常故障、睡懒觉迟到了一个小时，公司都要严厉惩罚我们。而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盗窃奖金、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却屁事没有。我们不能否认，当权威成为压迫的工具，而纪律成了强者剥削弱者的鞭子

时，我们有义务起来反对它，我们也很荣幸这么做了。

你还说“工人群体”因为“执迷不悟”才保持一致的。你都了解我们什么！你来自资产阶级的世界，你最大的悲哀就是无法理解我们工人世界的伟大财富。

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你这些天来无数威胁的又一杰作，为的是吓唬我们。你知道是谁想出在报纸上登广告招工，还用“书面申请”这个主意的吗？我们今年拿到了特别奖金，但不是金钱，而是同志情谊和团结。我们知道有些“价值”是无价的，但某些人却无法理解。

你还说，人和人之间要有爱。都是空话。别来这套！

最后，真是咄咄怪事，出面斡旋的都是巴斯科尼亚的员工。班达斯的经理层上哪儿去了？他们只有工夫给货车装卸镀锡铁皮和金属板吗？当心点吧，大家都知道，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来到班达斯后，会变成“新员工”失去一切。可不要在你们身上也发生这种事了！

的确，我们试图对话，但这太难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涯告诉我们，对话其实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如果这些话能使他们受良心的谴责，那我们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这封信让气氛变得极为紧张，班达斯罢工的意义也愈发重要。当然了，公司的狗腿子继续忙于对工人耍花招。

## “新员工”们

罢工的头二十天里，工厂完全停止了运作，仓库里的货物纹丝未动。资方从巴斯科尼亚调来起重机操作员的企图失败了，因为公司代表团的警告，要让这些人也罢工。当时，公司认为我们会很快投降，所以不急。但看到我们连额外奖金也不要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场罢工没那么快收场。

然后公司有了对策。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但似乎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上面想出了一条妙计：——“工程师和专家负责装卸货车。”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干劲十足，也许是想换来好处。这项指示是挨个亲口传达的。看得出来，狗腿子之间没什么团结。谁都想往上爬。谁也不相信谁，大家都是竞争对手。或许有人不想这么干，但不同流合污也不行。只有三四名专家拿出了拒绝的勇气，留在了办公室里。卡佩拉斯特吉不时阴阳怪气：怎么的，你很忙吗？“唔，是的，不过这几天不着急。”不用说，要是他们都鼓起勇气，结果就不同了。但没有出现这样的勇气，因为他们摆不脱等级观念。他们已经给打倒在地了。

12月20日的传单有以下内容：

“那天，工程师等人从办公室窗口嘲笑给我们带食物的妇女，现在轮到他们笑话我们了。菲利皮尼、卡佩拉斯特吉和所有的奴才都‘当起了工人’给货车装卸。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你们这些叛徒和工贼算账的。这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正义。

但你们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并不着急，就等着看你们

怎么绕线、切割、打磨。要命的是，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当工人和压榨是什么滋味了。别也想加入罢工了。”

从12月20日到罢工结束，他们费尽心思破坏罢工，甚至尝试开动机器。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萨多、伊尼亚拉等人操作起重机，苏加萨、索拉斯、狡猾的拉米雷斯等人打下手，戈依科切阿和德诺负责放哨。看样子，他们很担心受到袭击。

12月22日的传单表达了大家的愤怒：

“我们要求卡尔巴乔立即惩办卡萨多和菲利皮尼，因为他们装一包镀锡铁皮的时候，弄坏了货车座椅。要罚他们四十天的工钱！这些二把刀‘工人’还西装笔挺呢。看样子他们已经嫌累了，怎么不扣他们工资啊。”

当然了，看看他们是怎样干活的，就知道平时工作有多难了。而这些人为了一个小失误，都要责罚我们。

### 一些工程师的信——回信

1月2日，毕尔巴鄂炸开了花。是的，一群工程师在毕尔巴鄂的《周一小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好比一颗重磅炸弹。立场不同，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就不同。

我们把这封信抄录如下：

“主编先生：

首先我们为本文能刊登在《周一小报》上表示感谢。

我们是一群工程师。我们希望对班达斯轧制的劳资冲突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报纸上、机关（Cifra）的公告上，以及上述公司的员工在《铁报》上发表的信中，可以得知，身为专业人士：专家和工程师，我们正在干装卸货物的工作。

单就这件事来看，坦白说这也挺好的。虽然我们本来也是劳动者，但距离真正的工人世界实在是太远了，当一回工人相当必要。也许没有人创造的财富比体力劳动者更多。在人类发展的伟大任务中，没有人像他们这样付出牺牲，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但我们总是瞧不起他们，为自己有点知识和技术而自鸣得意，但这些不过是在特权下得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尽管工人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但从工人世界中走出的大学生只占了百分之一。

在我们谈论的这件事中，这些人做的工作，都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去干就很丢脸的。但我们希望你们看到，不管是他们，还是他们周围的环境，都是个人的悲剧，所以不能根据他们的站位，就觉得这些人是“坏”的。不，这只是环境的结果，是这个制度的结果。

为了意识到这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说到底，在资本制定的法则中，无论是对体力劳动者还是专业人士而言，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为此，资本毫不犹豫地使人剥削人，让社会劳动服务于物质利益，而不是服务于人。它扼杀了个人的理想，强迫人为资本效劳。

体力劳动者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我们再次重申,这类人也是劳动者),资本不过是允许他们进行一些最表面的管理,利用他们的自私心和不团结,再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更优越的生活(更高档的消费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

首先——资本把专业人士的技术占为己有,把它用在劳动世界里为自己服务。

其次——专业人士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和体力劳动者是一致的。毕竟,他也只不过是具有某种特长和技术的工人。对于资本来说,他也只不过是生产手段而已。

总之,实际情况是,专业人士貌似保持着中立,但却把自己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站在资本一边反对工人。谁要是不这么觉得,那就看看班达斯轧制公司的例子。

最后,我们要对班达斯轧制的职员和工人表达敬意,因为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劳动者的立场上。

再次感谢您百忙之中阅读来信,致以诚挚的问候。

一群工程师”

不出所料,第二天,全市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工程学院的虚伪声明。1月4日,工业专家学院也跟着发了声明,意思差不多。它们的声明如下: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向本报寄了以下声明: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理事会有义务声明,昨日在毕尔巴鄂《周一小报》上发表的有关比斯开一家公司的劳资冲突的信,只是一群工程师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的身份和人数也尚

未核实。

上述信件与劳资冲突全然无关，我方也收到了大量谴责与反对的意见。本理事会认为，这封信中关于工程师的社会职责的观念是侮辱性的与错误的。

多年来，工程师致力工业发展与劳动条件改善所赢得的声誉，要远远超出所谓“工程师”的个别看法。

学院理事会”

#### “巴斯克工业专家学院的官方声明

毕尔巴鄂工业专家学院理事会及众多校友对《周一小报》刊登的用心险恶的发言表示抗议。那些人不知有什么资格自称‘工程师’，发表的言论与劳资冲突毫无关联。他们‘超纲’了，起码他们不能对技术人士的社会职责如此冒犯。他们的指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是在无中生有。

学院理事会

1968年1月4日星期三”

工人世界也很快做出了回应。当然，不管是《北方报》、《西班牙邮报》还是《铁报》，都不会刊登我们的答复。工人代表向《周一小报》发了很多电报。当然，为了抗议诽谤和谎言，我们也给工程和工业专家学院发了很多电报。作为回应，相关公司的代表团也向管理层抄送了副本，要求谴责这些声明。

我们给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写了一封更详细的信，内容如下：

“致毕尔巴鄂工业工程学院理事会

先生们：

我们不希望加深你们与工人的分歧，而是恰恰相反。

我们真诚地相信，一群工程师署名发表在毕尔巴鄂的《周一小报》上的信，忠实地反映了我们每日亲历的可悲现实：几乎没有例外，工程师在内的种种专业群体，都把自己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视为一体。

对我们来说，要证明你们怎样在所有的冲突中站在资本这一边，乃至我们公司出现了那么可悲的场面，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情。

你们的声明都是空话，还说什么‘上述信件完全与劳资冲突无关’。我们认为这是很严肃的，不能不加评判地就把某些事实放在一边，当它们是‘侮辱和错误’。

因此，我们完全反对你们在报纸上的声明。张口就来，无视在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事，是很容易的。我们斗胆请你们公开评价一下我厂的工程师和专家正在装卸货物的行为。你们说说这些工程师为‘劳动条件的改善’都做了哪些贡献吧，我们可是饶有兴趣。

我们寄希望于截然不同的未来。总有一天，专业人士要服务人民。那些人写信是为了表明他们决心放弃资本主义赋予的不公平的社会与经济特权。而你们相反，出卖了自己的技术，更糟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真诚致意，

签名：班达斯轧制工人”

工程学院不满足于厚颜无耻的声明，甚至想弄到《周一小报》那封信的作者实名，以便控告他们。看样子，他们怀疑“工程师”是否确有其人。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工程师确实不多。后来，《周一小报》的主编确认了作者真是工程师，而不是他们以为的神父，另一方面，学院的法律顾问找不到指控的依据，只好作罢。

这里要指出一点，班达斯轧制的运营经理，工程师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时任工程学院的秘书。

班达斯的全体工人以及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都注意到了这件事，为这些同志做了辩护。为了表示声援，我们写了一封信：

“致向《周一小报》投书的工程师们

同志们：

在这封信的起笔，我们想说一件事：你们在1月2日星期一寄来的那封了不起的信，在所有工人中间激起的感受，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你们：工人一致希望向你们致以工人世界的感激，感谢你们在信中诉说的一切。

你们把工人的最大悲剧：所有科学技术专业人士的背叛公之于众了。专业人士们都把知识和个人出卖给了剥削我们的资本主义。

我们向工程和专家学院写了抗议信，给你们抄送了一份。我们抗议那些人，不仅攻击你们，甚至还要捍卫不应得的荣誉。至少在我们眼中，他们没有这份殊荣。

我们都知道，在那封信上签名对你们可能意味什么。这是你们完全归属于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受到迫害，就是你们站在人民这一边的标志。我们会支持你们的。我们将竭力捍卫你们，就像捍卫我们自己。新一代人正在涌现，他们对最终的胜利充满希望，而你们也是一份子。

你们的立场，使我们相信斗争不是没有成果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在走狗的坚固战线上撕开了大口子。

以团结和工人情谊的名义，致以我们的友谊。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当然了，班达斯的工程师和专家将继续在罢工期间为公司装货。也许，看到自己的不齿行为曝光后，他们只是像陷入绝境的野兽一样，更加凶相毕露。

事实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数月，他们唯管理层之命是从。

好几回，他们秘密拜访师傅和“潜在叛徒”的家，用金钱收买或威胁他们复工，以此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还花了大力气调查每个罢工者的背景，好决定要除掉谁。为此，部门主管工程师、人事主管、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办公室里开了会。他办公桌上有个货真价实的密探档案，里面有我们每个人的照片、个人信息、工作职务、受过的处分、“危险”程度的批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把它放在桌上，用来决定复工时要不要开掉某个罢工者。不难想到，各部门负责人都提供了本部门工人“搞颠覆”的细节和资料。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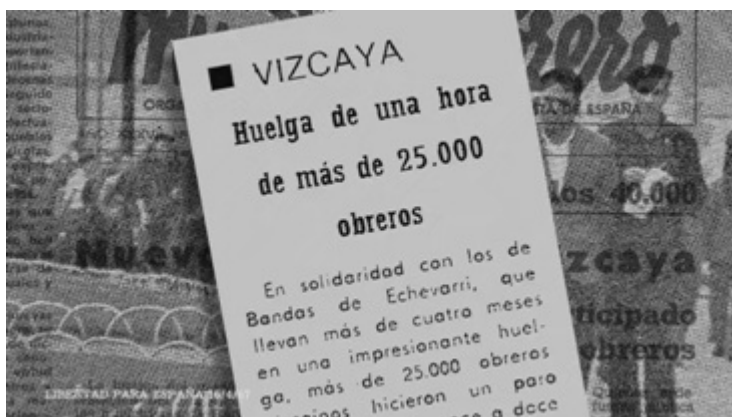
“这小子是个害群之马。他一直反对干十二小时，从来

不肯加班。”“另一个也要开掉。一出事儿，工人都来问他拿主意。你们都看到了，这人选进公司代表团之后，弄出了多少乱子。”“把他开掉！这人老是带头提要求。他还是罢工开始的时候，最早关掉机器的。”“这是个带头的。他老是向劳动法院投诉，每次惹麻烦都有他！”“谁都认得他。听说他还在巴萨乌里教区的集会上妖言惑众。”

配合警察总局提供的名单，这些会上列出了“裁员名单”。

我们说过，在罢工的最后阶段，有几个专业人士去了加利西亚、莱昂、萨拉曼卡，带上当受骗的工人回来破坏罢工。

也许，这些技术专家与他们在罢工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们停留片刻，好好思考。那么，接下来的场面又该怎样理解呢？



## 背叛的奖赏

抗争了 163 天，罢工终于结束了。只因我们不肯跪地求饶，资方及其国家靠山就用上了一连串凶残手段对付工人。

在紧急状态下，当局给了罢工最后一击。不仅是班达斯的工人家庭，比斯开多地的民众都沉浸在悲伤中。总之，整个工人阶级以及社会大众，在这些日子里蒙受了极大不公。

看到工人的痛苦，更确切地说，由于工人的痛苦，有钱人喜笑颜开。工人的穷困，让富人心满意足。工人的惶惑难安，让资本家心中安定。

我们都住在毕尔巴鄂公园旁的吉亚德（T. Guiard）大街上。经理的女儿维多利亚·龚德拉住在这条街二号的洋楼，有两间三层的套房。她婚后没有子女，但房间很多……佣人也多……

那里的住户不用担心解雇，不用担心房东赶人，更不用担心坐牢或者流放。三十年多来，警察从没用搜查、审讯、殴打，惊扰过他们安逸的美梦。多亏她父亲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恩典，这些事儿只会发生在工人区里，发生在反对他们的权力、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的人那里。一句话，发生在千百万户的人家里。

5 月 20 日晚上八点。客人们陆续进门。这几张脸很好认。来者的都是班达斯和巴斯科尼亚的走狗：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伊瓦拉、卡德纳斯、乌鲁蒂亚、卡萨多、伊尼亚拉、佐利亚、马丁内斯·萨瓦雷塔、德·诺、乌达巴雷纳、戈依科切阿、博兰、奥尔蒂斯、萨尔杜阿。

已婚者都带上了衣着光鲜的太太。

龚德拉一家都在门口迎接客人，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他们对客人十分和蔼，亲切招待，如同老师奖励最听话用功的学生。

不用多说，血腥味还未散去，他们就急匆匆地举办晚会，只为

庆祝打垮我们，奖赏最忠诚的刽子手，犒劳他们在经理的英明领导下想出的，或是原先就藏在脑袋里的无数卑劣行径。

晚餐很丰盛。桌上应有尽有。这一群人一边吃喝，一边无耻至极地谈论近况。

突然，夫人叫大家安静，然后经理开始致辞：“这几个月对大家都不好过。我只想告诉大家，管理层对诸位合作深感欣慰。好在一切都圆满结束了。我们可以再一次地怀着热情服务公司。我们都是公司的一员，人人都应该各司其职。

“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诸位忠实捍卫了我司的利益，也是在场所有人的利益。我女儿也会给诸位的夫人献上一块金表，作为庆祝我们完满胜利的纪念。当然，我也会赠给单身人士精美的手表，稍后我会亲手交到诸位的手上。

“我希望，经受了这数月风波之后，我们的团结会更牢固。今后，我们还要为了公司和家庭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

全场起立鼓掌，接着领取了奖给他们奴性的赏赐。总是这样，在他们早已沉重的链条上，又加上了更多的金子。

但他们还要恬不知耻。不知道为何，或许只是奉承冲昏了头脑，他们想还经理一份大礼，但意见不合。让我们听听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反对意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拉先生送了手表，省了我们一大笔钱。现在要我们反过来掏钱，岂不是亏大了！”当然面子上要过得去，还是出了两千意思意思。

不用说，我们不应忘记这四十只手表以及这份重礼的含义。我们不会忘记是哪些人收下了礼物。他们明知这礼物是他人血汗换来的。他们卖身投靠了资本，一步一步。

对于未来的技术专家，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是的，一旦为了

私利，你向压迫人民的集团效劳，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堕落得有多深。眼下有个现成例子：他们走向了憎恶与背叛，趴在了手握金钱与权力的主子脚边，当起了剥削的帮凶。

## 官方组织的态度

本书的每一章节以及三十年来半岛上的经验，足以说明官方组织一贯的态度，我们不想再做更多的展开。

一言以蔽之，从官方组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履行本职工作：通过此呼彼应的镇压，维持社会与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以便地产、金融、工业寡头能在各方面保有和增长权力与特权。

在我们的罢工中也不例外。罢工持续时间太长了，官方不得不出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而证实了这一说法。

在此，我们只关注对将来活动有用的方面。

## 官方工会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的巧妙手段，值得特别注意。它是战后成立的长枪党垂直工会，旨在束缚工人，让工人臣服于法西斯。

早在新《工会法》颁布之前，垂死挣扎的政权就试图让民团工会“美化”自己，掩盖过去。工会要履行新的使命：同化工人阶级，以此领导工人阶级，使它慢慢地、非常缓慢地，走向非阶级和去革命性的（但至少是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这正是渴望完全融入西欧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垄断大资本想要的结果。

但在民团工会的“掩盖”下，老板和工人之间仍有着深刻矛盾。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四处宣扬省工会顾问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在内的社会改良决议，但谁也不听他们的，这些决议一文不值。工会签的集体协议全然是为资本主义谋取利益的，他们却说是工人的胜利。他们提出“投票给更好”的口号，为工会选举大造声势，然后又找借口把真正的工人领袖排除在外。明明大家都清楚，工会的“帮扶”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却仍假装捍卫工人，如此等等。

不管有没有粉饰太平，让工人接受这个（不管从前还是现在）充当资本主义利益傀儡的工会，实在很难。但是，就算他们也明白是白费力气，也仍在拼凑这些组织，把我们往里塞。他们大谈颁布新法律和自由化，却不想还给我们失去的自由。

这场罢工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长枪党的工会自始至终都是为了金融和工业寡头服务的政治工具。

罢工的最初阶段，它在马德里工会官僚的授意下，让我们上了一些当。它对班达斯管理层做了“点到为止”的批评。它要求省长对公司罚款<sup>21</sup>，因为他们拒绝工会官员进入公司。工会仲裁委员会发布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提到罢工的直接起因是奖金问题。它为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培训。它还不断尝试帮双方调解。

显而易见，工会的角色实在可悲。它根本不是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真正工人组织，但在发生罢工时，它的职责又是为罢工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

矛盾的是，民团工会的“调解”及其假装支持工人事业的企图遭受失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法西斯政权下实行的残酷暴力。

---

<sup>21</sup> 龚德拉后来到马德里撤销了这些罚款。——原注

既然龚德拉那伙人早就与内政部长卡米洛商量好“最佳方案”了，再跟工人对话，或者通过工会调解，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么个建立在暴力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反对的力量才能逼他们让步、逼他们妥协。因此，他们一手创办的工会，虽然时而在工人运动中扮演角色，但由于主子的过错，在关键时刻又难堪大用。因为滥用权力和为政府当差的安逸深深腐化了工会。

## 露出真面目

从我们宣布自己找辩护律师开始，工会的支持态度就大打折扣。不过我们早就不管它们了。看到工会无耻又无能后，一年以来，我们向法院提出的所有诉求都绕过了民团工会的法援。

毋庸置疑，对他们来说，给工人打官司是个绝好机会，因为判决能够展示工会律师的“得力”，以及工人“信任”工会。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们还是无法正直面对，还利用自家的喉舌（毕尔巴鄂的《铁报》、马德里的《人民报》等等）在审判过程中出阴招。1967年1月17日，法院听证结束那天，《人民报》在某一版面插入了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和民团工会倒是很相称。

“劳动版面。工会绝不会放弃协调的尝试。工会承认工人的私人律师。

工会律师起草了564人的起诉书。

西班牙工会法律服务处向我报寄送声明，内容如下：

“正如《人民报》昨日在《N. de la R.》中，关于《埃

切瓦里案判决书》(第 12 页)所声明与肯定的那样,工会法律服务处有义务表明,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工会律师与社会部顾问秘书,将始终竭力为‘冲突’中的 564 名工人提供法律与技术上的支持。

迄今为止,我方律师研究、制订、起草了 564 份起诉书。后来,此事移交法院前,工人逐渐不再向工会寻求支持,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除十二人外,工人均书面放弃工会辩护。这十二份起诉书中,十份与事实相矛盾,因此在法院面前无效,其余两份则由法院受理。目前看来,工会律师很可能上法庭为这两位工人辩护。

工会法律服务处再次感谢杰出的律师兼教授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昨天他在听证会上,以非常确切和特别的方式,公开赞扬了工会,尤其是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律师。另一方面,埃切瓦里工人在此前的个人纠纷中,都充分信任工会。工人在需要时总能得到工会的法律援助。”

1 月 31 日,当所有的报纸公布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时,他们又发布了以下声明:

“比斯开工会法律服务处负责人已于昨日中午发表声明,宣称工会法律服务处从未介入过班达斯轧制公司 564 名工人解雇案的审判。

起初,本机构负责工人的法律服务,起草了 564 份起诉书。顺便一提,我们进行辩护的方向与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和阿隆索先生不同,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否认了作为诉讼之

本的诸多事实，而公司律师鲁伊斯·萨拉斯证实了它们。但是，员工未经解释就拒绝了工会法律服务处的律师服务，后者完全没有参与刚刚宣判的案件。”

他们真是自以为是，压根就不在乎我方律师的辩护，或者我们的做法。但这绝不是他们最过分的地方。

当时，已经发生了上述事件，工会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后来管理层炮制了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的信件，也是分裂我们的一招。为此，不仅我们收到了信，其它公司的工人领袖、代表团、联络员也收到了信。为了抹黑我们的立场，资方利用工会帮忙提供的个人档案，偷偷把这些信寄给了现任或担任过工会职务的许多工人。这种龌龊事，他们在罢工中一共干过三回。

## 协助镇压

还需要强调一点：工会与警察的关系。以下事实可见一斑。

开庭结束一周后，宣布判决前，全省工人都在声援我们的事业。比斯开的工人领导者试图打开局面，把声援活动拓展开来。当时，整个半岛都密切关注着判决结果。巴萨乌里的某次集会后，每个公司的员工都留了几名代表讨论。讨论很激烈。“可以给法院寄几千人的联名信”——“我觉得最好派个代表团上马德里”——“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但这次闹得比较大。我建议在工会和法院前面举行和平示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一项提议通过了。大家商量好第二天上工会去，因为通过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组织游行，

必须得到省长的允许，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会怎么答复。

上午十点在毕尔巴鄂民团工会会场开会。省劳工代表给社会政治部打了电话，会议开场不到十分钟，警察就闯进了大厅。在场的工人拒绝离开，要求劳工代表到场，但他不肯出面。在与会者的坚决态度下，警察暂时撤出了会场。最后，为了破坏工人的行动，警方逮捕了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的若干成员，大搞审讯。尽管如此，1月27日，仍有五千名工人走上了毕尔巴鄂市中心街头。

警察的干预并非孤立事件。工会会场一直都处于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吉普车和巡逻车经常停在门口。在弗朗哥政权眼中，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圣的：工会、大学、修道院、教堂，什么都能随意践踏。当然了，只有银行和董事会才享有政府的信任。

也许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在巴萨乌里和奥查考加集会时，工会又拒绝把会场让给我们。宣布了紧急状态，发生了大规模流放、监禁、审讯，我们的罢工结束了，而工会始终保持沉默。有三股势力参与了逮捕：公司、警察（提供个人档案）、工会。工会还提供了它认为最危险的工人领导者的名字。

工会拒绝工人使用会场，老板却随时都能在这里开会。四月中旬在毕尔巴鄂工会举行的会议中，有六十五名老板到场，包括龚德拉。讨论了比斯开工业面临的困境后，龚德拉报告了班达斯冲突的进展：——“罢工者没有示弱的迹象，而是相反”，“到目前为止，警方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好几次通知马德里方面，需要加强政府干预”。然后，苏维里亚（Zubiría）伯爵接着发言，提醒大家要小心工人阶级激增的造反情绪。伯爵先生是无数董事会的成员和西班牙凡士通的总裁，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却无用的社会意识的新资本主义组织的头目，这个组织叫“雇主

社会行动”。他补充道：“为了遏制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敦促政府拿出强硬手段，及时遏止冲突，以防事态扩大。冲突若是蔓延到其它公司，后果不堪设想。”

老板们都认可这番话。不用说，这项要求传达给了马德里方面（一周后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虽然是一则轶事，但费尔南多·龚德拉与同为巴斯科尼亚董事的佩德罗·安普埃罗，他俩与安普埃罗先生的私交、全国工会代表索利斯·鲁伊斯的谈话，对考察工会的行为也颇为重要。在罢工一事上，他们想得到索利斯的支持，索利斯自然也答应了。

但是这次会议及其内容，通过工会传到了几位工人领导者耳朵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迅速开会，向索利斯拍发以下电报：

“我们从马德里听到消息，安普埃罗先生和龚德拉先生与您进行了谈话。因您答应在班达斯冲突中支持管理层，比斯开金属业工人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您立即作出说明。”

事情败露后，索利斯急忙下令，要比斯开工会的省劳工代表找出是谁发的电报，再杀鸡儆猴。当然了，工人领导者早有防备，工会官僚拿他们没辙。

总之，在民族工团主义下，当局总是通过政治指令，或者工会中的全部要害职位，控制所有的工人行动，必要时扼杀它们。

1939年7月23日，国民运动部给工会官僚下的秘密指示中，也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意义不减），内容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

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应当用纪律约束他们，收编他们，用新的信条教化他们。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的动向。因此，工会的领导干部必须完全值得信赖，必须忠诚。”

不过，我们得指出，民团工会内部的代表团、联络员、社会委员会（当然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都产生了反对这种法西斯信条的压力。在我们的罢工中，这种压力对罢工的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时能迫使工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显而易见，工会的干预作用相当有限。正如之前所说，这些动作都是用来欺骗工人的，旨在掩盖工会为政权服务的真正本性。

只要看看罢工的几个月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记录，就能证明工会会员们为捍卫与支持我们事业的斗争。当然在这些人里，必须排除民团工会施计安插的长枪党份子，比如莱图里奥、德尔·巴耶、萨拉苏亚、莫兰、阿雷那萨、贝尔多梅等人（这帮货色一直弃权或者投反对票。有时，他们还怂恿代表团和联络员打消工人的抵抗意志。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罢工，给工会政治干部通风报信）。我们从会议记录中引用几段话：

“我们谴责工会法律服务处在报纸上有关班达斯轧制公司所作的声明。”

“本次会议的大多数支持巴萨乌里地区委员会主席向比斯开省长先生递交的要求和平示威的申请。”

“巴萨乌里地区委员会主席表示，不仅是工会上级，各方都不允许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在当地工会开会。”

为了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争取十二月和一月培训的机会，工会里的同志们不断施压，还让工会在经济上支持罢工者。工会的政治干部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或没有资金时，工人就出示了一份文件，讲的是工会当时要求所有省劳工代表募捐，支持所有在直布罗陀罢工的西班牙工人。这还不是劳资矛盾，而是政治罢工。

这些工会活动的要害在于，它们都是合法的。它们可以掩护我们的“非法”活动，阻止当局的干预。

许多工人领导者也利用工会的便利，通过民团工会的“官方职务”顺理成章地参与了罢工和集会，要不然真不好办。

最终，这些方式也惨遭践踏了。工会禁止了社会委员会开会。警察接到命令，不放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参加我方集会，然后禁止我们所有人开会。宣布紧急状态后，六名省委员会成员与数名地区委员会成员也上了流放名单，另有多人关入大牢。

接下来的数月里，为了把他们从民选的职位上赶走，许多工会代表受了处分。这是上头的命令，借口都是随便找的。下面是一例处分，这些处分的内容非常相似。

“比斯开工会法律服务处

根据指导文件的规定，工会决定解除你的职务，处分当即生效。谨随函附上处分通知。

我们通知您，根据全国金属业工会主席的指示，解除您的全国金属业工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资格。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主义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1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签名：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盖章上写着比斯开工会法律顾问)

## 处分通知

根据 1948 年 2 月 2 日《有关撤销工会职务实施细则》第 9 条的规定，您的违法行为有以下几点：

(1) 去年 3 月 19 日的第三工会省级代表选举中，您获得了选举人的资格，而在同年同月 14 日工会召集选举时，您未参加投票且无故缺席。

(2) 巴萨乌里金属业社会部委员会于三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题为《有关新工会法》的文件，含有针对工会组织、工会高级干部及成员的冒犯性言论。

(3) 您寄出的信：今年 3 月 17 日与 4 月 6 日致省长先生的信：4 月 6 日的信中，您与诸位签名人声称代表工会。以及 3 月 17 日的信中声称代表比斯开金属业工人。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革命的名义。

1967 年 7 月 26 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

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毫无疑问，解职就说明这些工人完成了使命。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受到迫害是可靠和办事有效率的证明。

劳工部

有一个更直接参与镇压罢工的部门，它就是劳工部。它是内政部底下的部门，从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sup>22</sup>担任副部长（部门的二把手）就说明了一切，他是法西斯麾下最凶险的猎犬。此前他担任了一大堆警察职务，始终不离他的养父“唐·卡米洛”左右。

起初，他担任阿隆索·维加手下的调查处长，后来在“卡米洛”当上国民警卫队首长后，他跟随养父担任了同样的处长职务。在桑坦德、比斯开、巴塞罗那担任省长的那几年，他就凶相毕露了。回想一下 1962 年罢工时的紧急状态和流放，还有萨里亚的嘉布遣事件<sup>23</sup>吧。这些行径与他在劳工部的新职务很相称。按照政权的逻辑，或许此人是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人选。他一上任，就从社会政治部调人来填充劳工部的队伍，比如把毕尔巴鄂分局的刑讯专家“镰刀”调到了手底下。

多年前，弗莱雷担任比斯开省长时，就是龚德拉的私交。冲突一开始，他就向龚德拉提供了帮助与合作。十二月头几天，他通过毕尔巴鄂劳工部的代理人伊瓦拉·洛斯特，声称罢工是公共秩序问题，协助公司除掉我们同志的企图。他从头至尾都建议管理层不要“调解”，决不能向工人让步，必须彻底粉碎工人的抵抗。到了十一月下旬，公司谋划赶走我们的同志奥萨巴。正是此人指示就业局，

---

<sup>22</sup>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 (Antonio Ibañez Freyre, 1913 年 9 月 25 日——2003 年 5 月 9 日)，西班牙陆军中将，内战期间加入叛军。二战期间志愿参加蓝色军团，参加了苏德战争。1960—1961 年任桑坦德省长。1961—1963 年任比斯开省长。1963—1966 年任巴塞罗那省长。1976—1978 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79—1980 年任内政部长。2003 年去世。——中译者注

<sup>23</sup> “萨里亚的嘉布遣” (los Capuchinos de Sarriá) 是嘉布遣的一个教区。1966 年，那里的修道院举办了一场学生大会，也称嘉布遣大会 (Capuchinada)。当时警察包围了修道院三天。这场会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响应。——中译者注

不许给奥萨巴更新证件，方便公司那边动手撵人。

计划是这样的：奥萨巴十五岁起就在西班牙定居，但他保留着古巴国籍，所以必须通过公司，每年重新办理外国人的专门证件。自从他 1963 年 11 月进入本公司后，证件就没更新过了。因为雇用外籍工人要额外交税，公司一直在办证这事上违法。当然了，更新证件纯粹是例行公事，不可能办不成，就算不办也没事。

但这次他们另有打算。一月初，管理层“毫无征兆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就业局得到了“不予配合”的指示。随后管理层征询了马德里的意见，商量何时把奥萨巴驱逐出境。跟安全部门负责人谈过话后，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给巴斯科尼亚打了一通电话，叫人通知奥萨巴，公司解雇了他。卡尔巴乔（再次厚颜无耻地为主子跑腿）负责了这项差事：——“我们很抱歉。公司让你更新工作证件，但我刚接到通知，就业局方面拒绝了。因此你不能继续留在本公司了。”奥萨巴答了一句大实话：“没关系，不管我在哪儿，我都跟你们接着斗。”

虽然和罢工没有直接关系，但必须提一件事：福利摩多（Frimotor）一家工厂的坍塌事故造成十九名工人死亡，因此伊瓦涅斯·弗莱雷四月来了比斯开。考虑到比斯开的局势，如此规模的故事可能引发严重事端。因此，当局必须防范于未然。

伊瓦涅斯·弗莱雷负责这桩重要差事。报纸宣传了他的到场，大力报道了副部长先生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的承诺。

但是，死者无权举行集体葬礼，同事不能参加葬礼。因为这可能引起可怕的变乱。在这场灾难面前，伊瓦涅斯·弗莱雷破坏了规矩，让每个遇难者分别下葬。几天后，当局才在教堂里筹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但没有任何工人能入场。即便如此，那个星期六的中

午十二点，还有大批治安部队在附近巡逻（后来，主教在省长的压力下，禁止阿里斯教区举行弥撒）。

利用这次访问，弗莱雷调查了罢工的情况，回马德里后报告说，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打垮工人。他看到，如此多的镇压与暴行，都无法使我们屈服。

## 劳工部与“人才引进”

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的受骗工人讲述了他们的辛酸故事。我们看到，工会和劳工代表在这桩丑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下面这份文件证明了那帮人的行径。

这是省劳工代表提供的表格，交由申请用人的单位填写，再交至就业局。我们说过，就业局的上级是马德里的劳工部。

我们抄写的这张表是一位莱昂工人给我们的。这名工人三月份从工会手上拿到了表格。上面的内容是：

“就业局负责人先生

各省调度服务。工作申请（样表由雇主填写）

一：公司信息：

（1）名称：班达斯轧制（比斯开高炉与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毕尔巴鄂C大道36号

（3）工作地点：比斯开 埃切瓦里

（4）工作内容：冷轧制钢

(5) 工作地点的员工人数: 700

## 二: 岗位要求

(1) 需要的员工数量: 30 至 40 名小工和职员

(2) 年龄及性别: 41 岁以下成年男性

(3) 专业类别: 小工和职员

(4) 申请时间: 四月内, 除非另有安排

(5) 公司招工地点: 莱昂

(6) 若要面试, 向谁或何处进行: 不需要, 试用期三个月

## 三: 工作待遇

(1) 劳动合同的期限: 无期限

(2) 正常的工作日之外是否会有加班: 是

(3) 正常的工作日与加班的总薪酬: 工人每天 145.60 比塞塔, 职员每天 168 比塞塔

(4) 健康证明: 否

(5) 对于每个家庭, 有配偶者补助 300 比塞塔, 每有一名子女补助 200 比塞塔。以下情形提供额外补助:

①: 持有原籍省医保或公司开具的证明

②: 公司自行到工人住处或就业中心签订合同

(6) 若您就职后在公司工作至 7 月 18 日, 将一次性发放 5000 比塞塔

## 四: 食宿条件

(1) 公司是否提供住宿: 否

(2) 若公司不提供住宿, 工作地点是否提供住宿: 是

(3) 公司是否提供就餐, 若提供, 又以什么标准: 午

餐，每顿约 10 比塞塔

五：公司补充的条件

上述雇主方所填写的条件均为硬性规定。

本申请一式两份，一并转交工作地点的省劳工代表团与就业局。

若截止期限（第二条第四项）还未招满预订人数（第二条第一项），公司将告知就业局延长参考期限。

若在工作地点的公司体检中（第三条第四项），员工未通过体检，公司将遣送员工回原籍地，退还各项费用。

工人从住地到工作地点的旅费，由就业局管理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承担。

劳工代表（难以辨认的签名）

写着‘劳工部’字样的盖章

莱昂代表

公司

原件由费尔南多·伊瓦拉·奥拉兰先生签名”

这些组织不允许我们为维持罢工而设立工会基金，不借给我们会场，不帮大伙找工作等等，却全力支持肮脏的勾当，用五千比塞塔的诱饵（干到 7 月 18 日就给钱）骗人参加什么“工作促进会”！这就是他们可悲的工贼角色。更过分的是，他们拿所谓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当差旅费！体检这一点也相当恶劣。公司不打算就地给工人体检，只想凑齐人头。人凑够了之后，公司就把质量不佳的“货物”拿预付的邮费退回去。



## 内政部

这一次，内政部照例迎头痛击了工人争取解放的尝试，堪称轻车熟路。它才不管工人是不是“搞政治”。它只关心一件事：消灭任何揭露体制弊病的行为。更不要说我们这次罢工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反抗力量，推动了团结与觉悟的工人行动。

当局一直找不到下嘴咬工人的适当机会，直到审判结束。当罢工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人采取了遵守法律程序的战术。当局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演变，最终远远超出了自己能接受的程度。

毋庸置疑，当局从一开始就动用了警察机关掌控我们的行动，监视我们的领导者。还有背地里的一系列小动作：协助龚德拉报复工人、向主教施压禁止集会、向安全总局打报告等等。但其实，要么是担心引起丑闻，要么是没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直到二月份，官方才直接下场，变本加厉地弹压罢工。

二月的第一天，警察在巴萨乌里会场门口抓走了代表团成员莫

亚，带到毕尔巴鄂警察总局。为了叫他透露组织的情报，警察在局里殴打了他五个小时。他们尤其想知道每天的传单从哪来的，印刷机在什么地方，但最后一无所获。

那几天里，他们还把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警方和龚德拉在报告上说，要不是奥萨巴，罢工早结束了。2月3日，由于警察抓错了人，奥萨巴得以避开牢狱之灾，暂时离开了。

得知他们对我们同志的企图后，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给省长写了以下这封信，附上了数百个签名：

“阁下：

以下签名者均为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来信是为表示愤怒。我们得知消息（似乎现已证实），为了掩盖真实动机，官方以虚伪的理由与借口，下令把我们的同事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驱逐出境。

我们全都非常了解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我们知道，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为了正义事业，他三年来无私地同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

我们知道，他根本不是粗俗的煽动家。政府根据掌握的情报，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冷静，公司内部的各种冲突都没有演变成暴力和混乱，尽管遭受的不公对待，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知道，公司施加了压力，让他得不到工作证件。在西班牙工作的那么多外国人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人人都有证，就他一个人没有。

现在你们要把他驱逐出境。他在西班牙的十五年里，唯

一的罪过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还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向麻木不仁的公司讨回受损害的利益——在目前的危机时刻，公司随意丢弃了几百万、丢掉那么多的票子，放任国民经济陷入贫困，给上下游的公司制造麻烦。这就是垄断的特权。不仅如此，它还叫五百多个有尊严的家庭挨饿。——公司不欢迎我们的同事，放逐了他。

为什么要向他下手，而不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让对这场冲突负责、对数百万的损失负责、对因工厂停工在两个半月来给其它公司造成的麻烦负责、对我们的家庭经受艰难考验负责的人，让他们承担责任？

作为同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我们和龚德拉先生一样享有公民权利。龚德拉的意见，当局都听进去了。工人的话难道就没人听吗？假如少一些龚德拉，多一些奥萨巴，就不会有班达斯发生的那么多可耻的事了。

对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下手，就是对公司全体工人下手。我们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致信作为本省首长的您，请您秉公处理，保证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继续享有他至今的一切权利。

我们将此信抄送给了安全总局局长阁下。

我们希望您主持公道，上帝祝您长命百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于毕尔巴鄂。”

当月 14 日，安全总局下了逐客令，宣布奥萨巴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下了“搜寻并逮捕”的命令。

当时，除了要扑灭罢工之外，龚德拉和当局还要利用它来证明

罢工的“政治性质”。为了搜查奥萨巴的家，龚德拉向马德里施压，试图在他家找到所需的证据。当局对此事相当重视。2月25日凌晨3点半，一个叫塔马约的人带队，安全总局的几名探员特意从马德里赶到毕尔巴鄂开展行动。在三个多小时的搜查中，七名警官在他的房间里只找出了与班达斯冲突无关的信件和出版物。警察抓走了与奥萨巴住在一起的安赫尔·加西亚·萨拉查。26日星期天，为了让他坦白奥萨巴的下落，问出奥萨巴在罢工中“扮演角色”的证据，塔马约一伙人拷问了他十八个小时。他们还费了好些工夫，试图从他嘴里撬出有关印刷机等等的情报。他们空着（或许因为审讯受伤的）手，带着失败的耻辱回了马德里。（后来，《西班牙警察》杂志六月刊第66号上，《政府警察》版面上发布了内政部的以下指示，表彰镇压罢工及其声援活动的警方团队：

“公开表彰——毕尔巴鄂社会部地区探长……探员……、副探员……”

〔译者：下略二十人名单〕

1967年5月9日政府第8931号令。

公开祝贺他们。在此，同样感谢毕尔巴鄂最高警察长官先生和所有比斯开警务人员，以及所有在当地表现杰出者——1967年5月31日政府第8948号令”

龚德拉的计谋再次受挫后，又找政府搬救兵。当然了，他可以说自己跟官方行为毫不沾边，就好像谁都不知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有他和唐·卡米洛的私交一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请记住我们提到过的，龚德拉等几名资本家提名了卡米洛·阿

隆索·维加担任金属业中心总经理。1962年的罢工中，巴斯科尼亚的管理层就靠唐·卡米洛在毕尔巴鄂的这位好友，得到了关厂令。)

三月，马德里下令禁止集会，对我们的镇压又进了一步。

四月，工人的声援运动达到了高潮。在阿雷纳尔声援我们事业的游行中，警方的镇压异常凶狠，打伤了好多妇女。政府对公司的全面支持曝光后，省长发表了一份声明，当地广播电台每隔几分钟就宣读一遍。他抨击工人的立场，逼迫我们复工，说公司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我们再怎么做都是徒劳的。它的内容如下：

“政府获悉某些骚乱分子打算在今天下午举行示威，特此通告，这场示威是完全非法的。示威未得到政府批准，触犯了《公共秩序法》，有关方面会强行解散它。

属于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都知道，除了公司已决定解雇的人外，公司为复工提供了一切便利。因此，西班牙永恒之敌煽动的阴谋已经太迟了，什么也捞不到。这些违法行为将一无所获，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拒不服从当局指示，执意参与示威，只有遭到警方镇压的下场。

我想再次诉诸工人阶级的理性，不要听从最坏的敌人煽动你们违背法律的指示。省长。”

然后4月21日的部长会议上宣布了紧急状态。他们流放了五十人，进行了大规模监禁、审讯、搜查。我们的罢工就此结束。

在办公室里，费尔南多·龚德拉与他在马德里的“员工”卡米洛·阿隆索·维加进行了一场谈话：

“卡米洛！我们终于赢了！”

“费尔南多，恭喜啊！祝贺你的巨大成功！……”

“上帝啊，卡米洛，都是你的功劳，是我们欠你的！……”

这些对话是完全真实的。也许这能证明，我们所处的制度有多野蛮，本书说明的资本主义与弗朗哥政权之间的关系又有多确切。

我们的罢工是否是政治性的？它是由谁组织的？

是的。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我们也不会为这一点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就是用罢工在搞政治。

在其它章节中，我们讲过半岛三十年来独裁统治的真实情况。表面上是弗朗哥和他的党羽在统治，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统治者是两百名金融和工业寡头，他们通过大银行的董事会控制了 75% 的产业。这些人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主人，是他们制定了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是他们让监狱里塞满了工人而非老板，是他们为了谋取私利上马德里，要求什么惩戒措施、紧急状态……

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就像过去三十年来工人阶级开展的一切罢工一样。我们还敢说：一名工人或农民提出的最微小要求，就算他本人不知道，也是政治行为。从“想”到“做”更是如此。

只需要在我们官方工人机构的世界里，在工会、法院、劳工代表等等中间，待过片刻，就能确认它的整个政治性质。西班牙的政治就是大资本与大地产。一句话，就是剥削。

二十五年里，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根据《刑法》第 222 条，所有罢工都是“危害国家的行为”。直到后来，法律才依照国

外的标准进行了修改，把它们分为了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但也没有实际意义。当他们想要镇压和压迫时，这些统治着所有公共生活（政治、报纸、广播、电视）的人就唱独角戏证明自己有理，没有人能提出异议。班达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最无耻的是，这帮人为了主宰政治生活，挑起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内战。这些统治了三十年的人，现在还想不让我们碰政治：“这是政治的”。我们要问，要是政治真有那么糟，台上的统治者怎能如此傲慢？为什么还要崇拜政治生活的头领、崇拜你们的元首？……我们已经看透你们了：所有的战争都是坏的……除了你们的。所有的政治都是玩弄阴谋……除了你们的。谁也没有权利讲话、批评、指责……除了你们。

我们看穿了这出把戏。你们假装政府和资本家不是一回事。这出把戏很巧妙，就好像你们与政治无关。但一目了然，政治和国家就是为你们的利益服务的。现在你们的梦想成真了。政权是木偶，你们藏在幕后笨拙地提线。哪里都是这样。你们在公司中的木偶是卡尔巴乔、马图拉纳、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等人。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是索利斯、阿隆索·维加、伊瓦涅斯·弗莱雷、罗密欧·戈利亚<sup>24</sup>之流。只要开价到位，就能收买他们、腐化他们。对于卡尔巴乔之流，一份不错的薪水就够了。对于索利斯、卡米洛之流，就让他们坐上理事会的交椅：“荣誉要给配得上它的人。”

为了再次用事实证明我们的话，下面列出了政府成员的名单以

---

<sup>24</sup> 赫苏斯·罗密欧·戈利亚（Jesús Romeo Gorría，1916年9月12日——2001年4月2日），西班牙商人。1936年内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8年参与起草《劳动法》。1942年起在国务委员会工作。1957—1962年任劳工部副部长。1962—1969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6年任伊比利亚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1976年退休。2001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及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 政府首脑

卡雷洛·布兰科

- 副总理兼副秘书长
- 海军上将
- 与博雷洛·奥塔尔家族、大地主、塞维利亚银行家有亲戚关系
- 与主业会<sup>25</sup>勾结（对垄断资本主义起大作用的宗教政治组织）

阿尔曼多·德·拉斯·阿拉斯·布马里尼奥：

- 总统法律顾问办公室首席
- 阿斯图里亚斯工业与商业银行董事
- 巴斯克—阿斯图里亚斯航运有限公司董事
- 西班牙里奥廷托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 发展计划委员会

劳雷亚诺·洛佩斯·罗多：

- 发展计划部长
- 加利西亚不动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 大西洋银行主席卡斯米洛·莫林斯·李沃特的内兄
- 主业会成员

比森特·摩尔德斯：

- 发展计划委员

---

<sup>25</sup> 主业会（Opus Dei）是天主教教团，1928年10月2日在马德里成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一些主业会会员在弗朗哥政府中担任要职，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 奥穆尼亚保险有限公司主席
- 伊比利亚公共设施与建筑协会首席执行官
- 巴塞罗那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卢卡斯·贝尔特兰·弗洛雷斯:

- 发展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 乌尔吉河银行研究处首席

多明戈·迪亚斯·安布罗纳:

- 灌溉转型委员会主席（先前他的兄弟阿道夫担任这一职务，此人现任农业部长）

米盖尔·萨里斯·波尔索拉:

- 钢铁基础工业委员会主席
- 前任金属工业协会总经理（在他的授权下，这家协会与阿斯图里亚斯钢铁业联合会签署了协议）
- 阿斯图里亚斯钢铁业联合会主席（协议签署后，他立即从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担任了这一职位）
- 主业会成员

## 劳工部

赫苏斯·罗梅罗·戈里亚:

- 部长
- 阿拉斯出版有限公司（由主业会控制）首席执行官
- 塞弗尔特与比恩索瓦斯有限公司主席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

- 部门副秘书长
- 步兵中校
-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的养子

## 工业部

格雷高里奥·洛佩斯·布拉沃：

- 部长
- 伊比利亚石油精炼有限公司董事
- 比尔瓦伊纳渔业有限公司董事
- 杂志、报纸及出版有限公司（主业会）董事
- 前塞斯陶工厂（西班牙海军建造）经理，与我国的金融寡头关系密切

安赫尔·德·拉斯·库尔瓦斯·冈萨雷斯：

- 部门副秘书长
- 比尔瓦伊纳渔业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 商业部

福斯蒂诺·加西亚-蒙科：

- 部长
- 毕尔巴鄂银行前总经理，兼这家银行及子银行（毕尔巴鄂工业银行、商业银行、拉科鲁尼亚银行）董事会成员
- 加纳利海运有限公司董事
- 伊比利亚钱币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阿方索·奥索里奥·加西亚：

- 埃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埃索石油（西班牙）有限公司董事
- 造纸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 与西班牙信贷银行关系密切

## 内政部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

- 部长
- 陆军中将
- 西班牙人民银行（主业会）董事
- 金属业中心有限公司主席

## 国民教育部

马努埃尔·洛拉·塔马约：

- 部长
- 特种金属及研究特许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及其逐步控制教育的工具。曾用警察手段镇压大学。

## 司法部

安东尼奥·玛利亚·奥廖尔·乌尔吉诃：

- 部长
- 伊比利亚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
- 约迪奥彩绘玻璃有限公司副主席
- 西班牙影业有限公司主席

- 塔尔戈特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等
- 阿尔弗雷多·洛佩斯·马丁内斯：
- 部门副秘书长
  - 加斯布塔诺有限公司秘书
  - “希尔德萨”主席
  - 几家主业会控制的电影与出版公司董事会成员
- 等等、等等……<sup>26</sup>

这种关系不甚枚举，但这些资料已经足以证明我们的观点。

### 是谁组织了我们的罢工？

我们的罢工是工人发起的工人自己的罢工。在我们看来，为了人民的解放，建立地下工会组织进行正直的斗争是完全正当的。但说实话，没有任何团体组织或领导了这场罢工。领导者走在前面，大家共同进行了罢工。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因为我们懂得，最重要的是让方方面面的所有人都组织起来。

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开展罢工是由于公司内部原因：奖金问题、不公平的惩罚等等。罢工的几个月里，尽管我们要多次跟这个制度的政治面目，也就是政权打交道，但还是咬牙挺住了。为了坚持下去，我们尽量不给当局干预的口实。在仅限于公司内的斗争中，没有武器、没有国民警卫队、没有“灰帽”和秘密警察，我们完全赢

---

<sup>26</sup> 资料摘自《西班牙的未来：政治与经济民主》（Un futuro para España : la Democracia Económica y Política）、《西班牙视野》1966年版（Horizonte Español. 1966）、《西班牙的垄断》（Los Monopolios en España）——原注

得了胜利。要不是武力干涉，公司只能投降。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好露出獠牙：流放、驱逐、紧急状态、禁止集会、镇压声援游行、监禁、审讯……是的，它们证明了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这个政权不过是一根鞭子，是干“脏活”的工具，不让他们弄脏自己的手。（罢工结束后不久，资本家们在内古里（Neguri）举办宴会。安普埃罗见到龚德拉的时候，上去给了一个拥抱，还叫道，“瞧啊，我们比斯开的英雄！”难道能把一个拥有全套镇压机器的人叫做英雄吗？我们不禁要问：他算哪门子英雄？流放六十位工人领导者，逮捕一百五十人，驱逐一人出境，殴打与威胁工人，在五一节唤来三千警察，还诽谤中伤我们的英雄吗！是的，卡西尔达·安普埃罗，这就是费尔南多·龚德拉的赫赫战功……不要忘了这位英雄在巴斯科尼亚的股份、分红、董事席位。）

我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大部分人是农村出身。我们的领导者大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人朴实，毫无保留地投入斗争，只相信正义与真理，做好了开除和投入监狱的准备。这些人里，加入工人组织的人并不多。但我们相信这是应该走的道路。我们要取得成果，不能靠各个工厂各自为战，得靠整个工人阶级和所有小组的联合行动。尤其是这场罢工的经历使我们深受鼓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今后还会继续努力。它汇聚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思想各异、来自各个小组和派别的人们，无论远近都来参加集会，给予我们鼓舞、帮助、支持。没有人在这场罢工中玩弄党派的阴谋。也许是因为，只需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行动是团结一致的。也许是因为，把属于所有人的事业变成某人的功劳是要冒风险的。总有一天，自由会再次闪耀，到时就能知道谁参与了事业。然后，正直无私地加入斗争的小组也会得到更多荣誉。但这都是后话了。现在的关键

是，我们要在工会和政治生活上，在方方面面继续斗争。

## 我们要搞政治

了解到资本主义在操纵当前的政治后，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揭穿政权炮制的假象：人民在真正参与公共生活，能够对当局的行为和立法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每天加强与政府对抗的意识，认识到政府听从的是剥削者的命令，意识到与它斗争就是在攻击资本主义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法国工人这样做了，他们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罢工，为反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一边增加缴费，一边减少疾病事故等的补贴）采取了大量行动。同样的事也鲜明地发生在南美，工人、农民、学生组成了游击队，为了推翻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的伪政府，为了农民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奋勇战斗着。

可悲的是，经过三十年对我们思想的不断歪曲，许多工人并不理解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的一位同事曾说：——“什么政权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关心，我们的权利要得到承认。”另一个人回答他说：——“难道你没意识到，这些权利要得到承认，直接取决于制订法律的人吗？我们要做的，正是建立一个代表工人利益，而不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府。”

从上可以看出，必须消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差别，不能像只有前者和工人有关一样。在某些荒唐的政治问题上，比如为了通过《组织法》搞的全民公决闹剧，或者家族代表的选举之类，工人都不得不投票。这类可悲做法让大家疏远了政治。工人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方式，奋起反抗侵犯他们阶级利益的公司、市镇、省乃

至国家中央机关里的敌人，直到工人夺取政治与经济权力为止。

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搞政治，直到洗刷鲜血和自私留给这个词的污名，恢复它的真正含义：人民当家做主。正如我们所说，压迫者只希望工人远离政治，只关心工资、保险、多放几天假。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工人放弃重大任务，不去管经济、法律、新闻、国际政治，乃至权力机关，叫剥削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罢了。



## 第三部分 思考

###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记录这场工人斗争，而是希望以它的正确和错误，为所有在半岛上与资本主义战斗的人们提供经验，对他们的实践有所帮助。

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经验有局限性：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工厂的特点、形势的变化、相应的对策等等，都是特定的。但我们真诚地相信，有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在现阶段的斗争中，始终绕不开人际关系问题。其它经验就看是否适用于现实了。

在罢工的过程中，斗争达到了高潮。但在此之前，我们还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磨练。如果把最后几个月的罢工与这三年的行动和组织阶段割裂开来，就无法解释罢工取得的成就。

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讲，以下因素使我们产生了集体意识，促成了我们的抗争。

简单来讲，就是两方面：技术和人。

技术方面：

#### 一. 工厂委员会或小组

## （1）组织结构及基本方面

多年来，与许多工厂一样，班达斯缺少有组织的工人行动，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难以进行严肃的斗争。责任落在了少数人的肩上。更清楚需要以有组织的方式斗争的人，要么他们能力很强，要么属于某个地下小组，要么是有别的特殊原因。

1964年5月的班达斯罢工，标志着我们在公司里有了自己的队伍。当时我们在工厂旁边空地上开会，每个部门选出了两名代表。

但选举有时并不容易。因此，工人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行动，了解和检验未来领导者的素质，顺便揪出野心家、“大嘴巴”以及必须格外小心的各种投机分子。

如果在最初阶段，由于公司的特点或镇压，工人难以进行选举，那么直接召集工人组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临时组建的小组必须采取行动，促进集体意识，直到工人有民主选举代表的意识。

选举的时机很重要。有可能的话，必须等到引起普遍关注的事件发生。例如：研究集体协议、奖金变动、发生了影响（全部或大部分）员工的问题或不公正对待。这就确保了选举是民主的，领导行动的是工人，工人感到有人“代表”而不是“操纵”自己。

我们像在搞真正的地下活动，因为公司、警察、政府都是一伙的。的确，从某些方面上讲，行之有效的行动会有暴露的风险，公司会盯上我们。但有些风险是必须接受的，选代表就是一例。

厂里集会时，顺便进行公司委员会或小组选举的话，就非常方便了。每个人投票前，要让他们会考虑为何投这一票。这些做法都会让管理层得知我们的进展，有可能招致报复，但也会迫使管理层下手更谨慎，更尊重我们。为此，我们必须牢记一条永不落空的法

则：立场越软弱，挨打就越厉害。

如果很难在工厂集会，可以在上班时间搞选举。但是，始终要以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项工作，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小组的人数与各部门内的人员分配要尽量灵活。就后者而言，重点是考虑人数和个人能力。比方说，某个部门里可能有五名活跃的积极分子，为了所有工人的利益，这五个人都要弄进小组。应当明确一点，小组或委员会不应倚向哪个部门，而要考虑所有人的问题。因此，每个部门的代表人数是次要的，但最好定一个最低人数，确保组织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以便执行协议、收钱、发传单等等。

还有一个办法（尤其在大公司里），就是整个公司的部门小组的负责人组成团队。这样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更高，更不易暴露。

上述小组定期（比如每两到三个月）或者有重要事态时开会，与基层商议后，做出重要决定、制定新计划、调整行动等等。

要明确一点，我们说的“小组或委员会”，与地下组织的成员小组不同，因为后者按照自己的标准行动、制订具体战术。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自己内部问题，但他们必须接受工厂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通常都在同事中享有威望，因此会当选小组或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在公司的层面上，已经实现了团结，这是工人运动的基石以及取胜的必要条件。坦白说，在我们厂里，大家虽然思想不同、分属不同的地下小组，却还是非常团结。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发生过领导者相互敌对的大丑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工厂小组或委员会看作现有工人力量的统一机构。它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受到工人信任，旨在组织工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它不仅要在公司里领导斗争，还应当代表公司，参与（比如全省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的行动。

关于公司代表团，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由于他们属于（所有工人拒绝的）官方工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在工会选举中弃权，还是把自己人选进代表团。主张前者的人认为，选上了也无济于事。主张后者的人认为，这个职务在战术上是必要的。

班达斯采取了后者的意见。我们认为，公司代表团是当时公司内部斗争策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厂委员会的人，或至少可信任的人，要选进公司代表团（并非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可信，因为某些群体的大部分人卖身给了资本主义，比如工程师和专家）。

公司代表团的战术要害在于：公司会利用它为自己服务，要是它真的为公司效劳，会给工人找一大堆麻烦。合法行动办不成事的情况下，代表团就能合情合理地采取一系列“非法”行动。这样一来，在这么个不断用暴力维持“和谐正常”的体制下，至少能绷紧斗争的弦（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代表团定义为工厂委员会的合法面孔。为了捍卫工人的利益，需要通过它协调地下战术与合法行动。

就我们厂而言，代表们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岗位上英勇捍卫了工人事业，因此罢工后遭到解雇。

工厂委员会尽可能回应工人的一切需求。在对资本主义及其压迫制度的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必须保持革命的行动路线，同时尊重成员之间的理念与政治分歧。

保持革命路线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问题无法通过提高工资或者缩短工时解决。的确，我们有这么做的权利，但重点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打倒资本主义，劳动者掌握了工业和土地，我们才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真正解放。不然的话，我们仍处于社会、文化、政治的最底层。以前是我们的父母，以后轮到我们的子孙。

## 小组或委员会的目的

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所有道路都堵死的当下，小组或工厂委员会究竟能做些什么？

也许是出于经验，我们的回答是乐观的。我们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有效的抗争：

**一. 建立防御手段：**哪怕明知结果不容乐观，我们也要为工人斗争做好准备，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要求引发的。如果问题很棘手，又找不到好的律师，那么事情就麻烦了。

**二. 通过同事的推选，让最有能力和最无私的人参与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是某个团体的领导，而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工具”在推动民主的集体协调行动。这一行动能使不同派别步调一致，共同商议与指导行动的各个方面。如果大家是推心置腹，那么采取某派主张的路线，就不会引起冲突或分歧，因为它反映的不过是多数人的意见。

**三：通过日常行动教育工人领导者，同时也要关注学习、阅读，参加或组织培训班、讲座等等。**

**四：获得斗争的集体意识：**当今社会中，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人思考，叫人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秩序。因此，最重要的莫过于唤醒觉悟，使我们懂得为了变革而斗争。

如果工厂委员会的行动是有效深入的，很好履行了使命，通过集体的积极参与，就不仅能唤醒少数领导者，还能激发大家的觉悟。我们重复了一千遍，我们的罢工是与同伴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坚强领

导核心的成果。工人最终融为一体，开展了共同的斗争。

**五：把厂内行动更大范围的斗争联系起来：**比如说，通过其它层面（比如省级）组织的公司员工代表，参与相关行动。

### 为此采取的行动

不言而喻，仅仅选出小组或委员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真负责，还要持之以恒。

为此，必须好好利用一个重要的工具：集会。的确，举行集会十分困难，但它们非常重要。

(1) 必须定期举行。每次集会的间隔时间可以不同，但不应超过十五天。

(2) 必须找到一个隐蔽性强的合适场所。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不建议使用个人住宅。

(3) 需要指定委员会成员负责通知日期、准备会场等等。尽可能制定会议时刻表，严格遵守计划。

(4) 需要有人专门安排议程。没有什么是比一场没人知道该做什么的会议更令人沮丧了。他还可以指导会议，避免会场有人“开小会”，确保人人参与到讨论中。会上要研究和解决个人与集体的所有问题。各部门的代表应事先与相关人员做好沟通。

在会议上，必须有充足时间商定要在代表团会议提出的事项，提前十天交给代表团会议书记，列入下次代表团会议的议程。如果没能及时提交上去，就在公司内部解决这些问题。

(5) 最好根据具体事项，落实大家的分工。例如：向法院上

诉；工人给公司代表团提要求；管理资金；获取、传递、收集信息等等。很多事情做不成（或者做不好），就因为没人觉得是自己负责的。

（6）尽量避免少数人揽下过多工作。要考虑每个人的能力。每过一段时间要检验彼此的工作，采用轮班制交换职责。

（7）有时可以让其它工厂的积极分子或能提供特别知识与经验的人参加集会。但要确保此举不会显得集会支持某个地下组织。

讨论了集会之后，现在来说明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

一. 建立防御手段：这或许是委员会最能促进“工人集体参与”的行动。的确，目前在法院和劳工代表等方面，工人都很难取得成果。但是，尽管法律和规定都对公司有利，至少我们能抗议公司的不公平对待，这还有戏。无论如何，反抗总比忍气吞声要好。

以下是应当抗议的最常见不公正行为：

- 违反规定调整奖金和补贴
- 分配的工作高于认定的员工级别
- 加班
- 不给员工提供保险
- 公司代表团不作为
- 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口罩、眼镜、手套、通风、套鞋）

就要求员工从事危险工作

- 非法延长试用期（例如，每三个月重签一次合同）
- 医疗条件差
- 拒绝给有毒有害的危险岗位发放相应补贴

- 非法削减员工班组的规模

- 使用童工

- 毫无理由就找“经营状况不佳”的借口（为了抗议，最好通过年报了解公司的真实状况。尽可能通过值得信任的人获取一手消息。这对于其它行动也很重要。）

- 不公正的处罚

- 未履行集体协议或内部规章等等的规定

（在抗议上述公司行为时，出发点应该是：争取改善条件能够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像现在反对半岛上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有重大意义。资本主义逼迫两百万工人流动打工，还把累人的工时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法从事别的活动。此外，许多人还对用超额劳动换来的、貌似更高的收入挺满意的。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五十小时，每年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小时。）

我们大家都受过这些行为的损害。但我们感到有人在背后支持和保护我们。这种情感使我们与领导者连成了一体，帮助我们克服了曾多次叫人无所作为的恐惧。

至少要搞两种防御手段：法律咨询和罢工基金。

### 法律咨询：

官方工会一点派不上用场，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尊重人，不诚心对待工人的诉求。因此工人完全有必要“另起炉灶”。工人们，还有我们熟悉劳动法的律师，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我们与律师保持着定期联系。另一方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最好是在公

司代表团任职的成员)至少要对相应规章、公司或省级(当公司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集体协议的内容、如何起草申请书、如何给管理层和劳工代表写信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毋庸赘述,为了进行合法活动,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难以获取这些基本知识,搞培训就能帮上大忙。讲师可以是有经验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是专业律师等等。

除了教授法律知识,许多情况下,这些培训也能解答工友们的提问、澄清疑问等等。

在公司代表团会议上,资方总是利用工人的无知,因此搞培训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不会专门研究工人的种种“权利”。这没有必要,工人积极分子也不感兴趣,但至少要了解我们认为对工人有用的法律。需要了解公司代表团的制度(例如有关投票、召开特别会议等方面)以及研究不太费力,用处不小又直接影响工人的规定。事关重大的话,如果超出我们能力所及,应当寻求律师帮助。

对于大型工厂,最好在月收入上达成协议。较小的车间要视情况而定。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份协议。

个人或集体的问题都可以请律师。代表团会议上的事项、集体协议谈判的准备工作等方面,都要征询律师的意见。比方说,一旦发生集体冲突,律师的意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最好是找参与工人斗争的律师。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法律人。有些城市还有专门负责“劳资纠纷”的事务所,这些事务所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当地要是没有这类律师,那就“白手起家”。一种办法是,联合一大堆公司,促成一家专门研究劳资纠纷的事务所。

向法院提起上诉时,应当寻求其他工人的帮助,让他们出席审

判、推动声援活动，以鲜明的方式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以此支持自己的同志。显然，只有在轮班制的工厂才能这样干。

### 罢工基金：

毋庸置疑，半岛工人斗争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没有罢工基金。抱怨民团工会偷走了我们的会费无济于事，只有靠自己补救。

尽管困难重重，委员会也应每月收取固定费用建立基金。

（可悲的是，就算不罢工，工人平时都掏不出什么钱。）

我们把收集的款项用在下列用途：

- 律师费：一般每月付一次，数目定期变动。

- 通讯和宣传开销、复印用纸、墨水、打字机、印刷机、手续费、旅费等等。

- 支付不公平的处罚。这是对抗经济报复、蓄意罚款等的有力武器。工人的“评审委员会”管理这笔钱。这个评审委员会可能就是公司委员会，或者委员会任命的几名工人。工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扣了工资、失去工作和工资等等，都会向它寻求帮助。评审委员会将做出最公正的裁判，决定是否支付部分或全部的罚金。

- 特别需要的费用。我们指的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这笔资金不能与用于疾病事故的基金混淆。后者是合法的，虽然工人往往管不到它。这里指的是秘密收集的钱，要直接用于工人的斗争。

- 声援其它公司、罢工等等。同样，非常紧急的情况才

能动用它，因为给其它工厂筹的钱应与每月固定收取的款项分开。

这些活动不总会动用基金，因为花钱要有先后顺序。同时，每月收款的方式也很重要。以下面为例：

(1) 建立罢工基金得找大家都关心的时机。要让同事知道，捐不捐钱完全是自愿的，还要让大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和用处。

(2) 每月收一次款，收款日必须固定，但可以接受自愿捐钱。

(3) 指定专人收款，或者按照部门、办公室、车间、工作班次等进行收款。重点是，每块地方都要有人负责。为此，我们建议根据全体工人的名单，安排整座工厂的收款任务。

(4) 提供收据，写明支付数目和相应月份。一份给收款人，一份给付款人。只要不署名的话，这些收据是不会造成危害的。

(5) 指定专人管理基金，定期查账。

可能有些同事会有所抵触和怀疑，但捐款是自愿的，所以不会有谁受到损害。用不了多久，当罢工基金发挥作用后，一般可以适当提高收取的数目，但这同样会引起抵触。

有一点必须注意，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由于罢工基金的用途，管理与收取基金的人会遭到针对性的迫害。

二. 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工人领导者是它最重要的财富。

在目前的形势下，并不是所有工人都能发挥领导能力，发扬斗争本领与献身精神。因此，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有责任带动所有同事，特别是具有领导者资质的人，投身到积极分子的生活中。

如今，有许多团体，它们在诸多方面上，都在努力招募为解放工人世界而斗争的新人。作为公司内的一个小小组织，除了参与行动之外，工厂委员会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但或许，委员会能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把各派积极分子的力量统一起来。我们说过，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必须作为一个工具，统一不同地下小组在公司里的行动。这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因为在工厂或车间里，就算没有什么“小组”，也能搞委员会。必须强调，如果公司里有地下小组的话，它们应当在委员会中追求两件事：第一，齐心协力投入行动，为所有人服务；第二，让成员通过委员会开展活动<sup>27</sup>。因为地下组织都有一个大问题，它们的成员不能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因此而消沉。

公司里活动的工人积极分子，应当尽可能地发掘出更多领导者。没有什么比若干人包办一切更糟了。

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建议是：

- 尽可能多接触同事，了解他们的潜力与能力。如果觉得谁愿意加入，就跟他谈话。启发大家对问题的认识。
- 通过身边现实证明我们在方方面面受剥削。引用数据，例如半岛上每一百个工人子弟只有一个能上大学。
- 委员会会议上花时间汇报各部门募集人手的情况。
- 给他们分配较小的职责，帮助他们获得经验。
- 让他们加入各部门的团队。

积极分子的人数越多，工作就越有效、越深入。比方说，发生

---

<sup>27</sup> 这些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中译者注

罢工时，只有准备充分、久经考验的团结队伍才能发挥作用，把罢工坚持下去。班达斯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 关于委员会搞培训的目的，我们不可避免遇到困境。半岛上所有“反对派”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它在工人中间引起的特别困难了。问题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是应该专注于行动，还是相反，应当专注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此，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多年抗争得出的结论。

厂内工人组织的第一阶段，甚至在后续的阶段上，我们认为显然行动是主要的。通过行动，领导者可以发展新人，实现对新人与工人集体的真正教育。教育不仅着眼于个人与集体意识，同样还有理论与人文方面的具体内容。下面是部分有关内容。

- 通过分配（需要进行准备和了解的）具体任务，增强责任意识
- 组织和开展会议与厂内集会等的能力
- 通过需要准备的活动，磨练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演说能力
- 团队合作精神
- 通过公司的行径、公司代表团的讨论、工人受到的迫害等等，认识阶级斗争

每一天里，我们都在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们厂里就是这样。看起来它与别的工厂没两样。但是，当罢工爆发时，它就能惊人地

凸显出这些年的成就：集体意识、团结、领导者们的准备等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学习教育。也许第一阶段就该打基础，有了基础之后，再用深深植根于基层与行动的思想教育来教导大家。没有头脑空空如也的行动家，也没有脱离日常斗争，只想指挥人的理论家。但目前把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不容易。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考虑到个人在能力、潜力、意愿等方面的差异。关键是，两头都要抓：富有教育意义的行动与为行动服务的教育。光说不做只对资本主义有利，反之亦然。

也许工厂委员会在行动（也意味着对工人的教育）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也不该忘记学习的重要性。应当鼓励每个人读书，参加研讨会和讲座。有时，必须与别的人员与工厂建立联系。应当提供笔记、小册子、书籍等一切有助于激发觉悟的东西，以便工人能够明辨是非，自由地接受革命的思想路线。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最大程度的坦诚，不能按照个人倾向行事。

四．关于如何培养集体意识、如何鼓励众人的积极参与，相信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

沟通是很重要的。委员会必须通过成员，通过各部门的小组，使每位工人都掌握最新动态，听取建议与批评、澄清疑惑与担心。为此，我们从早到晚都要保持最大的耐心和坦诚。

为了便于交流，有两样工具特别重要：传单（或宣传册）和厂内集会。

尽可能定期分发探讨内部事务的传单，其它工厂的话题也可以考虑。要非常小心，因为传单会招致严厉的镇压。如果感觉情况很危险，就少发一些传单，只有在影响公司的紧要关头才发。关于其

它工厂话题的传单，最好让厂外的团体印发。

工厂集会是一切工人的大会。我们在集会上研究问题、讨论解决方案、表决决议、审查先前的行动、筹备选举等等。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应当定期集会，例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会议的筹备。组织方面的所有问题，委员会都要在特别会议上考虑周全。应当以各种方式鼓励工人的参与和批评，也就是说，鼓励真正的集体领导。

出席率会因时间和问题重要性而大相径庭。必须确保开会时，大家都有空闲时间。即使最后出席率不超过 20%，也算是成功了。当然了，有时参加人数会达到 40%、60%、80%。

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教育，但始终要采取便于理解的简明形式。这也是分发小册子、贩售书籍的好时机。

尽量找一个合适的会场，但要始终保持警觉。

五. 为了保持革命性，必须把厂内行动与外面的斗争联系起来。

大家都懂得，公司层面的孤立行动是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的。不能忽视每个公司小组或委员会的重要性（尤其考虑到我国的斗争主要是城市工人开展的），它们要成为游击队，要利用更高的机动性、战线的数量优势、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等等，在每个公司里，创造出工人阶级在特定时机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胜算就在于，工人要在工会、政治、文化阵线上，协调一致行动。

为此，每家公司的委员会和小组要共同努力，直到实现整个半岛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团结（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要团结。今时今日的资本主义愈发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巨型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

指出统一或协调行动的具体方式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只提出有助于它们的方法。

- 各个公司、小组的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联系。
- 学习如何（至少在行动中）实现团结的具体经验（从各方面来说，班达斯罢工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 始终争取游行示威、总罢工、公共基金等。
- 传播有关冲突的消息，以便取得半岛或国际组织和团体的支持。
- 在会议上推动问题的讨论。
- 声援罢工和解雇等等。
- 当心各种“逢×必反”的立场。我们指的是死抱着老一套观念不放的团体和个人。在他们眼里，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
- 如果有人怀着私心，危害团结的话，不管是谁，都要坦白地予以谴责。
- 最后，要在各省、各民族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协调工人力量的组织。

我们真诚地相信“分裂”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直面它，至少在真正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团体之间，应当克服分裂。

为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事业的胜利。



## 人际关系方面

本章开头说过，我们的某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斗争中绕不开人际关系问题。好吧，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尽管许多人会觉得这是“多愁善感的”和“神秘的”。

在目前的局势下，半岛镇压了一切形式的反对活动，我们被迫转入地下。而“地下”意味着怀疑、猜忌、不断分裂等等。这种气氛是完全有害的。真是令人窒息。团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缺乏建设性的批评成为了家常便饭。流言满天飞。情况危急，却没人出面力挽狂澜。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和政权有利。

结果是，许多战士见此情形，都束手束脚的。

作为斗争的参与者，我们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和压力，同样的猜忌、分裂、无力……

当然了，即便如此，我们自认为积极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不让它们阻碍团结、理解、活动，索性没有酿成恶果。因此，我们相信，地下活动造成的客观问题是能够克服的。为此，需要领导者改变这种氛围，播下和解的种子，通过对话、建设、努力，克服困难。

对于领导者(受到同伴认可,要为共同斗争承担特殊责任的人)的形象,我们想从自己的经验中,举出若干方面来。

具体方面如下:

**责任感:**真正的工人领导者会投身斗争、行动、教育。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与阶级兄弟一起,为了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具体到工厂和更高的层面上,意味着:

**第一,领导者要会思考。**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眼前的问题、应对的策略、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此外,他必须让自己的想法在工厂委员会内部的小组中接受批评(当然了,也不妨碍在其它小组或组织中讨论。但有关讨论通常是公司内部进行的)。

如果严格遵照了上述要求,那么这种思考,这种对公司现实的不断分析,必然提高行动的能力。工厂里有这样一群领导者:他们能够代表同事。他们思考、定期开会、策划行动。工厂因此成为了一个有机单元,得以融入更大的斗争机体,实现重大的行动。

思考和策划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决策并付诸实践。

**第二,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应主动出击。**许多情况下,正因为缺乏个人思考或害怕做决定,有些人才循规蹈矩、踟蹰不前。对于斗争来说,就像在我们的罢工中,最糟糕的莫过于犹豫不决,永远等他人先干起来。可以说,如果领导者不投入行动,就算厂里已经组织起来,不论做什么都要付之东流。

## 动机 意识形态

以上种种都需要严肃的理由（一种精神已经呼之欲出了），使领导者的斗争与牺牲取得充分的意义。

这意味着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头脑与心。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但领导者要懂得斗争是为了什么，是反对什么。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认识到必须摧毁它，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由人民掌握权力。

只反对公司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就好像是，只有你有权利拿到更高的工资<sup>28</sup>一样。

因此，为了明确思路，需要阅读，想方设法充实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生活、社会及其组织的一套观念。当然了，思想路线的探索必须始终坚持革命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建立在对生活现实与历史经验的严肃深入研究上。毫无疑问，由于目前缺乏教育，许多工人很难分清一种思想是否是革命的。要找寻革命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想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愿意严肃研究我们所处的现实，准备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作出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有头脑的”领袖。

但这还不够。领导者必须有“心”。这个词蕴含着一系列情感：他渴望成为表率，用真诚的献身带动他人。他渴望与同事建立友谊，与他们融为一体，尊重他们的缺点与局限。他要起来反抗不公，对一切压迫义愤填膺。他行事光明磊落，渴望为了团结而奋斗，满腔热血地寻求一切有助于阶级兄弟解放的事物。他抵制资产阶级作风，努力消除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他人的自私与逃避。

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精神、有爱、有热情的领导者。真正拥有

---

<sup>28</sup>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阿方索·C·科明（Alfonso C. Comín）的《南方的西班牙》（*España del Sur*）一书。——原注

它们的领导者会把自己的知识和希望传递给他人。为此，他通过行动、友谊、朴素，加入到他人当中，促进集体的觉悟，使大家怀抱热情投入斗争。领导者是他人的鼓舞者。他抛弃了天真的幻想，明知步履维艰，仍坚定保持着对胜利之日的希望<sup>29</sup>。

## 对话：统一的要素

我们已经指出，工人力量的分裂是不容忽视的痛苦事实。它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在公司生活中，也许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的缘故，这种团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频频暴露出来。

否认不同思想、看法、观点的存在，那就荒唐了。这是人的本性。但最要紧是，应当在这些分歧上建立行动的统一，甚至在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中求同存异。

这就要求领导者们持有开明的态度，能够摒弃宗派主义和“逢×必反”的立场，但要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拥趸。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在斗争中进行对话与合作。

此外，工厂委员会也是这些团体共同开会的地方。在所有的会议上，无论策划什么行动，都要怀着最大的诚意，正直地行事。如果发现有些团体形迹可疑，“撕下外衣”或者打破团结都毫无建设性。积极的做法是把话讲明白，要求他们做解释，然后……继续前进。

不用说，在这项协作中，必须抛开“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

---

<sup>29</sup> 参见厄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原注

的”的心态。在协调不同组织、不同思想的群体行动时，要听取不同意见才能做出决策。因此，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只能以民主方式让大家接受。

也许，领导者最需要的品质就是包容、理解，做事有建设性，以友谊铸成团结，拒绝无原则的明争暗斗，留着力气打击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如此有害的窝里斗气氛中，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实现工人行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为我们的事业创造胜利的条件。

然后，我们还要批评最消极的人和团体：尖酸刻薄的人；制造分歧的人；冥顽不灵的人；满脑子“女巫”和“怪物”的人；只支持自己团体提出或开展的行动的人；处心积虑占便宜的人；谁都不想得罪的人；相信全部真理在握的人；活在过去而不审视自己的思想和其它事物变化的人；不问动机与目的，一味批评和指责的人；还有完全丧失了革命意识，泡在空谈里的人。

的确，我们在罢工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但说实话，所有的地下小组（至少是基层成员）都配合了我们的抗争。不过，到了关键时刻，某些地下小组的领导人却试图缩小罢工的影响，也许只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没能让斗争打出他们的名号。此时此刻，我们班达斯工人要问：罢工苦斗了五个多月，却还没有扩展开来，这难道正常吗？当斗争的客观条件变得不利时，总是大谈“总罢工”的团体，为了这一目标竭尽全力了吗？难道还有比这场罢工更合适的时机吗？同样，我们还可以说，某些团体之所以批评罢工，只为了反对其它团体，只因为罢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不想再纠结陈年往事。我们想说，基层活动者全身心的支持，并不总是出于工人组织的本意。相反，某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

暴露无遗。这至少是我们许多人的感受。我们认为，每个组织都应当回顾自己与其它组织的所作所为，先放下毫无意义的争执。

假如现状仍旧，那么实现工人解放的巨大动力，不会来自各个反对派组织的“最高会议”，而是来自基层工人的行动。它会使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傲然挺立。我们希望，假如班达斯没能办到这一点，也至少接近了这个目标，使之成为了可能。

我们真诚地相信，有些消极因素正是某些工人组织造成的。它们在多年的艰苦斗争条件下，迷失了真正的目标。饱受迫害的地下活动，无疑会使人疑神疑鬼，使他们惯于说谎、不相信任何人、见到谁都怀疑是敌人。简单讲，就是变得不近人情、极端冷酷、斤斤计较、党同伐异，甚至变成反革命。

但是，如果意识到了所有的分裂、流言、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招致的后果，就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局限。

为了克服分歧与猜忌，我们付出了不断的努力，这或许是我们厂保持团结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剑拔弩张的罢工中，我们的领导者也定期开会，以便审视行动、批评立场和态度等。他们的话语真诚而严厉。有时会发生个人矛盾。但最后，大家倾吐了苦水，情谊和团结更进一竿，洋溢着信任与乐观。因为我们确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开放的、纯粹的，没有个人的小算盘。它促使我们追求目标，不断寻找最合适的办法。

在日常集会上，我们也始终在培养建设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不相信人民的某些人不具备的品质。人民能够克服千难万苦，为斗争付出牺牲，愈发意气昂扬，最终取得完全的革命觉悟。

总之可以说，班达斯斗争的这些年，不乏缺点、错误、局限，但我们用建设性的健全活动巩固了团结，这种活动基于友谊、理解、

对话、批评，以及为集体服务的共同行动。如果有人在为行动编织理论公式时（正如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活动家罗维罗萨<sup>30</sup>就说：“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却忘了在里面注入一种精神，一种使斗争与磨难获得意义的工人的希望，那就太可悲了。

如果我们主张的革命是“以人为本”的，那么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处理好斗争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实现我们对工人团结的渴望，团结起同样遭受压迫的人们。

### 给大学生的思考

工人集体写作的书并不常见。更难得的是，我们认为要把目光放到学生的世界，放到大学中去。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感到刻不容缓，必须建立联系、进行对话，表达我们的想法。以前也有人这么做，也许收效甚微。但我们想再试一次。

原因有几点。对于班达斯和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们的立场，是你们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战斗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要以与你们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这是一种直接的语言，讲的是日常现实，是你们的言行举止、你们课堂上的前辈。

---

<sup>30</sup> 吉耶尔莫·罗维罗萨·阿尔贝特（Guillermo Roviroza Albet，1897年8月4日——1964年2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一家工厂担任工人委员会主席。共和国颠覆后被捕，判处12年徒刑，后获释。1946年发起成立天主教工人兄弟会，担任主席。此后居住于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并于1963年担任ZYX出版社主席。1964年逝世。——中译者注

你们当然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你们的世界，所谓的“世界观”，能够把一切都合理化，弄出相对的概念，让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变得复杂万分。因为可悲的现实是，你们身处物欲横流的世界。

是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但这不可否认，因为你们平日里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你们、揭发了你们。

我们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自我们最痛苦、最残酷的经历，那就是你们的背叛，把学识售卖给最高出价者的堕落。从根本上来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它只是一个环境问题。

对于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人道”只停留在了个人和家庭中。这就是你们呼吸的、生活的环境的产物。说白了，这种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构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早在憧憬人生时，你们已经受到了危险的灌输，资产阶级生活的老一套开始润物细无声。在最慷慨无私的青年时代，就像你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它用舒适地位和个人成功，无形地不断诱惑你们，而代价是你们的驯服与屈从。他们提供了毫无根据的空洞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西方文明”、“自由世界”等等含糊不清又不切实际的思想体系，又延伸出剥削各民族、剥削全人类弱者的观念。在这种“西方文明”中，你们所处的西班牙“既定秩序”，就好像是天经地义、无需争辩、不可避免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无非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社会经济利益强加的历史阶段。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引导你们的生活和志向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无私看法或思考。恰恰相反，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社会上各安其位”的想法，然后是让你们少点不满、少些良心不安的陈词滥调。

你们大都是安分的。思想贫乏使你们堕落，野心叫你们腐化，

福利叫你们麻木不仁，最后成为了资产阶级大军的一员。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两面三刀的道德，对思想和问题的粗浅见解。出于机会主义，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天地，不愿意识到阶级的现实存在，不会因为善意、秩序、人道或“消极的个别善行”（同情、慈善、社会工作）而消亡。有人说，需要改变的是人而非制度（就好像不是制度对个人起到决定作用一样！）。有些“人道家”主张众生平等，可某些人拥有一切，其他人又一无所有。有些人统治，有些人作为统治者服务。这些不平等并非孤立的，而是通过社会阶级间的剥削关系发展起来的，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不平等。有时候，我们在你们这些未来的专业人士中，看到想“既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的中立态度。没有比时间的检验更能证明：你们到底属于哪一边，你们要捍卫的是哪个阶级。事实一清二楚，中立是不可能的。你们的视而不见是一种罪行，跟其它罪孽一样深重，因为这意味着你们支持强者。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个坏蛋在欺负一个女孩，我们能有三种态度：保护女孩，不插手，支持坏蛋（坏蛋用钱收买了我们）。说到底，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后两者是同样有罪的。只有第一种态度是真诚的，也是唯一帮助弱者的可行办法。我们还能补充一些条件，更接近我们的社会处境。比方说，我们和受害者有血缘关系：她是我们的姐妹。有些人没有制止凶手，事后才“帮助”女孩，跟她说暴力总是不好的，忍忍吧。

专业人士其实也是劳动者，也是拿工资过活的普通人，他们却觉得自己和工人世界没有交集。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情感上融入了老板世界，接受了老板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一门心思想当有产者。

渐渐地，当他们融入秩序后，锁链拴得更紧了。他们在出卖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束缚也变得更重。总有一天，他们会完全融入

这个圈子。

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否认资本主义中不公正的存在，而且还摩拳擦掌，准备迫害和镇压工人的任何反抗。

什么理由都行：“现行法律”、“境外势力”、“经济形势”、“保卫”上帝与祖国乃至圣战。是的，正如神学家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sup>31</sup>所说，这些玩意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世界不是分成信者与不信者，而是分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龚德拉、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普尼、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卡尔巴乔等人吧。

不要忘了，这些人曾经也不过是学生，拥有的财富只有自己的学位。可时间不会白白流逝。魔鬼在满脑子发财致富的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诚然，最后发财的人不多，但是想回头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才能脱去沉重的枷锁。但许多人已经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价值观，什么也不剩了。所以要早点睁开眼睛，不然就太晚了。

举个例子。有人以前跟部门里的专家谈过。那位专家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也看到了不公正。一次，需要他站出来反对管理层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面对工人的指责，他的回答是：——“你们看，我有老婆和孩子。”工人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朋友，但是除了老婆孩子以外，你还有羞耻心。”“工人难道没有家庭吗？”

---

<sup>31</sup> 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José María González Ruiz，1916年5月5日——2005年1月28日），西班牙神学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早年就读于马拉加神学院。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时，因骚乱流亡意大利，在梵蒂冈求学。回国后在马拉加大教堂工作，后因支持同性恋被解职。60年代起日渐同情马克思主义。1968年因发表文章《基督教与革命》而被捕，后无罪释放，但著作遭到销毁。1973年在马拉加以“赤色危险分子”为由，罚款10万比塞塔。1976年在马拉加参加大赦游行，支持“民主化”。1996年获安达卢西亚勋章。2005年逝世。——中译者注

我赚的比你多吗？看吧，监狱里塞满了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是团结的。还有，你要是觉得找不到工作，那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但你不要着急，假如你真觉得自己是劳动者，别无他法的时候，你不会介意拿起镐头和铲子。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

可不要搞错了，问题更深刻：你们觉得自己和人民在一起吗？你们和这位专家一样吗？你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和阶级？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为普罗大众服务？

当然了，你们的许多前人都以可悲的想法为自己掩饰。尤其是以行动证明，他们与自己深深鄙视的工人世界毫无关系。身居资本主义的高位就是尊贵、高级、成功，当凡夫俗子就是失败和屈辱。他们满口扯谎，讲不出一句实话。每一天里，他们在工厂和公共机构的无耻行径中，在他们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效劳的过程中，无不暴露了他们对我们的蔑视。

最大的证据就是：他们牢牢抱着统治阶级的地位，把其他人当奴仆使唤。他们蔑视体力劳动，好像他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劳动和汗水直接创造出来的一样。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举在工作事故中死亡、致残、受伤的人数。资本主义冒着所谓的“风险”，摘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面对真正的危险，在每天的劳作中燃尽生命，最后只换来填不饱肚子的养老金。我们看到有些人辩护说，当前的文化与道德（受资产阶级支配，为资产阶级服务），由于“客观”与“公正”的特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更糟的是，近年来，工厂里出现了新一代的专业人员：技术官僚（tecnócrata）。隐藏在“最新经济技术”和“工作合理化”背后的，是他们对工人更新颖、更精致的压迫。

我们该如何定义技术官僚？在职业、目标以及与人民的关系方

面，上述一切自然没有错。此外，他们还有新的特点：佯装出所谓“企业家形象”的虚荣和自负。同他的科学与高效的外衣相称的权力与荣誉。对技术的崇拜把一切事物，无论是机器还是人，都变成了同样的生产要素。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成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得意忘形的、刚愎自用的，因而是麻木不仁的技术官僚，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现实没有改变，反而更糟了。但目的是始终如一的：它们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为的是资本的利益。他们更高效地剥削劳动，没有从我们的劳动中看到任何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只有任劳任怨的份。为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向他们说明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集体承担责任。大家将以民主的形式共同经营公司，平等地分配风险和产品。竞争的动机将会变得更人性，最终改变这个强盗的市场丛林法则。

他的回答会是冰冷的，或许会照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手册回答。我们的话对他而言，好像是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尤其是，他仅用来思考数字的“科学”头脑是无法理解这些的。

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抗议，都遭到如此普遍、肤浅、自私的答复：你们这些穷人对……富人生活得好有什么可抱怨的？

显然，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的环境是没有出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也许更为深刻）对我们事业的胜负影响深远。

话说到这里就够了。想理解的人自然能理解。人们是有可能摆脱这条路的。是的，我们公正地说，任何时代都有少数专业人士反对主流，始终忠于人民，献身于解放人民的斗争。

现在，在这个新的时代，半岛人民结束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刻到了。在新的希望下，已经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今天的大学里，至少少数最觉悟最能干的学生，正在走近现实，

领悟使命，领会他们在过去、现在、未来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这场罢工中，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参与。一些工程师给《周一小报》写的信、（毕尔巴鄂自由公会通过后）在我们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筹来的钱。你们出席审判，加入声援的游行队伍。这些无疑代表着新的精神面貌，代表打破旧束缚、改变旧立场的坚定意志。

同样，不应高估这场“回归人民”运动的影响力。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的骚动不过是为了学术独立、结社自由之类的表面要求，没有真正提出深刻变革社会与政治结构的需要。

这种肤浅的态度证明了某些思想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以外的社会团体是无法彻底反对专制的。这些团体只反对切身相关的东西，不希望社会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到时候，这些社会团体（比如知识分子等资产阶级团体）害怕真正的民主冲击自己的经济特权，宁愿与最反动的势力（就是剥夺他们民族自由、思想自由、文学创作自由的人）结盟，也不会支持工人斗争。

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无意分析大学生活的整个现实。我们只是真诚地呼吁你们加入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劳动者，加入反抗压迫的共同使命，建立更公正的兄弟般的社会。

如你们所见，在我们的要求中包含着巨大的期望。使它落空，还是完全实现它，取决于你们。唯有时间作证。你们想或不想，我们都会斗争中相见。关键是，你们不要再站在对立的阵营了。

我们特别是指还未对资本主义宣誓效忠的人、还在上课的人、还没有为体制刻印的人、就算违背一己私利也能追寻人民的人。

我们不是让你们提供“领导”的，而是让你们也出一份力。如果你们的意愿是真诚的，那么和工人世界一样，人民会把责任托付给你们。但不要只会教，很多时候你们什么都得学，至少要学习真

正生活的学问，这是与你们的技术截然不同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雷吉斯·德布雷<sup>32</sup>的书《革命中的革命》中诠释得非常精辟。如今，这位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玻利维亚因支持游击队而锒铛入狱。他引用了卡布拉尔（Cabral）的一句话，定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原阶级身份的自杀，是为了全身心与人民最深刻的愿望结合，作为革命工人而重生。”

一旦作为革命工人重生，知识分子就能履行各种使命，同时又不必舍弃作为知识分子的才能与需求。

他接受了使命，会去分析、宣传、揭露。他走进了人民，还能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处境与使命。他必须始终警惕资产阶级出生的残余，往日的影子会使他利用人民，产生优越感。为了避免各种危险，他应当始终身处群众中间，尽可能接近群众，远离自身不公正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如果没有真正拒绝自己的过去，那么他迟早会背叛的，因为环境中的机会主义、浅薄无知、假仁假义，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一个人，除非在它面前竖起坚固的高墙。

作为建议，我们想给出一些加入人民的方式。做法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因此，我们这里一口气讲不完。

首先，有一件事很明显：每个人必须要意识到问题所在，怀着足够的诚意，严肃地考虑是否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未来道路。换句话说，考虑是否把它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为了人民和全人类

---

<sup>32</sup>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 1940年9月2日——)，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的解放，与自己的阶级兄弟一起努力。

为此，我们给出以下的方式：

- 直接与工人积极分子接触、与投身斗争的人接触。
- 谈话。参加讲座、研讨会。阅读书籍和地下出版物。进行不同职业的体力劳动。以此尽可能了解社会政治现实。
- 逐步融入人民的抗争行动，尽可能协调工人和学生的斗争，把它们作为共同事业的不同战线。
- 加入革命团体，融入基层。
- 基于这种态度规划未来。

这些方法是逐步递进的。当然了，关键还是参与斗争。

由于给出的做法有限，我们得简要概括一下基本思路。

为了加入到人民中间，摆在大学生面前的真正问题就是要放弃压迫者的阶级身份，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因此，这意味着必须逐步转变习惯、环境、交际、心态等等。

从各方面来说，这算是名副其实的“洗脑”，因为它意味着对生活（婚姻、家庭责任、工作中的立场等等）的不同理解。

最关键的是要采取行动，不能纸上谈兵。当然，就算做了预防措施，行动还是会有风险的。比方说，在公司的层面上，可以加入工厂委员会。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与工人领导者保持个人联系、提供消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有些职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例如劳动事务所、各类咨询工作、社会学校等。这些也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不想展开这些方面，因为选择有很多。最后，我们得说，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精神，它与当今背离人民、实行残酷剥削的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思想和精神背道而驰。

说到底，我们要求工人出身的人，不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求你们背叛它。



## 后记

我们来到了书的结尾。通过本书，我们想兑现开头序言里说过的话，“不用说，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是的，怀着激情，我们希望记录下这 163 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全部的感受、希望、遭遇。我们试图忠于事实，忠于我们的事实”……

现在，我们想对全部的思考与目标，做个简短的总结。就是说，指出推动我们前行的是什么，再向全体劳动者发出呼吁，把它托付给未来。

相信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吃得更好。对于那些（我们无恶意这么说）说我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的人，我们回答他：“现在牛也吃上饲料了，但它们还是牛。”我们不仅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而是在为了建立新的社会，为人民真正管理工厂、政府，还有整个政治与社会生活而斗争。否则，对我们的剥削会以千百种方式继续下去。今天，我们能以许多工人为例，他们以冰箱和汽车做交换，放弃了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乍一看他们过得不错，但他们仍然受着少数资本家操纵，因为资本家掌控着经济生活，还通过报纸、“国际关系”、大学，掌控着政治生活。

此外，我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忘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北美矿工每月挣四千美元，就此心满意足，没有从根本上打击资本主义。他们的公司（他们其实沦为了帮凶）残酷地剥削玻利维亚的矿工，以及比他们无力得多的所有贫困国家工人。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我们工厂。我们半岛上的所有民族对它们并不陌生，

例如：比斯开高炉、通用电力、陶氏乌基内萨（Dow Unquinesa）、赛法尼特罗（Sefanitro）、比斯开金属工业、伊图阿特（Ituarte）基金会、阿迪亚奇（Artiach）在内的很多公司。

书里每一页都是沉甸甸的事实，它们使我们深刻地认识了控制整个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社会。总之，我们能总结出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罢工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 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他们通过控制经济生活，支配着各国人民的命运。

- 客观且深刻（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

- 在我们的半岛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法西斯独裁政治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

- 消灭被剥削者的一切组织以及他们激增的反抗。

- 经济发展倒退（城乡之间极大不平等，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某些消费品：电视、冰箱等。寡头们还制造了“福利”和“法治社会”假象）。文化和政治亦是如此。

在集权制度下，主业会的技术官僚等人开始采用新资本主义的“备用方案”，无非是为了掩盖垄断资本的利益，自然是达不到目的的。别无它法，他们马上提出了美式“民主社会”，企图分散我们的革命要求。但我们注意到了陷阱，没有掉进去。斗争必须继续，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直到工人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这是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途径。在我们想要建立的新社会中，只要没有人试图保留特权（无论性质如何），人人都有一席之地。

不知道斗争将持续多久，但我们绝不停手。如果人人都出一份

力，众人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场罢工前，班达斯工人不知道自己办到什么，但有了团结与斗志的武器，我们的力量是不可比拟的。我们能够唤醒自己、唤醒千百万工人蕴含的力量。许多还不完全属于工人世界的人也听从尊严的呼唤，参与到我们的斗争中，提供了宝贵的合作。

这场斗争必须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上开展，尤其要使用最有效的武器：每座工厂中的行动、工人力量的协调（这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知识分子等人的参与，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及对我们的目标有用的一切手段。

用革命者的榜样，厄内斯特·“切”·格瓦拉今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美团结组织<sup>33</sup>会议上的话来说，我们想寄语所有工人、所有投身斗争的人：“关键在于投入日益成熟的斗争之决心，在于渴望革命变革之意识，在于确信这一变革之可能性。”


如果说，作为不发达国家人民在帝国主义阶段为打倒资本主义采取的策略，“切”提出“要给压迫势力创造出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越南”，那么我们呼吁半岛上的所有工人“创造出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埃切瓦里！”，对压迫我们的法西斯资本主义进行最后一战，打倒世上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到了那一天，我们经历过的苦难、遭受过的迫害，还有我们奋不顾身的战斗，也就不算白费了。

---

<sup>33</sup>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La Organiz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 OLAS）是由古巴牵头创立的革命反帝运动组织，1967年8月成立。组织旨在通过游击战争把革命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打击美国企图控制拉丁美洲的企图。但由于切·格瓦拉在几周后牺牲，使得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原定的协调全拉美游击运动的设想落空，组织实际已不复存在。——中译者注





30 Noviembre 1966  
15 Mayo 1967

163 días  
de lucha  
obrero  
contra  
el capitalismo  
fascista  
del Estado  
Español

Trabajadores  
de laminación  
de bandas  
Echevarri

# muestra huelga